

应天 文化季刊

Yingtian
Culture Quarterly

卷之
2023



应天文化季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吴金山 郭文佳

副主任 高建立（常务） 陈晓明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媛媛 王立 王琰 于志刚

冯志伟 卢忠雷 刘万华 刘海洲

孙佳 吴金山 陈晓明 李卫军

张松林 张富林 李相中 李瑞华

郭文佳 高建立 常丽洁 薛立芳

总编辑 吴金山 郭文佳

主编 高建立 陈晓明

目 录

书院研究

- 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发微（王树林·1）
论朱熹与浙东学派及五峰书院（王立斌·8）
书院文化的守正创新与一流大学的本土构建（赵亮·14）

应天史话

- 仓颉文化在商丘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赵继彬 谷雨·18）
归德府的壬午之变（王隐·24）

人文往事

- 那年三月（李蕊·27）
归来（王华源·29）

文学沙龙

商丘女诗人诗歌专辑

- 蝴蝶的影子飞过子弹射穿的墙（班琳丽·32）/ 信仰（鲁蕙·33）
/ 作品（翩然落梅·33）/ 铁皮仓之恋（冬雁·34）/ 薄暮（秋若尘·35）
/ 致（今今·36）/ 还乡（班美茜·36）/ 我已有很多年没有回去过那片雪野（品儿·37）
/ 落日研究（一炉雪·37）/ 紫荆山的鸽子（陈平·38）

- 又见古城（马学庆·39）/ 爷爷、父亲和我（陈雁飞·40）
我在假期卖化肥（吕涛·42）/ 鲜活而生动（付艺·45）
无声的等待（任梦瑶·46）/ 玉兰花开（王若凡·48）/ 海子——
荒野中的拾月人（王梦瑶·50）/ 组诗四首（张瑾·51）
交友当如庄子休——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五（庄桂森·54）



总编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学术论坛

梁漱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探索（高建立·58）

夏代大运河、大禹阳城考古探微（韩 鹏·63）

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形式——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

新诗的建构（李瑞华·76）

学子文苑

从《美的历程》认识理性之美与感性之美（李园园·85）

文本视角与史事叙述——明代权力构筑与运行逻辑

（崔永跃·88）

艺术空间

硬笔书法（董思源·96）/雪落归德（摄影）（高 远·97）

海阔天空（摄影）（王双霞·99）/校园夕照（摄影）（金晓双·99）

秋日雅集（摄影）（高冬雪·100）

学术动态

淮海经济区高校书院制卓越人才培养共同体第一届年会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13）/我院陈佳伟同学在第九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17）/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隆重举行（·26）/人文学院获批三项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3）/杨晶教授“创新 消费 赋能：文化产业建设中的青年动力”专题学术讲座（·62）/人文学院高建立院长应邀参加“勉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紀念会”（·87）/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做客应天书院讲坛品读《孔子的智慧》（·31）/河南科技大学王东洋教授为师生做学术报告（·75）/郑州大学崔波教授应邀来人文学院做学术报告（·84）/白鹿洞书院管委会副主任郭宏达先生应邀到人文学院做学术报告（·95）

● 书院研究 ●

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发微

□ 王树林



中国书院研究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地。书院之名虽然唐代既有，但五代以后才真正成为文人士子肄业之所。应天书院（时称应天府书院）是在五代杨悫、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于宋真宗时创建，后改为应天府府学，继而升为南京国子监学，在宋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两宋书院大多有史志，甚者一修再修。而作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至今无史无志，其史志的历史分期问题、书院先师与书院名师的教育贡献问题、宋大臣辅相如晏殊、范仲淹、王洙、王尧臣、富弼、赵概、张方平等与书院的关系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南宋以来学界对书院某些错误认知问题等等，等等，皆待研究廓清。应天书院史志研究的深入开展，是当今学术界的迫切任务。

一、书院起源及其功能的演变

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谓，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1]。今检新旧《唐书》，袁说亦不尽然。《旧唐书·职官志》谓：“集贤殿书院：开元十二年（724）置。汉魏以来，职在秘书。梁于文德殿内藏聚群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隋平陈之后，写群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外阁。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嘉至隋，皆秘书掌国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717），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十三年（725），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2]《新唐书·百官志》亦有“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之说^[3]。可见，唐玄宗时的“朝省”之书院，不仅是修书之地，还是藏书、刊书之所。

当时皇家书院是不是就没有“士子肄业”的功能呢？其实也有传道讲学、授徒肄业功能，只是不以此为主而已。集贤书院初成，以张说为学士，唐玄宗李隆基赐宴庆贺，时君臣应制唱和，现存这些

应制唱和诗亦可说明。如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昭袞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诗中有“广学”“引席”“论道”之说，可见有讲席论道之事。张说《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诗：“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源乾曜《奉和》诗有“盛业光书府，征人尽国英。司纶贤得相，群俊学为名”句^[4]。《奉和》诗中也提到“金华讲”“学徒归”“文教”“征人尽国英”“群俊学为名”，皆为讲学教徒之事。不过当时书院师徒，不是一般士子，多为饱学文臣而已。关于唐丽正、集贤书院的创立与功能，宋王应麟《玉海》一六七考之甚详，这里只是说明盛唐时朝廷已有书院之建，虽为藏书、修书之所，业已具有讨论学术，传道授徒之功能。

书院为一般士子肄业之所当出现在中唐以后至五代时期，当时又称书堂、学舍、书楼、书斋等。初发只是学人高士自我读书修身养性之所，或富家大户之私塾。后人追绪，逐渐才有面对社会收授生徒之举。如衡阳北石鼓山之石鼓书院，前身即为唐秀才李宽结庐读书处，唐诗人吕温有《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5]据《湖广通志》卷二三所载：“宋至道三年（997），郡人李士真援（李）宽故事，请即故址创书院，以居衡之学者。景祐二年（1035），刘沆守衡，请于朝，赐额曰石鼓书院。”^[6]可见到了宋代才有收授生徒之举。其他提唐人有书院者多为后人所记，并非时人所称。如河北真定的西溪书院，本唐隐士姚敬栖息隐遁处，至宋才有是称（《明一统志》卷三）。四川巴州丹梯书院，本为“唐状元张曙读书地”（《四川通志》卷七九）。南岳书院，一名邨侯书院，唐李泌隐居于此，名端居室，宋建书院（《湖南通志》卷六九）。

关于富家大户私家办学最典型者见于《义门陈氏家乘》，《家乘》收有晚唐大顺元年（890）陈崇所立的《江州陈氏家法》，其中涉及本族家塾者有两条：

一是，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

二是，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至月解散。量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室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7]。

至五代，天下混乱，战争不断，官府无暇顾及教育，官府主导的官学衰落式微，有志文人开始从自我高蹈、修身养性的读书楼舍，面向社会士子而揽徒讲学。旧有的书院、书楼、书舍、学堂开始由藏书、自修、家塾的半封闭形式，向侧重于“士子肄业之所”的开放功能发展。如上文提到的陈氏东佳学堂，不仅教育陈氏子弟，开始面对社会而向四方游学之士开放授徒。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述及南唐时陈氏东佳书堂，谓“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8]。南唐徐锴《陈氏书堂记》，更明确记载了当时陈氏的东佳书堂既教陈氏子弟，又延社会四方游学之士而设教授徒，记中写道：

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之书楼。……大顺（890-891）中，（陈）崇为江州长史。乾宁（894-898）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孜，本县令，能嗣其业。如是百年，勋从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扬之，旌其义也。袞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蛭、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

立盖有之^[9]。

徐锴为五代南唐时期著名学者，徐铉之弟，世称“小徐”。此记虽撰于大宋赵匡胤开宝二年（969，宋立国第九年），所记之事皆为晚唐（唐昭宗乾宁中，896）至南唐间（896-969）史实。

正史对于此时置书楼、授学徒的教育方式亦有记述。如《旧五代史·罗少威传》：

罗绍威，魏州贵乡人。……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10]。

《新五代史·一行传》：

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而昂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11]。

学者藏书由读书自修到招延文士，是民间教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宋初书院的创立与繁盛做了准备。应天府书院就是在五代时期杨恽、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创立的。

二、北宋“四大书院”及应天府书院的创设

北宋史称有四大书院，而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提出“四大书院”之说的大多是南宋的理学家，他们往往是热心的书院建设者，也是书院教育的践行者。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承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诂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

既有进德之地矣^[12]。

南宋另一大理学家魏了翁在《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中亦云：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读书遗址，乃鉏荒筑室，馆士储书，与邦人讲肄其间，且以致怀贤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斋庐廩稍，岁衍月益，今锡之号，荣殆与睢、岳、嵩、庐四书院相为侪等^[13]。

吕祖谦、魏了翁文中所谓“睢阳”“睢”，即北宋应天府南京，唐、五代时称宋州睢阳郡，睢之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南宋末，史学家王应麟撰《玉海》，运用大量史料，纵谈《天下四大书院》（见《玉海》卷一六七），以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之说为准。及至宋末元初的大史学家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专考学校，于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中列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时虽另有“三书院”、“六书院”之说，而应天府书院（或称睢阳书院）多在其中。今邓洪波先生在《中国书院史》第二章第三节考“天下四大书院”云：

无论“三书院”“四书院”，抑或“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其所指称者无非就是说，宋初有那么三家或四家、五家书院，可以称闻天下。今统计三四五家各说，除去重复，计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徂徕、茅山七书院。它们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们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14]。

应天府书院既为“宋初天下著名书院”，在宋代书院的研究中，应天府书院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检宋以来书院研究的专门志书，典册灿然，甚者一书院的志书一续再续，多者达四五种（如《白鹿洞书院志》）。而应天府书院至今尚无一部志书，岂不让人扼腕兴叹！

北宋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国家肇造之初，大宋皇帝第一个赐名的书院。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考北宋四大书院时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

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15]《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宋大事记》《容斋三笔》及张方平《乐全集》等文献典籍，都将此视为北宋天下州郡置学之始。应天府书院自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公元907-936年）杨恂于宋州授徒，五代后晋（公元937-946年）至宋初戚同文建学堂（或称学舍）办学，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赐名应天府书院，再到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下诏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前后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私家（或半官方）办学历史。收为府学八年后，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又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因素及显著的办学实绩，由应天府学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成为朝廷中央官学。二百多年间，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当时影响之大，对后世影响之远，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由金入元，应天府书院故址文脉续延，或称州学或云府学；或经战乱，或逢天灾，尊师重教，崇儒向学之风绳绳绵绵，传承不绝。至明清两代，或重建应天书院，或另建范文正公讲院，兴废振复，一线文脉，传承至今。

三、应天府书院的研究现状及亟待澄清的问题

应天府书院与北宋其他书院比，后世对其研究相对滞后。仅就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提到的北宋四大书院而言，历史上白鹿洞书院，有明人郑廷鹄编著之《白鹿洞志》、明周伟编著之《白鹿洞书院志》、清廖文英、钱正振之《白鹿书院志》等；石鼓书院有明李安仁《石鼓书院志》、清李振华《国朝石鼓志》等；岳麓书院有清赵宁《长沙府岳麓志》、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等。以上三书院之志书一修再修。而截至今日，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应天府书院的史志专著问世。2001年10月，在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支持下，应天府书院复建项目得以启动，2003年被省政府批准立项为省重点项目，2007年一期工程完工。新的应天书院建筑由河南大学古建研究院设计，于商丘古城南城湖东南侧落成。而一部科学完整、资料翔实的《北宋应天府书院史

志》的修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更显迫切。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重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书院研究，曾掀起了一些热潮，在明清各种地方书院志书的基础上，分省书院综志开始撰写。一九三一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发表了柳诒征先生《江苏书院志初稿》，以通鉴纲目形式，就江苏一省书院发展历史，作了编年考述。一九三二年，吴景贤先生《安徽书院志》问世，全文发表在《学风》杂志一九三二年二卷第四至八期中。该志分县纂辑，每县以地方书院产生年代为序，每一书院又以时间发展先后排列，构稽文献史料，排纂而成。一九三六年，时任民国教育研究会专任研究干事的王兰荫先生撰成《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山东书院志初稿》（未完），分别发表在《师大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五及第二十九期上，其编撰体例基本与《安徽书院志》相同。20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台湾、香港学者对书院研究颇多，三十年中约有40多篇书院研究的论文成果发表。但以上研究，基本没有应天府书院的专门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书院研究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重大成果陆续出现，如陈元晖、王炳照、尹德新《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及一些地方书院史的出版。进入21世后，邓洪波先生又出版了《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论著的出版虽然与应天府书院的研究关涉甚少，但为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需要澄清、探索的问题很多。

一是应天府书院的历史界定及历史分期问题。

北宋历史上的应天府书院（又简称应天书院），应

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为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以后，又有称“南京书院”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北宋应天府南京，唐至五代时为宋州睢阳郡，又有称“睢阳书院”者，如南宋的吕祖谦《白鹿洞书院志》、王应麟《玉海·天下四大书院》。近年一些地方资料，一些媒体资料，甚至一些学术文章有称宋州书院、归德书院者，皆未规范，且无史料依据。应天府书院之名，应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算起，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为止。虽然仁宗景祐二年（1035）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府学，但从改为府学至升为南京国子监的八年中，基本沿用旧制，当时亦“书院”“府学”并称，可看作完全收入朝廷中央官学的过渡期。如果排除“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26年，如果包括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34年。为此，史志的研完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34年的历史，作为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虑到没有前期五代至宋初戚同文的筑室授徒所取得的显赫成绩，就没有应天府书院的创建，并且应天府书院的授徒方法及传授内容，基本延续戚氏课法与戚氏之学。那么五代后梁、后唐间的杨恣至后晋、后周、北宋太祖年间戚同文的授徒，理应做为应天府书院的初创阶段。为此，这一时期戚同文学堂（或学舍、睢阳学舍）也应是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睢阳学舍”命名亦有根据，应天府书院创建之初，时人还有时称应天府书院为睢阳学舍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三收有他在应天府书院求学时的一首诗《睢阳学舍抒怀》，既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为睢阳学舍。今有人称戚同文讲学为“南都学舍”者（见：河南书院教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北宋时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特色（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应天府书院研究（D）·河南大学·2013年等），时为应天府的宋州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始升为南京，这以后才有“南都”之称，五代至宋

初的戚同文讲学时期，何来南都？又何来南都学舍？亦有称“归德学舍”者，虽然五代后唐的同光元年（923），驻守宋州的宣武军改称为归德军，但作为军事驻地，并非地方行政州府，只有到了金、明、清三代，此地才有“归德”州府之称，所以谓戚同文学舍为“归德学舍”者似乎不妥。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学。经金至元，下传至明清两代，继承先贤而文脉绵延未断。明嘉靖十三年（1534），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蔡爟，拣郡中名士李昆等十二人，及属邑若干人，曾以象贤祠社学房舍聚郡中学子肄业其中，题匾曰“应天书院”，有意重振北宋应天书院盛业。昔蔡爟在此留官很短，未及大成。明万历年间知府郑三俊创建范文正公讲院，至清而发扬光大，实承范仲淹应天府书院讲学精神。这一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或称范文正公书院），于今日在商丘古城南重建之应天书院，即接续明清讲院之文脉。为此，以北宋之后宋地州、府之学及应天书院、范文正公讲院之发展，可作为应天府书院的余绪，而立载入应天书院史志的沿革研究。

二是应天府书院发展史上有大量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清理、辨证。如关于先师戚同文的生平及授徒事迹问题、戚同文五十六位名弟子问题、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历史真实问题、应天府王洙、王洙家族与书院的史实记载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石介、孙复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及后世文献的谬传与疏漏问题、应天书院英才与北宋政治问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史书记载相互矛盾，有的史实资料难以稽考，有此史迹不见完整记载而零星散见于南宋与宋以后的文献中，以至真伪互见。为此，书院史志研究要做一些辨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以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问题为例，从南宋至明清，直至当今，仍然存在着关于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关系的一些错误历史认知。如范仲淹的师承问题，《宋史·范仲淹传》、宋王应麟《赤城书

堂记》（见《浙江通志》卷二六一）、明王鏊《姑苏志》卷四八《人物》六、《续通志》卷三三九《范仲淹传》、《江南通志》卷一八《人物志》、康熙刊《范文正公集》附《范文正集补编》卷二《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等，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学”之说，以致历代延袭，个别当今学人亦有不加详考，持是说者（见《简明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7.）。其实范仲淹入应天书院读书时，戚同文已去逝二十余年，何来“依戚同文学”？再如，北宋应天书院与商丘明清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的承绪关系不清，甚或混为一谈。由于范仲淹显赫的历史影响与高尚的人格品位，后世对其敬仰；再加上他不仅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又曾执教应天书院，成为书院名师，以致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郑三俊为归德府知府，建范文正公讲院，文人便把北宋应天府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宗师是范仲淹，应天府书院传承的是范仲淹之学。这种错误认识自明清以来，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应天府书院”之名在北宋历史上的存在近二十六年，而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掌教不足两年，怎么能认为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呢！

三是面临并必要解决的还有五代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典籍缺失，文献难征问题。宋州地处中原，五代政权迭相更替，战争频乃，公撰私述的文献留下很少，几成空白。最早宋州办学的杨恂，学力深厚，能诗文，虽早逝，弟子戚同文也会为其整理文集，但杨恂著述早已荡然不存。五代中至宋太祖、太宗时期，戚同文高隐不仕，聚徒讲学，《宋史·戚同文传》说他“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16]，曾与当时名诗人杨徽之唱和。戚同文两个儿子戚维、戚纶及孙舜宾、舜臣等在当时皆有集。特别是戚纶，据《宋史》本传记载，“既没，家无余赀。张知白时知府事，辍奉以助其丧。家人于几阁间得《遗戒》一篇，大率皆诱劝为学。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议有机务利害、备边均田之策，别为《论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宾献之，诏赠左谏议大夫”

^[17]。但戚氏的这些文集都散佚无传。戚同文作为高士名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宋史·戚同文传》记载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张昉有史材，滕知白善为诗，郭成范最有文。还有戚同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见前）这些友朋弟子，大都身后有集，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砺而言，他雅好诗文，他的儿子涣、浚、渊、冲、泳、洙，有五人进士，孙稷臣、堯臣、梦臣等，皆进士高第，响誉文坛，而王氏文献存者甚少。这些文献的散佚无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另在应天书院、府学三十余年的运行过程中，当时书院的一些典章制度、档案文献亦荡然无存，资料勾稽困难重重。

四是史书记载及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记述，亦多史实抵牾，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存在艰难的辨伪考证问题。如《宋史》有关戚同文、戚维、戚纶等资料的记载，就戚同文卒年问题，戚维、戚纶仕迹问题，一部史书自身就存在相互矛盾。有些史实与时人文集记载互为印证，又不尽一致，甚或差异颇大。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关与戚氏兄弟的诗文，与《宋史》有关记载的不一致，即是如此。再如两宋之交应天府谷熟县学者徐度，他在《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初书院初建时的一些史实，认为宋建国之初，是“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并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18]。徐度是本府学人，对先辈史实记载却明显出现错误。府民曹诚乃戚同文卒后约二十年，于大中祥符初年前后，即同文旧居旁造室百馀楹，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那来“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之事？徐度对本地先贤的史实记载还会出现这样错误，其他文献就不待再言。如宋吕本中撰《童蒙训》卷下、《浙江通志》卷二六一《艺文三·记》载南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等谓范仲淹、富弼皆师事戚同文等，皆讹误相传，亟需一一辨证。

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一些出版的学术著作或期刊文章、或硕博论文，为繁荣应天府书院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有些论著存在史实臆断，甚或毫无文献依据、或对历史文献中的误谬资料不加考证而引以为据，其说又为后来学人互为引用，陈陈相因，造成史实混杂，真假不辨。为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有关应天书院研究的成果，应有一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以上就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略述看法，仅发其端，以求抛砖引玉，盼望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一课题，使研究能逐步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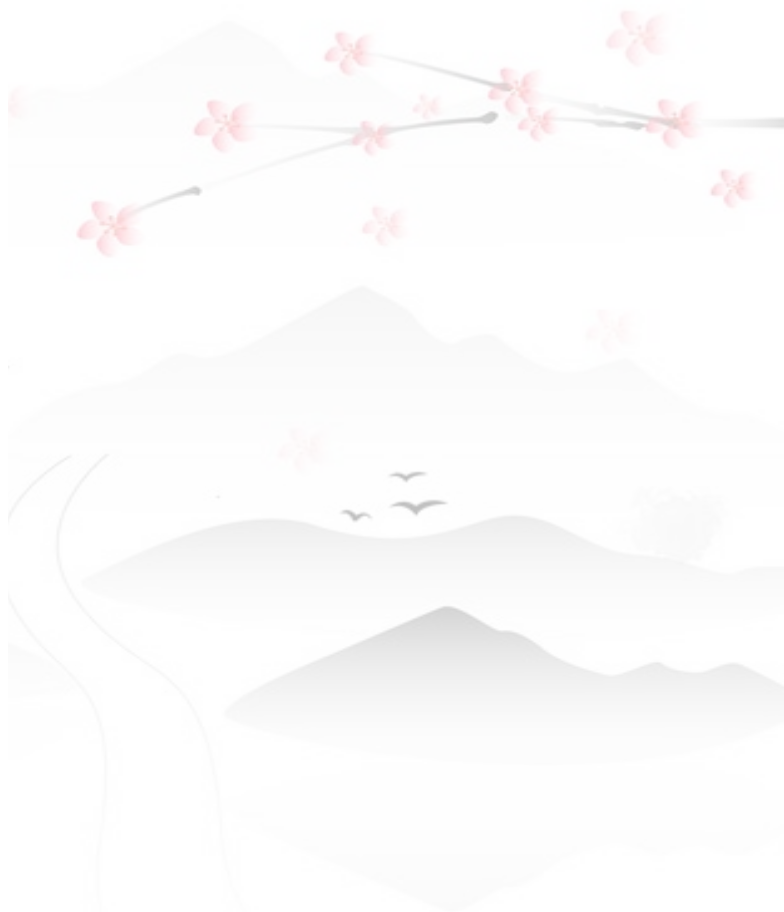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树林（1956- ），男，河南商丘人，1982年1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南通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广州华商学院语言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 [1] 袁枚. 随园随笔. 卷十四书院 [M]. 光绪石印本：16-17
- [2] 刘昫. 旧唐书. 卷四三职官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851.
- [3]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卷四七百官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1212.
- [4] 李昉., 文苑英华, 卷一六八应制一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1334-498, 499.
- [5] 曹寅. 全唐诗. 卷三七〇吕温 [M] // 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1426-565.
- [6] 邁柱等. 湖广通志. 卷二三衡州府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531-747.
- [7] 陈谷嘉,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 上册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9：23.
- [8] 释文莹.. 湘山野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16.
- [9] 徐锴.. 陈氏书堂记.. 《江西通志》卷一二〇《艺文·记一》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1989：1426 - 565.
- [10] 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十四梁书 [M]. 北京：中华书

局. 1976：191.

- [11] 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三四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371-372.
- [12] 吕祖谦. 东莱集. 卷六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1150 - 53, 54.
- [13] 魏了翁. 鹤山集. 卷四八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1989：1172 - 537.
- [14]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4.
- [15]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四六 [M] // 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 1987-1989：611-120
- [16] 脱脱. 宋史. 卷四五《隱逸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18. [17]
- [17] 脱脱. 宋史. 卷三〇六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07.
- [18] 徐度. 却扫编. 卷上.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119.



论朱熹与浙东学派及五峰书院

□ 王立斌



我曾多次有幸应邀参加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举行的中华明招文化及书院高峰论坛研讨会，后又考察了五峰书院遗址。

浙东三派合流永康之有五峰，犹信州之有鹅湖也。五峰多次会讲，早在南宋就盛极一时，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激于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此时的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学派迭起，书院林立。金华素有“小邹鲁”之誉，永康也向称文化之邦。这时，南宋时的中国思想界群星璀璨：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主持了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相论相争构成的“鹅湖之会”的调停。与朱熹激辩“王霸义利”之争的陈亮，视他为最可

敬的兄长，在浙东范围内吕祖谦、陈亮、叶适崛起于浙江东部，开创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形成三足鼎立，三派合称浙东学派或婺州学派。陈亮倡导事功之学，他们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在自然五峰的秀水灵山、洞天福地就成了他们讲学布道的理想之所、首选之地。

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经过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积极运作，力主抗战恢复，斥诉苟安和议，已成为士人的主流思想。王学（王安石学说）冷落、而道学大盛，形成了以朱学、陆学、吕学及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康、永嘉两个浙东学派的代表、张栻“湖湘之学”竟开局面。各派之间命尊二程学，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互唱和，又相互砥砺，促进了道学（理学）的繁荣发展，成为道学史上的黄金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闽学由为盛行。并于淳熙二年首开了以吕祖谦领头调合的朱、陆“鹅湖之辩”后，又引发了朱子与永康陈亮“王霸义利之争”，而这场争辩延续了十余年，尤其是前三年（淳熙十一至十三年）。争论对立明显，开启了朱子对浙江吕、陈、叶三派（简称浙学）事功之学的批判。实际上，吕祖谦更倾向于陆九渊的心学，并力图以“心本”来统经学、史学，实学为一。由于他在浙东学术成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使其心学、史学、实学成为浙东学的基本特色。

五峰讲学始于寿山棲真洞，“吕子旸开其端”时少章（吕祖谦门人，宋宝祐元年（1253）进士）曾题岩石刻云：“东莱吕伯恭先生，淳熙中讲道明招山，四方从游者常千人，分处于婺之北山、武义之九峰、永康东诸名山。”^[1]吕祖谦讲道明招山，首于宋乾道二年（1166）为母守丧。“四方之士争趋之”。后乾道九年（1173）又结庐守父丧于明招山侧，“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门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陆九渊曾对吕祖谦在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生”。孝养心性保重身体。在此同时，信州玉山汪应辰（吕的老师）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但又感到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以遽已，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年底。第二年，淳熙元年（1174）“吕祖谦遣散所有问学诸生”^[2]（潘富恩、徐余庆等）。吕祖谦为遣散诸生煞费苦心，是年冬，函问陈亮：“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讲贯者否”？陈亮回答有，其人即“少负志节，受学于林和叔”，与陈亮、叶适相师友好的吕皓，后为浙东学派做出很多贡献。



吕皓，字子旸，号云溪，永康太平人。吕氏家道殷富，“出粟赈济、受知仓使、朱晦庵特荐于朝，补郡文学，淳熙年间中举，上礼部”。前此，他已授徒于寿山石洞，这正是吕祖谦散遣学生分处五峰的基础所在。经陈亮、朱熹的推动，自然水到渠成。而这时，叶适也经常来永康，常往来龙窟与五峰间。吕祖谦分处学生于五峰后，“陈同甫介绍叶适前来游，众人景附。吕祖谦与其弟吕祖泰常往来五峰书

院讲学，陈吕门人翕然向往”。^[3]“五峰书院自宋云溪府君，受朱夫子之知，偕叶水心、陈龙川、吕东莱诸先生讲学于此。因置田石鼓寮以资馆谷，若东主焉。”^[4]吕皓不只是吕东莱“共讲贯”的同志，更是办学场地和经费的提供者，像主人一样恪尽职守。为五峰书院讲学，为吕东莱、陈亮浙东学派起了承前启后的奠基工作，可说是功不可没。

朱陈会讲五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五峰有幸，浙学大儒吕东莱、陈龙川、叶水心三学派的开创者，齐聚五峰书院讲学论道。读书明辩“王霸义利”的战和之辩是。吕云溪、潘文叔、时少章等与之互为师友参与学术展示。一时间，乡人景附、门人向往、学者云集，学子遍及浙东。五峰书院横空出世，名震遐迩。淳熙八年（1181）八月，吕祖谦不幸以四十五岁英年早逝。淳熙九年（1182）春正月，朱熹为失去一位同道挚友，前往吕府哭陵。秋天朱熹授命担任浙江常平茶盐提举按台过婺至永康访陈同甫先生，应邀讲学于寿山石洞。五峰书院请晦翁作主讲一时轰动浙江大地。从游者数百人，盘桓累月，朱子对寿山天趣逸发，清奇幽深也情有所钟，留恋不舍，欲屋精舍于此，后因事数月后离去。朱熹是：“集诸儒之大成”的赫赫理学术权威，在此讲学过程中完成了他的《大学章句集注》的著作。陈亮小朱熹十四岁，请朱熹先讲，朱熹就不客气地站起来便说：“世界可分成两个，一个是理性世界，一个是人欲世界。在心性方面，也可分为‘道心’与‘人心’；在历史上，三代之时是理性时期，汉唐以下，是人欲时期；世界到了汉唐，人欲横流，天地闭塞，间有英雄豪杰做一二件好事，也不过暗合于理性，揣其本心，仍是出于人欲之私。至于具有理性的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孟子。盖子以后，道统失坠，理性不复存在。汉高祖、唐太宗做得虽好，也不过在天欲界里头，‘出头没’，终是不合于天理，不契于道心。”^[5]“在行为方面，我的主张是‘静’，是‘无为’……”^[6]他出口成章，也有长者风度，但讲话让大家看来有个特别别扭的毛病，爱搔头皮。他不用五指去搔，而是用右手的小拇指搔，一搔，雪花似的头皮屑便纷纷飘落，细看时，那小拇指的指甲足有半寸长，

使人生厌。

接着是陈亮说，他的讲话内容与朱熹完全针锋相对，他的腔调总是那么慷慨激昂。他说的意思是：

“天地间这个‘道’，是不生不灭始终存生的，在三代之时，这个‘道’固然存在，就是到汉唐以下，这个‘道’依然未消灭。所谓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赤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道’是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所以认定三代之时固可为法，而汉唐以下也未始不可以做标准。在行为方面，我认定‘道就存在于现世界里，所以就应该‘动’，应该努力去找寻，应该努力去作为。现在宋室偏安不是没有办法，问题是要‘动’，用‘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7]的气概去争取！”陈亮的话音一落，生徒报以热烈的掌声。



心地宽宏，有兼容并包之慨的吕皓，见陈亮与朱熹冲突起来了，就排解说：“两位仁兄的见解各有千秋，值得鄙人学习！”他抬眼扫视一下朱熹、陈亮，然后对大家说：“现在二位先生都已劳顿，暂且散学吧！”

朱熹与陈亮虽是朋友，但在学术上有根本不同的观点。朱熹是理欲二元论者，陈亮是唯理一元论者。在行为上。朱熹主张“静”，提倡“无为”；陈亮主张“动”，提倡“事功”。

在课堂上，他俩虽然作了无情的论战，但一下课就握手言欢。陈亮还陪同朱熹，吕皓游览了擅泉石之胜的石鼓寮；峰峦拱秀，深壑鸣雷的仙霞瀑布；黑岩隆起，憨态可掬，石洞毗连，前后贯通，可容1000多人在石岩腹中的灵岩福善寺，又游览了平地拔起，壁立如削，云封雾锁，蔚为奇观的浙东名

山胜地方岩。朱熹、吕皓均赞不绝口。之后，来到了五峰屏列，四壁丹青，覆崖为瓦，洞府宽敞的胡公家庙观尝。

陈亮开创事功之学：

陈亮上《中兴五论》失败后，益力学著书十年（1169-1178），在理学一统天下的学术界，他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开创事功之学。人龙文虎，一场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王霸义利”之辩，就此拉开序幕。陈亮摆开“堂堂之阵”，树起“正正之旗”，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势，对在金兵大军压境，国家处于危亡之秋，仍然对“风痺不知痛痒”的理学，发起挑战，展开交锋，从本质论上进行批判。五峰书院上空电闪雷鸣、硝烟弥漫。此时，朱熹视事功之学为异端、怪论，但“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8]这场论战持续了十多年，这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五峰书院，作为古代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的载体的平台，它与鹅湖之会后的鹅湖书院又是一浓墨重彩的一页十分相似。闪射着不朽的光芒。朱、陈学术思想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但两人私交极好，他们的风范，令人称敬。这次讲课会讲的历史烟云早已消散，五峰书院“陈龙川、朱晦翁、吕子旸尝同游”的龙川亲笔题赋，已漫灭不可寻的摩崖风化中。而朱熹手书“兜率台”三个大字，摩崖遗迹依然，完好如初，展示给后学。

淳熙十一年（1184）春，吕皓父兄因陈亮遭人构陷被牵连同下大理狱，他弃官疏财，奔走解救。五峰书院讲学虽在东莱弟吕祖泰和潘文叔、时少章等人的努力下再支撑了一段时间。后来，时少章题岩时慨叹“愧莫之续”，无可奈何地“有待闻风兴感者”奋起了。五峰书院，因吕子旸了却家事，“再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犹接东莱，晦庵二老之流风”^[9]再度隐居桃岩山中讲学，与陈龙川往还相交讲学。父母继歿，尝割兄弟所辞让的田产，为义庄义塾以贍教乡族。吕皓为开五峰讲学，继五峰文脉于发扬，功不可没。随着蒙古族的崛起，一二七九年与金对峙百余年的南宋小朝廷被元军打败，多少北伐雪耻之士，梦断西湖烟雨之中。随着王朝的交替更迭，五峰书院也归于沉寂，寿山石洞

也成瞻仰游观之地。

姚江学派崛起是浙东学派的延续：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五峰书院宋后历元，陆沉绝响，时至明代中叶，正德十五年（1520）程文德礼试不第，来到“距家数里许的寿山，洞内的五峰书院遗址，发扬当年朱晦翁、吕东莱、陈龙川诸公讲学之所。聚同志友肆业其中”。正德十六年（1521），二十五岁程文德，“恨立志不笃，屡奋屡废”，“因书痛惩条目十款，谓《益斋砭剂》，于仲冬十日焚香拜誓于五峰书院”。^[10]而此其间，程梓和周厚峰也筑室五峰洞中，交相砥砺。维时，姚江学派崛起于浙东。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学者趋之若鹜，风靡一时。“其学传至永康，则公官南都时，周宝峰先往师之，厥后如李东溪、应石门、卢一松、程文德、程方峰诸公等数十人，闻风而起。”于嘉靖三年（1524），造阳明先生之门受学。“阳明大悦之，相与讲明致良知之说。”而后永康诸生群起师从王阳明，诚一时盛事，为他邑所无。阳明子曰：“吾道东矣。”程文德在重建五峰书院讲学后，自己投拜王阳明学说，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于嘉靖八年（1529）考中进士，被钦定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诸生得阳明之旨，尚宝丞、应典养病居山外，乃与卢一松、程方峰续讲会于五峰，集诸生讲授，从游者常百余人。联翩鹊起，衢、婺，括苍诸郡邑土，翕然向风，来从学者日益众矣。“婺之文献，至是为一再盛。而良知一脉，五峰之所独盛，非他邑所敢拟也”。^[11]五峰书院文气复振，文脉绵延。五峰书院，“兜率台”，为招提寺内宋朱晦庵题、吕东莱、陈龙川讲学旧址，台无舍宇，且隘，不能容。学者往往露居岩穴间，安所心就读。司丞公乃谋诸方峰、德基、侯壁诸生各捐资若干，“卜台侧隙地，重修讲堂，士子号舍数十楹，其奥以祀朱熹、吕祖谦、陈亮三先生，增建藏书楼，藏书、讲义、学规而前庑以居四方学者”。^[12]正德十六年（1521）动工，嘉靖元年（1522）始成。郡守张钺题额曰“丽泽祠”，程尚斐题联曰：“学术启良知恍示鸢飞鱼跃，讲堂开胜地何殊鹿洞鹅湖”。金华知府郡守姚文韶作《丽泽祠碑记》。于此，五峰书院讲学始有舍宇。嘉靖十二年（1533），

县令洪垣偕郡守姚文韶礼访石门于五峰，姚公檄县主洪公撤去罗汉像，府、县两台捐俸，吕子旻后人也慨捐数百，直洞之正中，扩建五峰书院。洪命耆老吕璵购材兴工，建楼数间，以广来学者。洪公升任，嗣尹甘翔鹏继成之。



耗时三年，书院于嘉靖十五年（1536）竣工。初名“桃岩丽泽精舍”，洪垣有记。郡守陈京题额“五峰书院”。^[13]其时，程文德待次祭酒与友周桐，应廷育会聚讲学，以祠隘，且张陆、朱尝至山，遂定祀朱、吕、陈三子，即书院为“三贤祠”，岁祀期定以重九，并为讲会之期。先是应、程、卢三姓创置会田以资岁会，此后相沿不变。由是学子益蒸蒸奋发，讲会也日加兴盛。书院的不断发展壮大，明季永康游川人，周佑德，又捐造“学易斋”于书院之右。至此，五峰书院祠分三区，名定制成。正当书院蓬勃发展，渐入鼎盛之时，不想就在嘉靖二十年（1541），发生了一起关系书院存亡的大事。事缘卢一松（德卿）以理学授徒于兜率台，因寺僧夺舍居之。僧兄胡某为地方豪强，辱一松而交恶。一松具疏之官，疏署程梓于首。那时，嘉靖采纳御史游居敬的建议，对书院进行禁毁。胡乡豪赴御史台状告程梓及一松等建淫祠，倡伪学，簧鼓士心。御史原本怀恨王阳明，对道学也向无好感，就贸然判程梓等所办的五峰书院是伪学。程梓、卢一松、应清、陈恭、吕成章五人蒙难，被革去生员功名，禁废五峰书院。这本是一起普通的纠纷，不想在当时的气候下，竟演变成一场学案。卢一松以疾辞，程梓备受“笞掠窘辱”，独对公堂，“讯及德卿则亟为辩之，”^[14]始终大义凛然。程梓五人时称“五

君子”，他们为捍卫阳明之学和五峰书院的神圣和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程梓的《普诉词》更是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这起学案，历经三年。四方学子义愤填膺，礼部尚书黄绾、布政使应良等均均为辩白，最终督学孔公查明实情，“赫然惩胡之妄”，程梓等昭雪平反，复为诸生，祠鼎新祀朱吕陈三先生，五峰书院得以恢复。事后有人问程梓：“德卿实基祸而子为受恶乎？”^[15]公曰：“吾平生言学，今日乃实践耳。吾居其罪足矣，何以德卿为哉！”真乃“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表现了五峰书院学人的风节。对程梓等“被诬系狱”，程文德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鼓励他们“患难厄穷，无非增益不能之地，昔皆想象，今则实际矣，真能自得否？试一体之，即拘系光阴，不落空虚也。”经此洗礼，师生豪气倍增，五峰书院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暨宋庆历党禁的又一次明代版的书院学案。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诚如程懋纲先生所言，“近年兵荒以来，道脉仅延一线。”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五峰书院又恢复了蓬勃的生机。乾隆四十四年（1779），应、程、卢三姓议决对年代久远的五峰书院三祠进行重修，程兆选主其事，九月事成，撰有《重修五峰书院记》。第二年，兵部右侍郎，两浙学政彭元瑞题款“丽泽如新”。学易斋，亦于乾隆四十五年捐（1780）修。五峰书院修葺一新，复现昔日兴旺景象。

薪火相传是五峰书院传承的发展：

五峰书院人文荟萃，薪火相传，会聚历代多少圣贤先哲，造就多少学子精英。历届主讲席者，不说宋时朱熹、吕祖谦、陈亮、叶水心、吕皓等等，

就从明嘉靖，历清乾隆近三百年间，应典、卢一松、程梓、杜见山、陈春洲、陈诚源、吕渊潜、陈蘋斋、赵岐宁、王同雍等等都是恭德慎行、学有专精的名师硕儒。他们授徒讲学，诲人不倦，研究切磋，著书立说，为传道育才呕心沥血，厚德流芳、名著千秋。应典，号石门，人皆称为石门先生，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清修耿介、学行可嘉，望重时人，开五峰讲会之先，众望所归，为群贤之首。卢一松，与方峰公同受业于王文成，刻苦精思，尽得其旨，潜心学问，讲学授徒，其《光余或问》、《望洋日录》，既是课稿，也是学术著作。五峰书院向来尊师重道，即书院为祠，凡书院主讲席或有重大建树者均可崇祀于祠。熔礼祀先贤与讲学、讲会于一炉，承先哲之绪，开后学之基，札祀先贤之日，亦即讲会之期，这是五峰书院的一大特色。讲会，实则是学术研究的高级班和交流会。先是春秋二会，康熙二十三年（1681）始，罢春会单为秋会。祭祀和讲会，有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会规，並置田为经费的保障。届时与会者踊跃参加，周四泉先生“礼为乡饮宾，一赴不再至”，“病且困，犹曳杖赴五峰会。”东阳陈诚源先生“箪瓢屡空”，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讲会递传不替，历久不衰，造就了大批人才，涌现了见解独到的著作，营造浓厚良好的学风，盖百年文献之所寄也。

自宋历元明清，五峰书院承浙东文脉所系，关乎国家社稷。它的盛衰，折射出国家的兴亡历史。

“书院兴则人文聚，人文聚则讲论精，讲论精则大道明”。这是浙东学派的一脉传承。书院于治国兴邦至关重要。五峰书院是宋浙东学派的“婺学”、“永康学”、“永嘉学”、大本营。五峰书院在永康历史上两个思想文化高峰的发祥地。自清光绪28年末，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书院废止。五峰书院就成了永远是浙东人民的一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丰碑，是儒家道统传承的示范基地，是永康人民的永远学术标杆。

作者简介：王立斌，江西省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原副主任、书院院长、研究员，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研究员，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书院研究中心研

究员，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博与书院文化研究工作。

陈亮收到辛弃疾的《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以后，十分感动，并合了这首词。

参考文献：

[1] 《宋史》卷 434 时少章、题岩石刻于寿山棲真洞。

[2] 《吕祖谦评传》

[3][4] 吕瑗《重建五峰书院记

[5][6] 清程尚斐《五峰书院志》摘录《龙川文集》

[7] 陈亮《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辛陈鹅湖之晤”

[8] 叶适《龙川文集序》

[9] 吕皓《水心叶先生哀辞》

[10] 姜宝《松溪程先生年谱》

[11][14][15] 程兆选《重修五峰书院记》

[12] 清程尚斐《五峰书院志》

[13] 吕瑗《重修五峰书院记》

●学术动态●

淮海经济区高校书院制卓越人才培养共同体第一届年会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

为推进淮海经济区高校书院制卓越人才培养，进一步提高淮海经济区高校办学质量，7月1日，由商丘师范学院主办，人文学院、教务处承办，商丘古城文旅集团和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的淮海经济区高校书院制卓越人才培养共同体第一届年会暨人才培养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来自江苏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临沂大学、周口师范学院、商丘日报社、商丘古城文旅集团和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的近30位领导、专家莅临本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商丘师范学院校长陈向炜、副校长郭文佳、教务处处长韩桂玲、副处长麻陆东、科研处副处长郑向杰、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孙旭、归德书院党委书记陈华以及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应天书院）班子成员和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副校长郭文佳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陈向炜校长首先致欢迎辞，对百忙之中拨冗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的领导及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绍了商丘师范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我校与北宋应天书院的脉传关系。随后，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钱进教授致辞，指出共同体的成立不仅把淮海经济区高校紧密联合团结起来，而且对于淮海经济区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共生共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必将有力推动淮海经济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快速发展，也必将为苏鲁豫皖四省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结束后，江苏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生科院党委书记汪颖教授与商丘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韩桂玲教授共同主持了学术研讨。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淮海经济区高校书院制卓越人才培养、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教育、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以及其他有关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多个视角阐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整个研讨会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

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中，商丘古城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马发营、人文学院（应天书院）院长高建立等，就南湖应天书院发展情况以及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教育的结合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学术研讨结束后，商丘师范学院副校长郭文佳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表示，此次会议内容丰富、立意深远，与会领导专家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淮海经济区高校卓越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对于加强淮海经济区高校之间的合作，推进经济区高校的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文化的守正创新与一流大学的本土构建

□ 赵亮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惠泽华夏，造福当今，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虽然教育模式几经变革，书院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是深厚的文化影响力，一直是国人心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印记。建设一流大学固然要以欧美大学为标准向其看齐，但不能简单断言欧美大学模式就是中国大学努力的方向。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可追溯于108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大学之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现代的教育体系，成为知识传承、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如果我们仅仅以清末学制改

革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起点，不仅仅是对中国千年文脉的割裂，更是忽略了我国本土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文化根基。在我国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宋的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和教育文化。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溯源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弘扬和传承书院文化，打造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突出的价值。

一、坚守学术理想立一等学问

书院是古代的学术基地，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乃至近代新学，都是在书院勃兴和发展的。创新学术或者说发展高深学问既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千余年来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书院主持者研究传播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师生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因此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逐名利，师生多数厌恶科举、淡泊仕途，隐居山林胜地，超然观世事，冷言论朝政，以清高脱俗、持志守节相标榜。由于书院不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学术成果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学术的教育基地。

当前高校科研精神培育的主要障碍是功利主义

的影响^[1]，科技工作的运作模式缺乏“杰出人才”的出现和成长的土壤。基于此，很有必要学习借鉴书院主持者的定力和气魄，以承受科研的长期沉寂，回归高校学术研究主阵地之尊严和权威，最大限度发挥高校学术研究社会价值。

书院山长学高为范，名声卓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辉煌的。他们曾被塑造为坚持真理的超人，在人格上高于普通众生的精英，为知识、为某种价值和信念随时献身的文化英雄。学术自古以来就处于崇高地位，古代士大夫把对学术的追求等同于君子对义的崇尚，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今天的高校科研工作者，应怀着对学术的敬畏和热爱，使学术研究去功利化，重树学术研究的威信，重建学术研究的尊严，发挥学术研究为社会发展进步和人们福祉提高的作用。

二、坚持学术立教育一流人才

书院多是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二者的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以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教育内容，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并将从师学习与个人学术志趣紧密结合，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了学术研究与读书讲学融为一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独特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形式。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人才和智力的决定性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关系疏离和淡漠、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足、大学精神日渐衰落等弊病也开始显现。高校师生关系表现出“物质化”“工具化”“平淡化”的倾向^[2]；人才培养过程中过分强调高荣誉、课程设置过分强调高难度、滚动机制过分强调高分、学生价值理想过分功利

化、校园文化过分追求形式化等“不实的卓越”；受工具理性、评价导向等影响，教师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较多，而对教学存在着忽视、放逐、遮蔽等价值自发现象，出现了教学中心地位动摇、教学价值认同缺失、教学学术理念缺位等问题，导致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教学危机。鉴于此，需要引导高校教师充分认识教学理想的重要性、自觉加强教学反思、提高教学自信，深刻把握教学的本质及其价值、理解和扮演好教学者角色、树立教学学术理念，扎根教学实践积极主动作为，包括在教学实践中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培育教师主体性、提升教学能力，营造与构建高校教师潜心教学的文化，打造良好学术生态、培育高校教师教学专业文化与学习型高校教师文化。

书院山长为名师大儒，通过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学习包括经史之学在内的致用之学，这与当今倡导的教育家办学理念十分吻合。学术立教不仅指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方法，发现和掌握课程特点，把握其学术背景和应用领域，树立方法论教学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热情，提高学习效率，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安排、教学方法的创新与运用、教与学的交流互动、教师对教学结果的反思等多个方面体现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恰如其分融入到课程之中。培养学子首先在于育德，立德树人成为永恒不变的精神内核，要求择善而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书院山长书院教学的特点，如教学内容比较灵活多样，学生各有专长，师生关系比较和谐、融洽；纪律严明，礼法威重，风气井然；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这对于扭转短视性、片面性、简单性的教育功利化倾向^[3]，促进学生自由充分发展，培育一流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世界高等教育目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高校也积极在更高层次参与竞争，比的是怎么让学生能全面发展，在大学打下坚实基础；比的是谁培养的本科生，走出去能更好地引领社会发展，更好地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这是一种新的目标和境界，对学术立教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勇于探索开辟服务新领域

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与科举制度、思想教化、文学发展、地方治理等领域发生了深层次的互动，在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塑造、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公权与私人领域的平衡发展中，自我发育，生长调适，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可以说，成为中国文化的隐形中心。书院不同于祭祀化的官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它演变为一种准行政机构，是国家与社会、官方与绅士、公权和乡贤领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官方民间各种角色所普遍接受，更便于处理面向社会领域而非纯粹行政部门内部的公共事务；在中西文化互动中挺立主体，随时因应，良性互动；发挥基层普法宣教、文化交流等作用，起到安定民心、滋养民生、稳定秩序的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高校社会服务政策上缺乏长远规划和分类指导，地域间、领域间发展均不平衡，参与程度总体偏低等问题^[4]，亟待明确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科学审视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发展面临的价值理性式微与工具理性错位问题^[5]，主动承担起培养社会服务主体的责任、积极转变科学研究范式、逐步淡化“交付式”服务供给模式、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路径，坚守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的信念，将高等教育强国的理念落到实处。

书院是在我国文化肌体内自然形成的鲜活的生命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适应性、包容性。书院制管理模式下的高校，坚守学术底色、注重参与多元化、明确服务边界、实现与社会双赢和开展错位竞争等特点。新时代高校推进社会服务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明确战略地位、强化特色定位体现差异发展、抓实关键要素提升保障力度、突出文化引领彰显内涵底蕴，进而可以更好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提供科技情报服务；以资源建设为基础，开展信息素质教育；以成果转化为契机，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等，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提供一流的人才资源、科研引领以及智力支持。

四、坚守使命开拓文化新境界

书院代表着一种文化品味和精神气质，是培育中华文化基因的空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地，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阵地，是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和精神标识提炼展示的来源和载体，推动了文化传播和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书院走向世界，并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文化教育机构都叫做“书院”；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将他们所目见的近代学堂、图书馆、实验室、甚至科学博物馆等，都称作“书院”而介绍给国人。中西士人对“书院”的这种认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书院交流中西文化的功效。书院在长期的发展中，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有功于中西文化交流。

当前部分高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因未能深挖文化基因而存在浅尝辄止的表层化传承问题，主要表现为空泛的传承内容缺乏文化基因滋养、机械的传承方式与文化基因传承要求相抵牾、形式化运作的传承过程未真正触及文化基因等^[6]。文化传承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沿既定轨迹运行，积淀为文化精髓和精神标识。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亟须实现由文化物象层的表面传承到文化基因层的深度传承转向，重塑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将文化基因植入传统文化课程，实现文化传承方式的环绕式沉浸化转变。

书院制管理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创新，聚焦于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与革新和世界多元文化吸纳与整合上，成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散地和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成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借鉴的要道和枢纽，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桥头堡，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中形成独特优势，在文化国际交流中形成独特的魅力，建设本土民族文化领域人文学科优势。

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高扬的今天，书院的教育理应充分发挥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开拓出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一方面扎根中华大地，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从古代的书院教育中汲取普慧、挖掘资源，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

结语

泱泱中华，教化绵长；煌煌天河，群星璀璨。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教育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长河中则一度是滔滔主流，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年代，不但要注重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发展特征，更要延伸这种文化的美好前景及其在当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不忘书院初心，守正创新优秀文化，守正就是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就是勇于探索、开辟新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唯有如此，高等院校才站在了教育的原点、学生长远发展的立足点、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点上，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近代致力于教育改革、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经常热心研究中国古代书院，从中吸取营养，寻找借鉴，更

有创办新式书院的尝试，书院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组织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辉煌灿烂的中国书院，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书院的文化精神、生命活力是永恒的。

作者简介：赵亮，河南柘城人，国际旅游管理专业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 [1] 于小娟. 试论“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科研精神 [J]. 中国高校科技, 2017, (S2): 10-12.
- [2] 陆林召. 高校师生关系功利化倾向及矫正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08): 47-52.
- [3] 崔保师, 邓友超, 万作芳, 李建民, 黄晓磊, 秦琳, 翁秋怡, 曹培杰, 杜云英. 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J]. 教育研究, 2020, 41(08): 4-17.
- [4] 李瑞琳, HAMISH COATES. 我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国际经验、现实问题与政策建议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 14(4): 96-106.
- [5] 李宏. 新时代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审思 [J]. 教育评论, 2023(1): 81-86.
- [6] 罗琴, 王华敏. 由“形”入“神”：文化基因视角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向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 (19): 59-62.

●学术动态●

我院陈佳伟同学在第九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2023年12月29日—31日，第九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决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由白茹冰、薛立芳、魏清彩老师指导的历史学专业2021级师范生陈佳伟在现场决赛中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全国一等奖。

“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是目前国内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中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比赛之一，旨在通过比赛培养具有高尚师德、先进教学理念、扎实教学技能的优秀教师后备力量。此次一等奖的获得是继2020级历史学专业张博文同学入围决赛并获得全国二等奖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展示了我院近年来以师范专业认证为契机，大力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彰显出我院师范生过硬的教学能力与专业素养。

• 应天史话 •

仓颉文化在商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和价值初探

□ 赵继彬 谷雨

一、仓颉及汉字文明

(一) 仓颉、仓颉造字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远古时代的文明中，仓颉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文明的代表性符号。“仓颉”二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它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密码？

仓颉，姓侯冈，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因造字有功，黄帝赐姓仓，仓的繁体字作“倉”，含有君上一人与人下一君之义。仓颉，俗称仓颉先师、制字先师、仓颉至圣等，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

《荀子·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也是二十四节气“谷雨”的由来之一。许慎《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也，初造书契”。“仓颉之作书，盖以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所以，“文”是最初的象形字，“字”就像是这些象形字孳生出的孩子，对每个字加上读音，就形成了汉字系统的雏形。

当然，文字的发明靠一己之力难为，必然是人们长期不断积累、不断传播的结果，仓颉造字的传说反应了仓颉是在汉字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安阳已经发现 3000 多个甲骨文字，甲骨文的发现虽在商代晚期，但多位专家研究成果

证明，甲骨文与仓颉文有很多相似之处。传说中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转注六种造字方法是仓颉发明的，据此推测，甲骨文是仓颉文发展演绎出来的是有道理的。

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轴线上，中原地区一直是文明的中心之一，沿着中华文明的轴线，我们能够读懂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密码，在文明前进道路上，从最初的刻符龟甲、彩陶图纹、刻画图腾，到仓颉作为史官造字，以及后面的汉字演变史，基本可以看出，仓颉造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是一个整合者、集大成者，实现了从符号、图纹到文字的嬗变，这是划时代的成果。在已知的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均没有延续下来，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一派相承，绵延发展。中国文字虽然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草、行等不同书体形式的变化，但以“六书”为特征的文字结构保留至今，成为今



天世界上约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文字，对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仓颉造字也得到了国际认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亚当斯大楼东侧铜门上镶嵌有仓颉雕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把仓颉定位为“中国文字的庇护神”。2010年，联合国将中文日定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正是为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二）从仓颉遗迹遗址分布看中华文明的源起

中原大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上古时期就是以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遗迹也遍布中原大地很多地方，就非常容易解释了。

仓颉遗迹和传说，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与黄帝活动地区大致吻合，二者有着微妙联系。全国比较知名的有12处仓颉遗迹，包括了仓颉墓、仓颉台、仓颉祠、仓颉墓碑、仓颉纪念堂、仓颉庙、仓颉双井等等，大体自东向西分别是寿光、东阿、南乐、苍山、虞城（现属商丘示范区）、开封、洛宁、洛南、西安、白水。通过观察以上区域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大部分位居黄河中下游，尤其以河南数量更多，这与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密切相关，或者说仓颉造字传说分布区域就是炎黄部落曾经生活、发展的地方，尤其是见证了中原文明为主轴的华夏历史文明核心区。

综上，客观表明仓颉在搜集和整理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游历过很多地方，这些地方自古至今都流传着仓颉造字的传说，并存在于文献、地方志、碑刻、诗词之中，这些构成了仓颉造字的普世性的民间信仰，也构成了仓颉传说完整的地理空间脉络，仓颉造字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国，这12处仓颉遗迹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可申请世界非遗的现实有力支撑。

公开资料显示，炎黄二帝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他们联合打败了蚩尤族，正式定居中原地区，后世称汉族为炎黄子孙。炎黄文化影响着周围的部落，又与东方、南方的部落逐渐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炎帝、黄帝也被尊奉

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两个部族起源于河洛之间，华夏文明从河洛地区产生并流传到四面八方。

而作为黄帝的史官，史官作史，始于仓颉，仓颉造字之说并非神话。

（三）仓颉精神的当代诠释

仓颉造字蕴含着仓颉精神，概括起来便是善于学习、开拓创新、专心致志、不屈不挠、立足实际。

1. 善于学习。仓颉是勤奋好学的典范，他通过观察鸟兽痕迹获得灵感，从而展开对结绳记事创造性的改进。犹如我们做学问亦如此，需要学而思、思而学，唯此，方可精进有提高。

2. 开拓创新。仓颉造字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作为史官，他不囿于常态，从鸟兽痕迹上发现创作文字的契机，凭借不断的创新，让文字从象形发展到会意、形声等多种记录表达方式。

3. 专心致志。《荀子》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独仓颉独传者，壹也”。爱好文字的人很多，而只有仓颉一人传世，为什么？因为仓颉能够统一于道。从古至今，没有心猿意马而能专精的，仓颉专一专注研究创造文字，得以传世，于我们而言，只有克服和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专注专一做事，才真正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进而成为某一领域的翘楚。

4. 不屈不挠。清代程明升所著《幼学琼林》：“上古结绳记事，仓颉制字代绳。”克服结绳记事的藩篱，创造新的记录方式，一定得克服重重困难和阻碍。在上古时期，只有少数史官、部落首领通过特殊的方式与神沟通，保佑生民安康，民众愚昧朴素的信仰就这样延续着，仓颉造字成功时，为什么会“天雨粟，鬼夜哭”？就是因为打破了传统的愚昧的与神沟通的方式，文字文明的力量感天动地，吓破愚昧。而仓颉就是那个打破常规，克服困难，不屈不挠创造新事物的代表。

5. 立足实际。据纬书《春秋元命苞》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叡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

而创文字。”仓颉天生异貌，能够穷究天地万物的变化，根据奎星园曲、鸟兽之文、山川之状，悟出世间的文理之别，创造了文字。仓颉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分，长大后能够从身边实际观察中参理悟道，进而完成了造字使命。不好高骛远脱离生活，不纸上谈兵，从实践中发现真谛，这也是做学问必备的素养。

仓颉是值得我们崇拜的文字鼻祖，仓颉精神是底蕴深厚、具有很大文化张力的修身治世宣言，也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亘古不渝的优秀文化滋养，催人奋进，发人深省。

二、仓颉文化在商丘

在全国著名的12处仓颉遗迹中，始建于汉代的有四处：河南南乐、河南商丘、河南开封和陕西白水。商丘仓颉墓祠在全国众多仓颉纪念地中有其独特地位：一是考古论证商丘仓颉墓坐落在4000余年历史的龙山文化遗址上；二是2500余年前的春秋时代，已有仓颉墓；三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已经建祠植侧柏，建有仓颉祠。从中不难发现，仓颉文化在商丘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底蕴。

（一）仓颉文化与殷商之源文化的关系探究

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是公认的文化中心之一，以宋国都（今商丘）为中心的一百华里半径圈内，活跃着老子、墨子、庄子、惠子和宋子等先哲群体，他们开创的哲学或思想成就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也给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何以如此？学界一般归因为商丘乃殷商文明之源。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商丘，是火文化的发源地，火文明催生人类文明的集聚、裂变、扩散是文明发生发展的正常规律。所以，我们有理由说火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较早的文字文明是殷商文明之源的基本内核。

1. 从时间线上解密仓颉文化与殷商文化的联系。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殷商文化的中心论学说，在考古学界是认可度较高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脉络。无疑，最早出现文明国家是在黄河流域，8000多年前的龟甲用途之谜，有可能就是一种文字语言的实物表达，6000-5500年前彩陶的兴盛，鱼纹、八面鱼纹、鸟花图案等的出现，昭示着

图腾文化一直延续并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形态。5000多年前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出现了最早的中轴线理念，从双槐星图的信仰到黄帝传说的出现，从结绳记事到书契再到仓颉造字，中华文明的演进始终是连续的，而且都充满着原始的宗教崇拜色彩。仓颉造字推动中华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仓颉文化是殷商文化的内核之一。

原商丘日报社主任编辑杨石老师在《我与仓颉的不解之缘》一文介绍：“据考古队1978年和1984年两次勘探，确认位于古王集乡（现属示范区）垌堆坡村西侧的仓颉墓，坐落在距今约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上。”也侧面印证了仓颉文化与殷商文化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

2. 从甲骨文窥见与仓颉造字的渊源。商族先民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高代文明，也承袭了先民创立的文字文明，最终衍化为光耀千秋的甲骨文。商字甲骨文解释是上面为鸟冠形，代表商族图腾是鸟，下部的“冂”像穴居之形，表明当时的居住形式，后人以其居住地为商。仓字甲骨文为仓的象形，上部像苫盖，底部像坎穴，中为进出的门，与商的甲骨文穴居之形表述有同工之妙。“仓”字始行于商代，“仓、商二字古音邻纽双声、同阳部叠韵，音近而假”，两者可通，且为音近字。由此可见，商、仓联系密切。仓颉乃黄帝史官，造字并主管祭祀，商族则以祭祀为头等大事。抑或是商族中有一部分贤者继承了仓颉造字的衣钵，让他们这个族群忠于祭祀并拥有了以文字为代表的高度文明。

3. 仓颉之颉与商族先人契有一定联系。契其本意是与刻木记事有关，与记录、契文有关，契读作xie，又被借为商祖名，显示商祖或商族与刻木记事，与文字的发明、创造有关。仰韶文化晚期，也就是黄帝时代，彩陶图案出现鸟花图案，图腾崇拜以及刻字记事和创始契文是他们的革命性实践飞跃，仓颉就是其中造字的代表人物，这为后来的商族拥有成熟、智慧的甲骨文字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则认为，“造字圣人”仓颉与商族祖先契可能是同一个人。仓颉之颉其一读音与契同音，这其中是否有尚待解析的文化密码，也未

可知。但商族契的时期，商族人沿着先贤的脚步对文字进行改革创新，开始了文契时代，使商族文明厚积到一定高度，这是符合发展逻辑并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商族的甲骨文在中国文字发明史上有巨大贡献，让中华民族历史的记载更加丰富和完整，这无不是对于仓颉造字、仓颉文化的一种延续。

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丘的仓颉墓祠在传播仓颉文化、研究殷商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商丘殷商之源考古工作的推进，未来从考古学上也许有更多关于商丘历史文化的新证据，将更加充实明晰商丘历史文化的脉络。

（二）仓颉文化在商丘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分析

火祖、字祖创造了火文明和文字文明，让人类进入了新纪元。因此，仓颉文化对商丘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撼动的根基地位，它是商丘文化的滥觞，深刻影响着商丘的殷商文化、汉梁文化、木兰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双忠文化、应天文化、状元文化、雪苑文化、红色文化、好人文化等在地文化，丰盈了商丘传统文化的内涵底蕴。作为殷商文化之源的商丘，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理变迁史、城市发展史以及考古成果等迹象表明，商丘厚重的历史文化正在被唤醒，逐步在复苏，相信它们在新时代定会焕发新的光彩。

流传下来的仓颉文化传说以及起源于汉代的商丘仓颉墓祠的存在绝非偶然，它一定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才有商丘民众千百年来的坚守和传承。商丘仓颉文化是全国仓颉文化的一份子，也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瑰宝，更是商丘兴文化、展形象，传承汉字基因、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三）市级非遗《仓颉的传说》赋能仓颉文化传承保护

仓颉墓和仓颉传说是主要流传于虞城县、市开发区、梁园区和商丘市城区的文化遗存和多种传承方式并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仓颉传说之仓颉造字开辟了人类文字文明。守护文化命脉，延续非遗活力。2021年1月，《仓颉的传说》列入第六批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结绳记事和造字传说。结绳记事是远古时代人类为摆脱时空限制记录事实、进行传播的一种

手段。它发生在语言产生以后、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年代里。相传，仓颉善于请教智者和百姓，善于思考，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黄帝知道了，便让他做了史官。那时候，人们认为人的命运都掌握在天地鬼神手里，因此祭祀是部落大事。一天，黄帝对仓颉说，“我掌管天下，事情太多，生怕有时忘了祭祀，给百姓招来祸灾，我想选一个记性好的人，把一年里所有祭祀的日子和事项都记得牢牢的，能够随时提醒我，您就干这桩事情吧。”仓颉答应下来后，觉得许多事情光凭脑子记实在吃力，便想了个结绳记事的办法：有大的祭祀，就结个大疙瘩作为标记；小的祭祀，就结个小疙瘩作为标记。为了区别祭祀时间，他在绳子上涂上颜色，春天的祭祀用青色作记号；夏天的祭祀用绿色作记号；秋天的祭祀用黄色作记号；冬天的祭祀用白色作记号。后来，仓颉把鱼、鸭、牛、羊、鸟……的形状画下来作为标记，逐步创造了象形字并固定下来，更加准确地记录事实。

2. 仓颉墓的由来。相传，孔子携弟子巡游时，途经虞城县仓颉墓地，看到一具裸露的颅骨，抱在怀中便跪地痛哭。弟子不解。孔子悲痛之余向弟子解释道：我怀中抱着的颅骨上面有四只眼孔，不是造字鼻祖仓颉，又会是何人？于是，孔子命弟子挖坑筑墓，将仓颉的尸骨重新掩埋。另一传说是该地位于上古九泽之首的孟渚泽西南岸一坳堆坡上，东周时期，下大夫出身的老子曾游历于此隐居，确认此墓为仓颉墓，仓颉墓所在的村名坳堆坡，老子隐居的村名李大夫庄村，至今仍在沿用。自此，当地百姓为纪念仓颉，在其墓前建祠植树，每年春季“谷雨”节举祭，历代香火不断。

3. 仓颉菊的故事。史载仓颉墓祠，“墓周生丛菊，清香可充茗”，明目醒神。这种菊花只能在仓颉墓周边方圆二三公里内生长，为仓颉墓祠增添了几分神圣和神秘。相传历史上，一位村民在仓颉祠的院里发现一种菊花，这种菊在深秋的时候开出或白或黄的小花，而且成簇成团，闻起来味道微甜。这位村民就用它泡茶喝。谁知这种菊花茶，不但香气浓郁，喝了还能提神醒脑，把他多年的眼疾也治好了。该村的村民听说这些事后，家家种植，村民称它为

仓颉菊。有一年，虞城县知县去拜谒仓颉，这里的当家人就给了知县一包仓颉菊。他回去一喝，觉得这种菊花味道独特，后来就拿它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皇帝问这菊花是从哪里来的，朝中官员如实上奏。皇帝听后就赐名该菊花为“仓颉菊”。每到菊花开时，这里的人们都会把第一次采摘的菊花供奉在仓颉像前。

4. 《仓颉的传说》传承情况简述。仓颉故事代代有传，可溯及的两百多年的传承过程中，一代代传承人秉持一颗赤诚之心，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汗水，传承人对于仓颉传说的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第一代传承人郑贵恩：原仓颉学校教师，已过世30多年。第二代传承人杨石：回族，资深报人，退休干部，老家距仓颉墓二里半地，他搜集整理了5则仓颉传说，并在报纸上发表。自2008年以来，他还潜心研究仓颉文化，先后在《商丘日报》《京九晚报》发表《仓颉墓与仓颉其人》《我与仓颉结下了不解之缘》《〈仓颉墓考〉辨析及其他》和《结缘仓颉》等长篇文章；荣金宽，退休干部，原仓颉学校教师。曾记录仓颉造字故事。第三代传承人赵继彬：原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老家就在仓颉墓旁的垌堆坡村，从小便在此生活、读书，耳濡目染，深受仓颉文化的熏陶，对仓颉传说耳熟能详，对传承仓颉文化情有独钟；蒋茂申，原虞城县古王集乡党委书记。热爱文化事业，修建仓颉文化广场，举办仓颉文化书画展等；谷雨，商丘社科联网商社科主编，对仓颉文化兴趣浓厚，用文字和视频宣传仓颉文化。

三、仓颉文化品牌的底蕴及潜在价值

仓颉文化在全国的普遍存在，证明了仓颉文化是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仓颉文化在商丘的生发及延续不仅是全国仓颉文化谱系中的重要一支，更是商丘传统文化浓重的一笔。仓颉文化悠远的历史以及其持续影响力是哺育豫东人民的不竭精神财富，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下，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创新机制下，仓颉文化品牌具有创新性转化的潜在价值。

（一）商丘仓颉文化的民间信仰基石

1. 拜祭祈福民俗历史悠久。在每年的农历三月

二十八（仓颉的诞辰），到仓颉墓祭祀的民众络绎不绝。人们纷纷捐钱捐物，以保护和维修仓颉墓、仓颉祠。周边群众在庙会上开展祭奠活动，已成惯例。豫鲁苏皖交界处的群众，祈愿子女聪明智慧，学业有成，幼子入学前、孩子高考前多去拜祭，已成为当地民俗。垌堆坡村被确认为河南省首批古传统村落。

2. 群众“讲古”传承仓颉文化。仓颉的传说源远流长，仓颉墓和仓颉传说的所在地垌堆坡村及周边区域几乎人人可言说与仓颉有关的传说，当地群众多以“讲古”的形式口耳相传。人们以朴素而鲜活的语言，讲述仓颉的事迹，赞美仓颉的功德，彰显了仓颉文化精神。仓颉传说内容丰富，故事感人，虽然带有神奇色彩，却反映了历代人民对字圣仓颉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3. 仓颉文化滋养教育事业。在仓颉精神的熏陶下，当地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在仓颉祠墓周围方圆几十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古到今出了很多名人志士。北宋仁宗时期的状元王尧臣，探花赵概皆出于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民众依托仓颉祠建起了学堂开办教育事业，后来又办起了仓颉中学，如今在其旁边还办有一所仓颉小学。周边村落在仓颉文化的护佑下涌现出一批批人才，他们有的从事科研工作，有的从事教育事业，有的是资深媒体人，有的是党政干部。这种现象与仓颉所处地域的文化归属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自信高度相关。

除此之外，仓颉文化还浸润着虞城的城市文化景观。虞城城区有仓颉大道，古王集乡有仓颉文化广场、仓颉塑像、仓颉造字壁画书法等。

（二）推动仓颉文化文化化发展

近年来，河南关于中原文化的创意表达频繁出圈，其文创产品也进入大众视野。《唐宫夜宴》、奇妙游节日创意系列、考古盲盒等等，一出炉便赚足了流量，带来了消费潜能，让传统与现代碰撞，手办、玩偶、盲盒受到年轻人喜爱，河南卫视广电媒体、考古院、歌舞剧院、文旅厅等机构联袂推出文旅文创文博重磅作品气势如虹，做出了河南文化厚重的底气，也增强了河南人民的文化自信。背后

是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术点亮、科技赋能，推动了文物遗存的具象化和活化。

1. 推动仓颉文化文创化发展，需要立足于商丘乃至全国文化市场的视野和高度。商丘的仓颉文化是仓颉文化在全国分布的一个支点，既有普遍性特征，又有商丘自身的特色。普遍性凸显了仓颉文化的影响力，商丘特色凸显的是在地化。我们应该首先把商丘自身的内功练好，多借鉴其他区域仓颉文化创新发展的先进经验，努力做出商丘特色。

2. 推动仓颉文化文创化发展，需要专家学者和熟悉文化营销的行业精英参与。文化创意的源头来自于对文化内容的深层认知，只有充分的、准确的、完整的将商丘仓颉文化系统梳理，才能为仓颉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源动力。文化营销也需要专业的人才去做，洞察新生代的消费趋势，需要传媒精英对文化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推广，从而培育市场，吸引投资。

3. 推动仓颉文化文创化发展，需要有符合当代社会心理和审美要求的高端文化创意。文化创意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舞蹈、曲艺、书法、绘画、武术、剪纸、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呈现，又可以融合盲盒、书签、文房四宝伴手礼、服饰、玩偶、挂饰等载体实物化，还可以结合国潮、复古、现代

等多元化风格。比如，我们可征集著名书法家的墨宝书写“天下文字祖，古今翰墨师”来推广文创书签、文房四宝伴手礼；仓颉文化亦可与剪纸结合；从历史名人记载的仓颉相关文献中提取仓颉精神元素做创意日历；我们的仓颉菊主打稀缺、稀有、古朴、概念，做成精细美的小茶包等等。

4. 推动仓颉文化文创化发展，需要包括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生产、包装等系列化设计。因为出众，所以出彩。好的原创设计能够吸引更多眼球，也更有品牌生命力，它关系到执行环节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予以系统思考。仓颉文化品牌全案设计应该是贯穿到文创产品线始终。

（备注：原文系商丘市2022年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本文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赵继彬，河南省商丘市社科联二级调研员，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商丘市第一届优秀社科专家；谷雨，河南省商丘市社科联《网商社科》主编。

参考文献：

[1] 中华文祖仓颉 赵守祥 人民出版社

[2] 仓颉文化研究 王国平等主编 中国仓颉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动态●

人文学院获批三项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近日，202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商丘师范学院共获批13项，其中人文学院立项3项，分别是：

张富林：《文史通义》校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般项目；

张长彬：“中国戏剧史学新旧话语体系衔接”先导研究，艺术学，一般项目；

于志刚：中晚唐侨寓士人家族研究，历史学，一般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河南省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科研项目，是衡量单位和个人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备受各单位及个人的高度重视。

人文学院一直以来秉持科教兴院的宗旨，高度重视科研工作，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创造条件激发教师科研热情，通过专家讲座、团队研讨、学术会议等不同方式大力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不断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本次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成功立项，进一步彰显了人文学院的科研实力与广大教师的科研能力。

归德府的壬午之变

□ 王隐

大明朝崇祯十五年的春节刚过，二月早春的风还带着残冬的余寒，吹拂进归德府城的家家家户户。往昔热闹的归德府城冷冷清清：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也慌慌张张，都一路小跑似的；街边的摊贩也都关张了；马道上多了来来回回的拿刀拿枪的兵士。

三月十三，雪苑社里，一群读书人正群情激昂地集会。侯大才子满脸忧容，可是声音却分外激昂，他拿一把折扇，剑指着斜空。他痛斥着朝廷的腐败，奸佞的横行，边将的无能，民心的涣散。他操着一口豫东的方言，胸胆开张式的演讲真是精彩极了。座下的听众都频频颌首称赞。贾开宗先生听完，第一个坐不住了。他一边鼓掌，一边激动地说：“朝宗所言极是，极是！”他一捋长髯，开始吟咏起来：“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看如今归德城里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呀！”吴伯胤站起来说：“眼下李贼围城，谢知县为了防御，制定了那么苛刻的防御禁令，真不知是好是坏啊？”说完，一个劲地摇头。侯朝宗此时稍微冷静了下来，他冷冷地说：“当今圣上只为了他的社稷，官员们只为了自己的前程，士绅们只为了自身的利益，老百姓只为了自己的死活。国事堪忧，现如今已变成了一团乱麻。”他顿了顿，忽而昂首而立，剑眉倒竖，朗声吟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侯朝宗吟罢，眼角润湿，情绪有些不能自抑。贾开宗先生开导说：“长安与尔三万里，黄

金台上草萋萋，纵然有意为君死，奈何君王知不知？”

贾先生很佛系地劝告各位：“今日雅集，到此结束。当下形势叵测，各位还是各自安好为是。也不知是否天意，今年的春天好像来得晚了一点，等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出城踏春可好？哎，朝宗啊，你要是带上你府上的那几个唱《西厢》唱的好的，岂不更美？哈哈！”在贾先生一连串的笑声里，学苑社集会结束，诸位拱手告辞。哪知道，这一别，竟然是怎样地生离死别！

归德城里吴府客厅，一位老者坐在客位，微垂着头，似是叹息，又似是心里藏着些许的委屈和因为委屈而窝着无名的怒火。他在等着一位年轻人，等这位年轻人如何处理眼下很棘手的一件事。

这位老者在归德府城，可谓赫赫有名。他姓宋名权，字元平，乃是明礼部尚书宋纁族孙，27岁考中天启年间进士，现赋闲在家。今日造访吴府，皆是因为自己闯下了一桩祸事。

雪苑社集会结束后，吴伯裔和弟弟吴伯胤一同回家。等到了家里，听下人说宋权先生来访。吴氏兄弟急慌忙到客厅来见宋权。

三人见面寒暄一番，分宾主落座。吴伯裔忙问宋先生来访何意。宋权一声长叹之后，说：“说来



惭愧！前几日，梁知县安排防务，命我负责南门防守，昨天我因家中有事，回府去了一会，半个时辰不到，我就马上返回岗位。一点事也没耽误。可是这位县太爷竟然拿我要按照军法处置。我今天已经去找他登门谢罪了，希望他宽宥一二。这位县太爷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一点面子不从！我这不来找吴老弟商量商量，看怎么办为好？”

吴伯裔听了，略微沉思了一下，扭头对弟弟吴伯胤小声说：“你速去请侯朝宗先生和薛凤举先生前来协商此事。”吴伯胤急忙出府去请侯朝宗和薛凤举。

不多时，侯、薛先后来到吴府。吴伯裔把宋权说的情况又一给侯、薛两位说了一遍。薛凤举听后，言道：“这位梁知县自从来到我们归德，非但不结交优待我们八大家七大户，还想尽办法去打压我们这些城里的士绅。这次弄得这个防御禁令，真是让我们动辄得咎。我们还真该想一个办法去对付这位县太爷。”吴伯裔看了一眼侯朝宗和薛凤举，说：

“二位，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们看中不中？”侯、薛示意吴伯裔继续说下去，吴伯裔接着说：“后天，三月十五，是祭孔的日子，全城的生员都要到大成殿祭孔。到那时，我们联合全城生员到县衙联名请愿，要求谢知县修改防御禁令，并且要求撤销对宋先生的处罚。”侯朝宗接过话头说：“伯裔兄说的这个主意倒不妨一试。‘哭庙’在我朝已不算稀奇。据我听说，在全国有好多地方的学子们利用祭孔的机会，向官府提出他们的诉求，有的还真能成事。明天我们分头去找一些跟我们关系好的生员，把事情给他们透一下，等后天我们发起行动。”几人又商量了一下细节，分头准备去了。

三月十五，祭孔大会在孔庙大成殿举行。一百多名在籍生员参加。在侯朝宗的主持下，祭孔仪式虽然繁琐但是非常庄重。仪式结束后，侯朝宗说：“身为生员，读孔孟书，当知仁义。今谢知县不恤下情，律令严苛，非仁义之举。我等应为民请命，可乎？”诸生群起而相应。浩浩荡荡奔县衙而去。恰好，梁知县在府衙议事。闻听一帮读书人来闹事，心头正为贼兵攻城事而烦恼。遂下令，凡有搅闹公堂者，依律严办。众生员来之到府衙前即被官兵所阻拦。

侯朝宗上前说明来意，要求见知县大人，并申诉大家的意愿。官兵素来瞧不起读书人，于是恶言恶语，开始辱骂读书人。平时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时间像爆炸了爆竹似的，群情激奋，冲向府衙大门，难以遏制。官兵也紧张起来了，没见过读书人也那么猛。一个手持弓箭的官兵也许是非常紧张，手一松弦，射出去的箭，直奔冲在最前头的读书人。这位叫何广的生员，竟被一箭穿喉，当场殒命。人命关天，府衙里议事的梁知县听说死了人，吓得连忙跑了出来，亲自处理此事。侯朝宗他们一看，也连忙安抚激动地生员们。并且和薛凤举、吴伯裔一起主动与梁知县交涉此事。

梁知县见众怒难犯，只好答应优恤何广家属。侯朝宗对梁知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解铃还须系铃人”之后，拂袖走了。那梁知县并非榆木脑袋，深知此事背后乃宋权操纵。于是，晚上亲自登门赔罪，此事才了。

话说李自成这是第二次围攻归德府，志在必得，天天用炮攻城，城外喊杀声不绝于耳。城里的官兵士绅异常紧张。梁知县召开了最重要的防御会议，自任守城盟主。府同知颜则孔守西门，工部郎中沈试副之；工部尚书周士朴守西南门，指挥熊应吕副之；山西副使宋权守南门，指挥张鸿光副之；推官王世琇守东门，举人徐作霖副之；指挥蔡洁守东南门，指挥梅振英副之；官生贾国楨守北门，指挥贾之瑄副之。守备边谋胜自帅所部兵往来巡视应援。

战事延续不断，三月二十七日，在李自成的亲自指挥下，归德城破。知县梁以樟被杀，未死，后逃脱出城。此役死难者：同知颜则孔和推官王世琇。侯朝宗祖母田氏，三叔侯忭、妻刘氏，四叔侯恕、妻朱氏，五叔侯虑，姪侯峻，从祖侯执中，从叔忻、恒、惊、怡、恬、怙及从兄弟方镇、方弼、方将、方度等。侯氏一门死20余人。雪苑社友徐作霖、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张渭亦被杀。侯朝宗从兄侯方岩率家丁斩关逃出。后又伪装起义军，出入城中，救城中亲属而去。侯朝宗得免。

古人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归德府的繁华犹如一梦，值此壬午之变，满城春草离离，城破家亡。

真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两年后，大明朝在崇祯帝吊死煤山后，也寿终正寝，被后世史官任意评说了。

十年后，侯朝宗重返归德故里，建“壮悔堂”，侯子经历家国之变，自然心内感慨良多。是悔少年风流倜傥？是悔秦淮风月日短？是悔世无伯乐？是

悔再入清廷科场的难堪？

千古风流人物，难被人说，总被人说。

作者简介：王隐，男，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中心小学教师。

●学术动态●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商丘师范学院隆重举行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城居于中国最具潜力十大古城之首。为进一步展现商丘“以文化城”的恒久魅力，繁荣商丘文化事业发展，11月26日上午，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商丘日报社、商丘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商丘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商丘市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协办，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薛明志、商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道明、商丘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胡学恩、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史新艳、商丘日报社总编辑宋圣英、商丘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星、睢阳区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政府副区长黄英杰、商丘市文联副主席曹思航、商丘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沈祥山、商丘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赵耀、商丘市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和、商丘市民协主席张学勇、商丘市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良田、商丘市国学文化促进会会长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朱凤祥、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海英、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等4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我校党委副书记吴金山、副校长郭文佳出席活动。

简短的揭牌仪式结束后，吴金山副书记致欢迎词，刘道明、史新艳、黄英杰、赵耀等领导分别作了讲话。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后，大会分两组进行学术研讨，40余名领导及专家学者就古城历史、建筑艺术、家族文化、民俗民风、文物考古、书院文化、殷商文化、古城保护与开发等进行了研究，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新观点相互碰撞、新思想彼此分享、新认识共同提升，炒制了一席丰富的古城文化盛宴。

分组研讨结束后，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学勇主持了闭幕式，郭文佳副校长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对研究会的揭牌暨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市有关部门将古城文化研究会挂牌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表示感谢，对人文学院和古城文化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寄予了厚望。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我校的成功召开，无疑为商丘古城文化研究和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相信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助力商丘古城文化研究，推动商丘文化事业发展和校市融合发展，更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 人文往事 •

那 年 三 月

□ 李蕊



当荠菜钻出地面的时候，春天也算冒出了尖儿，但之后却一直迟缓地生长，及至三月才渐感暖意融融。校园里紫藤开得繁盛，小区的蔷薇也将花枝伸出墙外，桌上的栀子花却有所懈怠，看样子只顾着长出油油的绿芽，骨朵不愿再开出花来，而村野的槐花，想必此时正做着努力……这是个看花、吃花的季节啊，每到年年此时，春风吹过麦田，我都会念起桥边和曾经鬓边的荠菜花，并产生阵阵怀想。

八年前的荠菜花，是常师给的。冬泰湖边众人各手执《兰亭集序》，虽无流觞曲水，却有可乐雪碧，大家围坐吟诗成了一时风景。类似场景在胡兰成《禅是一枝花》所附光盘中得一见，但因缺少茂林修竹而失掉风致，全是昏暗的色调和光秃的石头，人也不讨喜，至于群贤毕至，更是无从谈起。古之

流觞的情韵，我以兰亭为最佳，但我辈之人只能“有感于斯文”心领神会。

东晋是那么古老遥远，人的光芒同天上的群星一样，耀眼夺目。胡兰成时在异域日本，我不惯于所配“哀乐”，也不是我敬重的人，虽然他能写出花一样的字，又能写出让人看不出风流浪荡的《今生今世》。而我们的集会“触手可及”的，春草茂盛的土地，矫健生姿、风华正茂的“少年人”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在一年又一年的春日重回脑际，最重要的是文字中充盈真诚，对贤者满怀深情的常师。我要感谢，感谢她在我人格和精神发展最重要的几年给予的指引和温暖。



常师带给我的，是文学中的丝丝缕缕，我顺着这些藤蔓攀爬，逐渐丰富起认识，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态度。

课堂上，窗边雨中的秋山引出了“最喜风雨故人来”；提到蒙祖辈之荫而难以承继诗书德行教化的家庭，写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提到文人与西湖，写下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提到俞平伯祖辈俞樾因“花落春犹在”为题的考卷深受曾国藩赏识；提到“当代李清照”沈祖棻将山河破碎的忧患写作“有斜阳处有春愁”；提到辛弃疾的得意之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提到邵洵美的富家子弟作派和其慷慨乐助，写下和盛佩玉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提到人之相聚写下“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所以现在，当我再次遇见这些人物、诗句及其相关时，更添一种熟识和温情。当我在上海交大看到盛宣怀的铜像时，当我读程千帆的唐诗论时，当我了解曾国藩发展一方教育时，当我在课堂上吟诵稼轩词时，当和学生赏析怀人之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时……这些都提醒着我与过去的联系，也锻炼了我的发散思维。那时候的牵引也促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人和作品，如若没有大量阅读的经验，没有形成些基本论断，我大概更容易人云亦云吧。



平日里，我除了看书、散步偶尔出去旅游，再

无其他娱乐活动。常师便带我打羽毛球，而我却只是一个站着不动接送几个，发球也不标准的选手，感谢常师不以我的愚拙和懒散为放弃的理由，手把手教授，至今感念不已。也感谢2015年初我们的一次相伴出行，带我去张伯驹旧家，指给我看微寒中干枯的瓦松，了解到曾经风光无限的人物在旧时代的风雨人生。在袁世凯旧宅，站在陈列的吴钩前，都想起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过往种种，皆在目前。毕业之际，常师送我一封信笺，扉页写道“希望四季花开时，你都有很好的生活”，大概在一些人看来，我似乎做到了。

当我以一种感恩之情怀想过去的岁月

首先想到您

我们同因天光大好追逐夕阳

我们同站在山顶遥想

您埋下一颗种子

我埋下一片树叶

我们都愿想着新生

都会时不时地思索所谓意义

或颓丧 或昂扬

也许 同样的

都会在晨起的微光中

在嘹亮的鸟鸣中

感到自然的生意

这便是 我们相隔两地的共同存在

愿再相聚时

我们开怀大笑

作者简介：李蕊，河南太康县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5届毕业生，现任教于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归 来

□ 王华源



筹划了许久的毕业二十周年聚会，终于如期而至。聚会主持人让大家都对自己做一个简短介绍，因为二十年了嘛，“天翻地覆慨而慷”。王学昌介绍自己说“我归隐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虽然没谁混的太好，大多都是凑合过凑合活的节奏，但是“归隐”一词，用在咱们小人物身上还是多少有些幽默的味道。

我没说自己归隐，虽然事后我一再强调我才是真正的归隐，我说我总是去沟边河沿麦地田野，不为美眉，不为猎奇，只是觉得唯有大自然才能遣散我的情怀，纾解我的郁闷。我没有资格笑话王学昌，我其实不如他潇洒，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你是真的归隐吗？你真正的心如枯井了吗？你内心还在憧憬什么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潮澎湃？其实不用怀疑，我没有归隐，我只是找不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能让自己更安心更舒心，我只不过没有心意相通的知己，

更没有红尘之中的巨眼英雄能与我共舞。

王学昌和我一样，这次同学聚会都是穿大裤衩去的，看起来散淡随性，颇有点儿归隐的味道。他一看见我就大呼小叫：“我以为就我自己穿大裤衩呢？你来了！就有人和我作伴了！”

说实话，关于这次同学聚会的穿着，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思考再三，最后虑之熟矣：我就穿大裤衩，上身配儿子的短袖汗衫，显得年轻而率性。

你说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装扮谁不会啊？谁还没有几身喝茶的衣服？因为我想起了一首古诗，所以我没有那么穿，诗曰：五陵公子争夸富，百衲老僧不厌贫；近来世俗多颠倒，只重衣衫不重人。

是的，只重衣衫不重人！我想让同学们都看重我，不要看我穿什么衣服，所以你看，我是多么费尽心机啊！哈哈，你不能了然我的心思情怀是你的事，你没文化你怪自个儿去，聚会的时候你找老师算账去，对不对同学们？

在这里我安慰所有的同学一下，我知道你们也像我一样对这次聚会是认真的，你们也像我一样激动惊讶回味感慨……你们其实比我还要认真，看看你们这么热的天都衣冠楚楚的……看看你们热得跟水鬼似的。所以我是个招人恨的人，总是把别人弄得很不爽，明明是不像话，偏把别人说的如此肤浅；一样上的学，偏把人家都说的这么没文化。我就是欠揍，一如既往。

我刚到宾馆，胡文凤扑面而来，对我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嘴里还嚷嚷：你不要动哦，要让我痛扁一顿，这么多年你都死哪里去了？怎么就毫无音讯呢？我仔细看了看，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好久才认出她，我站着不动让她可劲儿扁。她扁过我，自己就哭了。

往事如烟，一缕一缕渐渐清晰起来……我记得上学时候就说过胡文凤：你应该改名，不能叫胡文凤，应该叫胡文凰，凤凰之中，凤是雄鸟，凰是雌鸟，胡文凤是个男人的名字哦……依稀记得那个时候也是招来了她的一顿乱拳。

当年班里的才女何雪梅如今温婉娴雅，说话不疾不徐，很有高校名师风范。不过，她还是和上学时候一样有点爱较劲，听一个菏泽的同学说菏泽牡丹如何如何，她说菏泽牡丹虽然好，不过我还是觉得洛阳牡丹更好。嘿！不就因为你在洛阳吗？我恰好两个地方的牡丹都赏过，不禁即兴赋打油诗一首：“洛阳牡丹甲天下，不过因为名气大。盛名之下虚夸多，其实相符菏泽花。”哈哈，雪梅别急别急，等啥时候我出名了，就去找菏泽政府要软文广告银子，要多少都给你！

聚会当晚我很快就喝多了。我酒量不大酒风很好，总是成功地在所有人都若无其事的时候把自己麻翻撂倒。还有我只要一高兴，喝酒必多，率性的人容易失控，二八盅以后就大撒把，老天爷老二我老大了。

酒宴结束，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宾馆，可把几个同学急坏了，一通乱找，最后却发现我早已到宾馆，随便找个房间衣服没脱四仰八叉就歪倒在床上。不过，我喝多之后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往别人手里塞钱。可能我本质上是个对金钱极其在意的人，表现出来的却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之气，矛盾而扭曲的性格和人格。

这一次也没有例外，喝多之后，我掏出一元钱硬塞给班长江越，江越说你的份子钱给过了，我可能，或者是一定，重重地给他一拳：拿着！叫你拿着就拿着！江越是个聪明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他知道和喝多了的“英雄豪杰”纠缠不清是愚蠢的，

只好配合着把钱收下了。

聚会第二天的日程是逛校园，进了老校区大门往南走，应该是操场了。我对操场的记忆不多，因为那时我们都是列队去校外的大马路上跑步，班长撕心裂肺的喊着“一二三四”，是一种嗓子劈了之后发出的声响。转了一圈，我想看看我们当年的食堂，那是一座大礼堂一般的建筑，但是也已遍寻不见，记得当年打饭的大师傅总是噘着嘴目视远方，显得自信而霸道，我递过去饭钱和我的大茶缸子，希望他能大发慈悲给我额外多打一点。饭少了，那就菜多点吧？我心里碎碎念着。终于，无论我的大茶缸子有多大，打饭师傅自有一定之规，“碗大勺子有准”啊。

再接着转悠，好像这栋楼就是我们当年的教室，是的，就是它，教室前面有台电视，其他时间是不允许看的，只准看新闻联播。每天准时看完新闻联播，就是练习普通话时间，那时每个班都有推普员，总有几个声音甜美的女同学到讲台上领读，成为晚自习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说实话，对于要不要参加这个同学聚会，我有过短时间的犹豫退缩。虚文客套、夸张煽情、炫耀显摆、感慨唏嘘……事未至而可预见。听了刘品的话我才不动摇：虽然明知没意思，我还是想去看。说的好哇，这个世界有一种真诚，叫做虚伪的真诚，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有虚伪成分，你王华源也是，别整天弄的像一个“太虚真人”似的，虚伪里面的真诚也会让你感动，让你震额回味。

这个世界也有一种亲情，叫做包装的亲情。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见面，你我毫无交集，就像夜空里的参星和商星。但是只要我们见面，哪怕好久才认出你来，哪怕好久都认不出你来，我们瞬间是那么亲密，我们毫无隔阂毫无心防。

我们来不及包装，大家都好像突然摆脱了日常生活的面具，一个个本性毕露肆无忌惮……作为饱经沧桑和人情冷暖的人到中年的我们，这种感觉太珍贵太美好了，我不禁潮湿了双眼。

我爱你们，曾经陪我走过青葱岁月的老同学们，我的兄弟姐妹，二十年以后，我们再聚会，那时的你，

那时的我，那时我们曾经的校园，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作者简介：王华源，字伯后，号安乐公，又号鱼车先生。河南永城人，商丘师范学院1996届历史系毕业生，历史法律双学士。早年活跃于各大博客和论坛，作品散见于报端杂志。现有散文小说等作品约一百余万字。

史系毕业生，历史法律双学士。早年活跃于各大博客和论坛，作品散见于报端杂志。现有散文小说等作品约一百余万字。

●学术动态●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做客应天书院讲坛品读《孔子的智慧》

10月20日上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做客商丘师范学院应天书院讲坛，主讲《孔子的智慧》，解析儒家文化中关乎义道和权智的核心内涵。刘强教授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济人文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古典诗学等，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出版《世说新语会评》《世说学引论》《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论语新识》等二十余种。

讲座伊始，刘强教授感慨虽然是第一次来商丘，但作为孔子的祖籍地、庄子故里，又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对商丘神往已久。通过会前简单的参观，更被人文学院活化利用先秦诸子文化、应天书院文化等地域文化品牌的成果而震撼，同时也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尽早出版中州书院文化研究成果，擦亮应天书院文化品牌。

刘强教授将孔子的智慧归纳为生命智慧、政治智慧和教育智慧等三个方面，通过梳理和解析《论语》中重要篇章，探讨仁智之辨、义智之辨、智直之辨，以及孔子的教育理念，从《论语》中领会孔子思想及其智慧的形成。刘强教授认为，较之于释、道的智慧取向，儒家思想所追求达到并形成的是一种心性的学问，是一种君子的学问，是一种关乎治世的学问，他通过解读孔子的毕生所得及传世贡献，指出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之所以能以“圣人”名垂千古，源于作为一名教育家，如一盏长明灯，照亮了中国历史，滋养了中华文化，更造福于千秋万代，新时代的今天更要重新发现孔子的智慧和价值。

讲座结束后，刘强教授还与听众就相关话题进行了互动分享与交流，并隆重推荐了他的两本新书《论语新识》与《四书通讲》，号召同学们在读经典中成长人生，启迪智慧，寻找生命本源，达到返本开新。刘强教授的讲解风趣幽默、引经据典，信息密集，并能引发头脑风暴与深邃思考，效果深受好评。

● 文学沙龙 ●

蝴蝶的影子飞过子弹射穿的墙

□ 班琳丽



巨齿的阴影无声蚕食
沉默久了的城，在金色的秋天
沦为原罪的靶场
那不是烟花，是伪装的盲雪
一场紧追一场，灰色的，盛大的
失控的，日夜从仇恨的天空
纷落。那不是最后的晚餐
是亡灵的辞别宴，摆在废墟上
愤怒的影子，小身子颤抖着
一同坐在斜视的餐桌旁
那是世界的尽头了吧
弹雨漫卷着苦雨

那是人类的尽头了吗
死神盯紧新生的孩子
年轻的父亲双手拎着白尸袋
一只装着完整的大女儿
一只装着残缺的小儿子
年少的身影，风扬起绝望的绿头巾
这被屈辱与利炮喂大的一代
坚定与纯真大写在迷惘的瞳孔里
而秋天绵延的死亡，转眼来到
漫长的冬天，依旧明目
张胆。我的枯手指忧伤
弹不响嘶哑的白琴键
唯廉价的祷告，看黄昏陨落时
蝴蝶倔强的影子飞过子弹射穿的墙

作者简介：班琳丽，笔名班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在《文艺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发表作品。获《中国作家》文学奖、第一届浩然文学奖、第七届长征文艺奖等、首届阿买妮诗歌奖等。中短篇小说集《城市上空的麦田》入选鲁迅文学院“百草园”书系；《态度》入选河南省作家协会“文鼎中原”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居商丘。

信 仰

□ 鲁 蕙



确定一座花园的存在，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
四周是奇怪的树丛，分不清是一些什么树
它们呼吸着从他的指令中长出
就像一个个等待随时跟他奔跑的人
这里空气清凉湿润，它们渐渐

同黑夜融合一起
所有植物都变成了一样的颜色
被草覆盖的林荫小径变得更加狭窄
他似乎知道是她向他走来，他转过身
没有说话。他在静寂中思考另外的事物
人类，爱的力量。和有关信仰
一切都在生命之外存在着
他呼吸着凉爽的空气，似乎已完成一种
了不起的事业。他在黑暗中
辨认她的位置
他们彼此之间的眼神不全是爱

作者简介：鲁蕙，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南湖丛刊》副主编，商丘女子诗社社长。喜欢诗歌、舞蹈，河南省第11届运动会舞蹈大赛个人舞全能亚军。有诗散见于《诗刊》《星星》《绿风》《诗选刊》《扬子江》《诗潮》《诗歌月刊》《作家》《延河》《山东文学》等国内外刊物及各种年刊。2017第五届白天鹅诗歌奖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著有诗集《彼岸花》。

※

作

品

□ 翩 然 落 梅



只要一把闪亮的雕刀就好了
这夜的黑矿石，大得无边无际
然而它柔软，结实，富有弹性
适合让人拦腰抱住，抚摸她不规则的小腹
这个失眠的人有了灵感，他极有耐心

从他触手可及的腰部雕起
一路向上是丰润的胸、臂膀，细致到
招人怜爱的两根锁骨，和下巴上
一颗溜圆的小痣。他举刀
砍下多余的黑夜，火花飞溅

变成星星。留两三颗最亮的，做她的银眼睛
明月。嘴唇部分
他反复构思了许久，也没有行动
最后他把它留给想象
该结束了，雕好那丰满的瓶子的底部：
那美好的，富于生机的臀
他心满意足地完成了工作，迫不及待地
进入梦境，亲她虚无的小嘴
并轻轻地，在她吹弹可破的脸上呵气，给她注

入黑色的迷人的小灵魂

作者简介：翩然落梅，诗作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探索》《绿风》等刊物。有作品被《新华文摘》《青年文摘》等转载，入选《中国最佳诗歌》《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等数十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虚无客栈》。《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学员，鲁迅文学院第31届高研班学员，商丘女子诗社副社长。

※

铁皮仓之恋

□ 冬雁



它深沉。它的皮肤呈现古铜色
我无法想象那只，充满野性的灰猫
是怎样越过那条戒线
融入它。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类事物的
纠缠。容纳
于天地。于万物。于我眼底

我隐于铁皮仓之内。以另外一种物种
以见证者。我听得到
各种撞击的声响。风，或者是
如鼓般的雨点。这让我心跳加速
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他读着凯勒的《晚歌》
他深沉，他的脑门暴起青筋
他的皮肤呈现古铜色

作者简介：冬雁，本名王艳，70后。河南商丘柘城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商丘女子诗社常务副社长。写诗、写评。诗歌、评论作品散发于《诗刊》《星星》《诗选刊》《绿风》《山东文学》《特别关注》《鸭绿江》等，作品入选多种版本。获奖若干。著有诗集《擦肩与相向》《楼梯口》上下册。诗集《擦肩与相向》荣获2020年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十佳诗集奖。

薄 暮

——给西尔维·普拉斯

□ 秋若尘



我决定听从鸽子的召唤
去拜访她
这是 1956 年，废墟间的对话 * 刚刚形成
我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仅凭一两首诗
很难观察到她的生活
对于陌生人
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好和热情，邀请我去庄园

里参观

那里点缀着大量的珠宝
以致于我们在花丛掩映的长廊下
仍能感受到那珠光
正切割着我们的身体

这比诗中的任何句子都有力和坚韧
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
讨论到当下流行的泡沫主义
带我们坠入深渊，除此之外，它被夸大的表象
也令很多人醉生梦死
在写作的观点上
我们偶有分歧，大部分是一致的
我也向世人炫耀过口技
令生铁生出耀眼的光芒
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从纸质的阅读中获得过
快感，它甚至令我产生了卑怯之心
想来生命的意义
正是无尽的探索和追寻
至于接下来，黄鹂鸟会在何时歌唱，这不是
由樱桃树来决定的吗

* 废墟间的对话，西尔维娅·普拉斯诗

作者简介：秋若尘，70 后。作品散见于《诗刊》
《星星》《诗潮》《诗探索》《延河》《中国诗歌》
《南方文学》《山东文学》等刊物。

致

□ 今 今



你不在的时候
路边的树都倒在我身上

每片叶子都看着我
每条路都指向我

风把树叶吹旧了
路被我走旧了

别人住进你曾住的房子
一排灌木丛
栽在你停留过的草地上

我越来越喜欢
望向没有人的地方
在那儿
每块石头都对我提起你
每条路都伸向了你

作者简介：今今，原名丁今，高校钢琴讲师，音乐在读博士。河南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个人诗集《琴弦》及数部合集。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读者》《汉诗》等刊物及各种年选。

※

还

□ 班
美
茜

乡



我又看到了熟悉的人，坐在街边，
活成了灰色的木墩。
在异乡的梦里我也经常见到他们，
亲切地称呼：老虎大爷，毛井嫂子
二落哥，存金叔……

我又开始燃起柴禾灶，金红的火苗

在跳动，那么热烈呵，
像极了曾经的青春。
想起了少年寄来的第一封情书，
窗外麻雀也欢快地歌唱起来。

我又踏上松软的土地，去墓地
给已逝的父亲送钱。
在火光与炮仗声中，轻声地说着，
爸，收钱吧。这么多的钱花不完
就存起来。

从四野吹来深秋的风，
古老的云朵在空中缓缓移动，
我突然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
仿佛已经活了几辈子。

作者简介：班美茜，诗人，作家，编剧，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已有很多年没有回去过那片雪野 ❀

□ 品儿



我已有很多年没有能回去过
那片雪野
——我最早对生命与美开始沉思的地方。
大雪在那里纷扬而下。写意的大师
总是能够轻松地将世界简化，重新勾勒。
我已走过很远的路程
迟钝和健忘使得路途中的许多人与事物
都在记忆里遗落了。但我仍旧能够

清晰记起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
一个人走过漫漫雪野：
村庄，坟地，贫穷又耐劳的父亲母亲们
日日走着的忐忑曲折的道路……
具象化的一切都消失了，偌大的天地间
只有寂静，咯吱作响——
我知道已经无法回去。我们已走过
那么远的路程
我所讶异的是曾经那个踏雪的少年
那时的悸动，狂喜，以及她如此之早就生出的
天地寂寥只此一身的苍茫心境。

作者简介：品儿，本名李品，河南商丘人。有作品发表于《诗刊》《草堂》《扬子江诗刊》《江南诗》《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牡丹》《北方文学》《散文诗》等刊物。

* 落日研究 *

□ 一炉雪



落日若能讲话，它必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是谁将我更名为落日
是谁怪我把一切推入永夜
我一直在埋头走路
靠近你给你带来光亮时，不必感恩
我不是有意的

远离你将你留在黑夜时，不必怀恨
我不是有意的
我一直在埋头走路
情侣手挽手攀上山顶的幸福甜蜜
与我无关

贫病夫妻人间离散
与我无关
黑夜的孤独，孤独中的挣扎
与我无关
我一直在埋头走路

亿万年来，落日一直保持缄默
它无须向世界证明什么
它只要，对自己负责

作者简介：一炉雪，本名王雪霞，宁陵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商丘女子诗社会员。作品散见于《河南诗人》《散文诗》《诗潮》等刊物。

『 紫荆山的鸽子 』

□ 陈 平



整整一个下午
我都在紫荆山喂鸽子
看它们夹紧翅膀
提着各自的食物
象流水一样各不相扰
穿梭于荒草，空地
手握鸽食者的肩头
铁索般的眼光

一次又一次计量
与食物间的路径
机警的小眼睛来回试探
掠夺前的酝酿
以刺破尘埃里的喙
在管理员的阴影里
低头啄食

公园使我们爱上城市
小块的自由在芦苇、湖泊
树的头顶上疯长
鸽舍的竹门被清晨打开
翅膀拍打密集如地铁站
金属的撞击
又一天，狩猎者的端口

城市搅动一杯廉价咖啡
下午丝滑
笼子外的文明，总是诱惑着鸽子背叛初心
交出武器和喉咙
来换取饮食，起飞
和短暂的暖

旁观者不断张开
手掌中的粮食
像价码一样徐徐抬起
鸽子的梦想，
困在食物的月台
忽的起飞，落下
落日如同饱蘸命运的印章
纷纷烙在它们洁白的翅膀上

吃饱的时候，醒来的鸽子长久站在窗边
觉得下雨也很美

作者简介：陈艳平，笔名陈平，70后，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拾壹月诗社副社长。曾从事教师、记者职业，目前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郑州。

又见古城

□ 马学庆



携着冬的寒意，与你又见商丘古城。

又见古城，又见火源之城。在蛮荒的远古，英雄的燧人向自然之神奋争，钻木燃起第一堆篝火。初始的文明，与三足鸟一起沸腾。自此，黑夜没有了恐惧；自此，严冬不再寒冷。燧皇陵的深处，蔓延着亘古的火神崇拜，燃烧起阍伯台前庙会的香炉。火的福祉温暖着数千亿生灵，伏羲女娲带领众神匍匐大地歌唱，栗陆氏、朱襄氏、葛天氏居东吟诵龙的阴阳智慧觉醒。血战睢阳，张巡、许远在火光中见证着忠诚，印映着铁骨铮铮，城楼的排排大炮正是血与火的辉映。古城之上，远眺，严寒中火光在升腾。火，让古城有了温度。

又见古城，又见诗源之城。晨曦开启一天的呼吸，远古之声正与我的心跳亲切交融。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阙成就华夏诗歌最原始的章节，

葛天氏之乐回响着生命最原始的激情，《诗大序》言诗与乐舞同源诞生。帝尧与席姓的老人在襄陵击壤而歌，微笑着和谐的生活场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华夏诗歌的先声。“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梁园吟》写意李白杜甫的行游情谊；“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是高适寓居大美宋城的凝望；“汴水日驰三百里，夜泊宁陵月正南”行吟隋唐大运河的通畅宁静；更有吕坤“明之《三吏》《三别》”的泣诉。诗，让古城有了灵性。

又见古城，又见商源之城。火红的地标，承载玄鸟生商的传说；诚信的钟声，在三商文化广场合鸣。簇拥被喧嚣淹没的清浅，提三千霓虹，点亮洪荒的灯火。鸟的时代帝誉立都高辛，契助大禹治水孟诸，开拓与抗争中，商部族于东方聚融。牛铃声声，是华商始祖王亥经商路上的磐音，葳蕤葱茏甲骨文商文明DNA的凭证。轻风吹过，幡旗猎猎，挟雷携电里商汤革命，立亳为都昭示古城的新生。隋唐大运河川流不息，西上东下运输着商丘的商贾繁华与沸腾。透过遍体青苔的石阶，熏黄的酒旗风铃，仿佛看到大宋陪都南京鼎盛时期商业文明的雷霆。商，让古城有了厚重。

又见古城，又见文脉之城。踏着斑驳的古砖，感知春秋苴兰的沧桑和马蹄声响彻三仁街的峥嵘。轴心时代书写北纬30度的神秘文明，庄子之“道”、惠子之“辩”、墨子“兼爱”在百家争鸣中于宋国诞生。书香逸逸，是儒家的风雅，宋都檀树下记载

着殷人后裔孔子的礼仪传承。历史斑驳在文庙，一城故事的墨香，延至大宋。一位名叫范仲淹的书生徜徉汉赋梁园，南都应天书院成就先忧后乐的精神高度。学子多从其教，状元榜上题写不朽的文武功名。明清“八大家七大户”成就时代传奇，雪苑六子执守满城诗意，桃花扇在壮悔堂中摇曳，西陌别墅闲居放鸭翁。文，让古城有了内涵。

又见古城，又见清德之城。幽邃的垛口镌刻着深沉的印辙，“清德”浸润着康熙对古城官员集体的赞诵。城墙内外的水滋养着古城人善良的心性。清澈，一望相知。影子倒影在水面，倒映着从古至今的清廉人生。子罕辞宝的君子不贪，沈阁老的大智大贤，吕坤的犯颜诤谏，汤斌的豆腐清官，一撇一捺把“人”字写好写正。从古城出发，心为民所系，事为民所兴，厚厚的城墙承载着大德之容。张环礼、王利申、李学生……商丘好人主题公园的魅力浸润着更多人的心灵。登高望远，天下归德，浩气悠然而生。德，让古城有了品质。

又见古城，又见乡土之城。站在夯筑的城头，耳畔仿佛听见梁孝王筑城时的《睢阳曲》。在小鼓敲打的节拍领唱中，筑者下杵和之以应。遗音袅袅，古朴的夯歌流传至今，它是古老的“中国吉普赛人”艰辛生存的号子。黄河的声音和灵魂，在这里咆哮寂静，流淌渗透在大平原的每一个毛孔。傩舞以几千年的程式，阐释着积淀，面具后是殷商祭祀的源口互动。豫东梆子的乡土味植入骨髓，抚慰着老百姓生活的伤痛。我愿意，我愿意与您亲近，吻着泥香味儿一醉不醒。土，让古城有了根基。

又见古城，又见筑梦之城。古城是历史留下的图腾，旧梦绿在城墙的苔痕中。古城老去，命运多舛，如同那个被逐出侯府的女子，泪如雨湿透罗衾，青丝孤灯装饰梦境，后来一并消逝，成为旧事。我在古城拾起一枚枯叶，墙角的老树赠我以悲悯的目光。沉默啊，沉默，百年的沉默终于在今日爆发，昔日的古城正在涅槃重生：违建已拆迁，城墙正施工，故居在修整……秀水灵动、玉带绕城，古新交映、产城相融。一城静美，满心豪放，新的规划滢满了

古城新梦。梦，让古城有了飞腾。

又见古城，是与往昔不一样的心境。

作者简介：马学庆，宁陵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先后在各级媒体发表文章千余篇，出版《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等著作十余部。

爷爷、父亲和我 *

□ 陈雁飞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柘城县西陈庄村，属于豫东平原的农村。村址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明初为谢氏建村，宣德年间陈氏迁入，至清代咸丰年间谢氏没，遂称陈庄，1981年地名普查，更为西陈庄至今；祖辈世代耕读于此，村里的人皆为同姓，同属陈氏宗亲，所以非常和睦友善。老一代教书的、参军的居多，

就连村医都是祖传五代的手艺，小门诊惠及了周边很多乡亲。

我家属于书香家庭，祖上迁入西陈庄之前有史为据可追溯到宋元时代的正议大夫、吏部尚书；在明清时期亦是人才辈出，清康熙进士窦克勤《工部主事陈公墓志铭》、清光绪版《柘城县志》、历代祖传《陈氏家谱》中均有详细记载。

爷爷是一名乡村教师。1925年出生，1948年参加工作，若是遇到学校合并了，人就跟着走，一辈子都在县城周边乡镇学校辗转，没有走出去过县城。1985年荣获柘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从教育才卅周年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1998年爷爷辞世，当时我在读小学。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拄着拐杖、戴着眼镜的老头。

爷爷从小就读私塾，大了送学校读书。1945年，镇上有个地主武装建了一所私立小学，两个村子距离约五六里路，就派人来请他去教书，因为爷爷知道他是伪军，就以不会骑自行车为由拒绝了。后来因为战乱，爷爷赋闲在家。“连年打仗，有日军、有国民党军，有共产党的部队，还有伪军和土匪。”后来他说，那个年代很可怕，根本不敢出门。

1947年陈（毅）粟（裕）大军与豫皖苏解放军配合作战解放柘城县。爷爷于1948年被正式聘为教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参加师资培训，后来一直教授语文课。1958年开始，自然灾害期间，学生减少，学校合并，他调到县城西部的官庄中学教书。据他说距离家里有四五十里路。那时也没有工资，只有红薯干，他就把学校发的“高等级”红薯干拿到县城换成“低等级”的，这样份量就多些，然后带回家和乡亲们分一分。1969年，教师下放回原籍，爷爷就回到镇上的韩楼高中教书。1984年韩楼高中改为农业学校，他又到别的乡镇教书。1985年因为身体原因加之离家太远，爷爷就申请了离休。此时，他已在讲台上站了整整37年。

爷爷平常以手札记事。他字写得很好，我读初中时就翻看过他的记事本，内容有村庄历史、有

家族排辈，也有农村的红白事礼节和婚丧嫁娶的对联。爷爷的宅院处于村子里的中心位置，记得儿时春节前，他就在院里的枣树下给村里的人写春联，挨家挨户从早上写到天黑；爷爷订的有期刊和报纸，看过的期刊奶奶都给他用针线缝起来做成了“合订本”，看过的报纸大多被村里人来拿回家纳鞋底了。

爷爷奶奶辞世后，老宅一直无人居住，后来院墙自然倒塌，小叔在家修葺了几天，那棵枣树也锯掉了。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乡村教师。2017年获得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荣誉证书。父亲高中毕业时是1979年。“我们上初中、高中时，属于半工半读，有时上着课老师就让去下地干农活了，有时在地里干着活就通知去学校上课了”父亲回忆说，那时的学期时间也不一样；至于学费，有没有钱都让上学，没钱买书还可以借高一年级的。

父亲出生于1962年，1985年被聘为民办教师。2022年父亲满60岁，在教育工作中默默奉献37年后正式退休。和爷爷一样，一辈子扎根于乡村教育的他，在镇上中学曾教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等课，后来任主任、校长。三十余年，他始终把教书育人理念放在第一位，任职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得到全面健康发展，履行了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的担当和使命。

父亲的工作经历，我知道多些。1990年他在一中当老师、主任；2000年调三中当校长；2005年又回到一中当校长。我们就跟着他的工作搬家。那时年龄小，只知道他很忙。地里的农活都交给了母亲，有时一周回老家一次，有时两周回去一次。母亲忙时，我们就跟着父亲煮泡面。奶奶说他和爷爷一样，人家工作都顾着自己家的老小，你们工作咋都是越来离家越远！

父亲在一中时，离家有约八九里；在三中时，离家有近二十里。确实远，前期他都是骑着自行车，遇见下雨天气，两个车轮堵的根本推不动，就拎着

车走。因为老家距离学校远，后来就在老家安装了一部电话，话费贵，印象中也很少用，偶尔乡亲们也来接打；再后来，修了柏油路，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节约了家和学校来回往返的时间。

父亲历经沧桑、呕心沥血，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了乡村教育的土壤之中。他把青春都献给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他的学生来自十里八村，毕业后走向不同岗位，有的学生留在了外地、有的学生也成为了教育工作者。

父亲退休回了老家，常辅导侄女、侄子学习。目前，父母偶尔也来县城，买一些治疗胃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的药；有时也到我家送点时令蔬菜。可能是他俩一辈子在乡村里的缘故吧，不习惯住在城里，都是当天来、当天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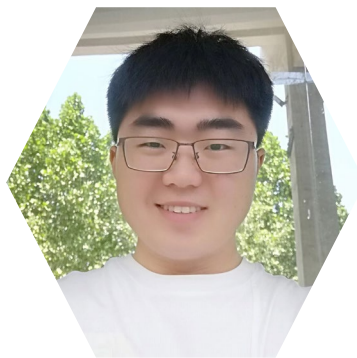
我今年35周岁，曾作为空军直招士官参军入伍，转业返乡回到原籍，由县政府安置到国土局（现更名为自然资源局）工作。如今，我已走遍全县22个乡镇（街道），积极宣传耕地保护政策，探索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认真排查摸底诸如土地征收工作中的问题，带着责任和感情进村入户了解掌握村情、民意，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征地是为了建设发展，使人民群众成为征地工作的支持者和配合者。

工作中，我注重积累经验，先后在《中国自然资源报》《中国乡村》《自然资源导刊》《商丘日报》等中央、省市级媒体发表图文作品100余篇，向社会展示了自然资源部门良好形象；转业返乡先后荣获柘城县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和商丘市青年“五·四”奖章、商丘好人、商丘市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商丘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商丘市“家风家训好传人”和河南省文明委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作者：陈雁飞，男，汉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商丘市作协会员，政协柘城县第十一届文学艺术界委员。

我在假期卖化肥

□ 吕涛



我的家乡地处豫北，黄河以北，大堤以南，用本地人的说法，就叫做“滩区”，而世居滩区的我们也就成了“滩里人家”。滩区多风，但耕地广布，土地肥沃平坦，滩里人自古以来就以耕种为生，并且人口越聚越多。秦时行郡县制，本地就称为“阳武县”，黄河之北谓之阳，用兵之地谓之武。又因为黄河屡次发水，历朝历代饱受其患，故而村镇挪动变换也是常有的事。黄河最近一次发水还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随着水利工程的兴修，如今的黄河已经水旱从人，滩区的荒地也在不断开发，从前蒿草没人、蛇鼠横行的地方，如今都种上了麦子。

我家所世居的村庄是在明代中期打寨起庄的，历经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如今已成为一个乡镇。我父母在镇上开着一家农资店，迄今为止，也有十六年了。店铺坐在一条东西路的中段，坐南朝北，长三十米，宽五米，东西两端各立着一块漆红招牌，高约五米，红底白字，一进街口就能瞧见。房子还是三十年前的旧样式，人字木椽，尖顶横梁，青灰

瓦片，红砖白泥。房顶已经长满苔藓，外墙则是贴满了一层一层的广告，新贴的还算鲜艳，旧的已经褪色破败，以后或被连带着尘土一齐拽掉，或被新的广告覆盖在下面。揭开旧广告的残片，仿佛还能辨清上世纪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

店铺除了农资以外，也经营农村常用的日杂，如蔬菜大棚的地膜，灌溉麦田的水带，喷洒农药的电壶，冬天烧的火炉等等。总之，本地农民生活生产的用具，店铺基本上都有销售。小店通常有两个人经营，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黄河滩人，在店里，他们既当老板，也当员工。而我呢，一旦学校放假，短则一二日，长则两三月，都是在店里帮工。时间一久，修理农机，开车卸货，打杂跑腿，我都能做得。农资的经营总是随着时令以及农事活动的变动而变动，最忙碌的时候早上五点营业，晚上九点关门，清闲的时候则是早上八点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其实，店铺一年之中，闲下来的日子并不多。开春以后，麦子扎出新根，地里就要浇水追肥；天气渐暖一点，麦子就要打药除草，而许多大棚蔬菜这时也开始种植；麦子出了穗，就需要防治虫害；天气热了，墒情可能不足，还要再次浇水，而蔬菜的头茬也开始收获；麦子收下来，玉米就要播种，底肥也要跟上，还得略湿一湿地皮，河滩人称作“诳苗水”，意思是把苗“诳”出来；玉米吐出了芽，除草剂就要打上；玉米长了四个叶子，还须再次用药，使其控旺增根，防止倒伏；天气酷热，玉米就得二次浇水，避免墒情不足；玉米长出棒子，虫子又要小心防治，而果园里的果子这时也挂了满树，既得打药防着虫子，又需套袋防着飞鸟；玉米收获了，小麦就要播种，底肥自然也不能少；熬到冬天，火炉需要打理，排烟的铁管又要换新……只要有农事活动进行，店里便一定忙碌，生产资料以及工具都是农家必备的物资，常常是上一阶段的供给物资正在卖着，下一阶段的物资就已经储备在了库房。

店铺里很少雇工，即使雇工也是短工，工钱按日结算。我父亲勤劳俭省，店里的许多事情都能应

付的来，因此开出的工钱也实在不高。只有农忙时店里诸事忙得不可开交了，不得已才会添一两个短工。我大姑父就曾被雇佣过一次，但他只做了半响便撂了挑子，后来也曾先后雇佣过几个本地人，只是都不长远。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店里最得力的员工。有时，几位老主顾进了门，瞧见我在搬货，就玩笑道：“少掌柜在呢。”我停下来，笑着招呼他们坐下，说道：“什么少掌柜，一个打杂跑腿的。”客人便笑，我就喊父亲或者母亲来，而后继续做事。

我每日都在店里干活。一件深蓝色罩衣，一双白色棉线手套，就是全部的劳动护具。忙碌时一天下来，罩衣的领口便乌黑发亮，手套也变薄发毛，指端的线头粘在一处，黑乎乎的，身上的汗味也是腥臭难闻。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做扛化肥的体力活。顾客把三轮车或者农用机车停在门口，便要开始装车，每袋重八十斤或一百斤，一车装一袋至两吨不等。每当一袋化肥被我搬起，“嚯”的一声扛在肩上，顾客便如同看到杂技表演一样新奇。对于化肥买卖，店铺一直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只要在附近的村镇，我和我父亲都是可以送去的。店铺的三辆货车也随时替换调用。讲好价钱，说明数目，便开始装车。到了地方，主人早已打开院门等候，于是停车熄火，麻利地换上罩衣，打开车门卸货。有时候卸车结束，主人会邀请吃饭，这自然是虚礼，不能当真留下来的，通常是以店里忙碌为由简单推辞。离开院门时，有的人家会在副驾上放一瓶水或一点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推辞不过，也就只好笑纳，这是本地的民风使然，东西虽小，却使人心中无比受用，至于卸车时的大汗淋漓，完工后的腰酸背痛，似乎也是可以不在意的了。

除了搬化肥，我也做一些诸如修理镗车，调节选种机，安装电动喷壶之类的工作，经常是同顾客闲聊的功夫，活儿也就干完了。

从前，店铺前面搭着一排瓦棚，后来，因为影响乡村面貌，只得拆除。乡下人都有着串门的习惯，清闲的时候，瓦棚便成了街坊们串门的妥当去处。有人还会带一点豆角韭菜什么的，在瓦棚里一边说

话，一边择菜。只要没什么生意，我倒是乐得站在柜台里听她们闲话，或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或是在外边得了什么新闻，都值得闲话许久。我于乡间的一点见识，也是多半从这里得来。看看到了饭点，街坊们就起身把坐具放回里间，而我则依例送她们走到街上，叫一声“婶子”或者“妗子”，嘱托一句“路上车子多，慢着些”。刮风下雨的时候，常有行人在瓦棚下歇脚避雨，我父母也会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有时他们怕影响店里生意而不愿久留，我们便劝道：“不碍事的，雨停了再走吧。”倘若执意要走，也是不强留的。在本地乡下，人情终归比别处厚上许多。

冬季的时候，店铺不大忙碌。彼时，我父亲便摸出他的板胡，坐在门框一侧拉河南梆子，豫西调是他最拿手的，而豫东调内弦较多，父亲便拉得不太好，此外，类似“过门”“二八板”“大桃红”的曲调，他都是懂一些的。行人路过，偶尔也驻足听上一段，父亲见了，就请到店歇一歇脚。到了下雪的日子，父亲兴致愈佳，开着店门，戴一顶黑色棉帽，坐在门口，低着头，弦弓一收一放，曲声便穿过扑簌簌的雪花悠扬散去，一个人就是一出好戏。而母亲就在店里烤着火炉，我则在一旁把树枝掰成小段。

我们一家人的开支，除了村南的六亩半地可以供给一部分以外，其余的就只有靠这家农资店了。因为打交道的人多，所以处处留心。谈生意时，不仅饭不可以乱吃，话也不能乱说的，只是我真正懂得说话的分寸，也不过是近两年的功夫。有时，顾客同我打趣，“挣了不少吧？”我便回道：“哪里哪里，瞧我这身打扮，像个有钱的吗，都是赔本买卖哩。”顾客觉得价格高了，就需尽力说服。“叔，一分价钱一分货呢，人不诳地，地不诳人。材料不行，就是再便宜，您也不肯用不是。”诸如此类的话，只要是这一行的，大部分人都张口即来。有的顾客会于买卖之外，聊起一些其它的事情，即使不大认同，我仍会赔上一个笑脸，不肯多插话。有的

时候，一些话从大人嘴里说出便是恭维，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就是真诚。人来人往，圆滑世故，即便说了多少违心之语，也绝不脸红。我一度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现实的打磨最能教给人妥协的艺术。我也并非没有自己渴望变成的样子，只是道路太过艰难，而理想又常常是虚无缥缈。谁不愿抛开眼前的苟且呢？可是潇洒与自由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经济基础。大三以后，我有时也会莫名地迷茫以至于失眠，可是当在家里一天天地扛化肥、开货车，累得筋疲力尽时，一切反而都简单起来了，而我也开始沉沉地睡去，身体的疲乏总是最好的麻醉剂。我曾不止一次思考要考取一个研究生，然而，扪心自问，是专业上的擅长亦或是学术上的热爱呢？恐怕都不是，而是自己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庸俗地说，只是图个挣钱轻松。整理房间时，我打开了书柜，翻看曾经阅读的小说时忽然发现，我终于把自己渐渐地活成了闰土的模样。目光从遥远的未来不断收缩，最后滞留在了皴裂的双手之上。曾经，一位顾客因为我与他的孩子年龄相仿的缘故，与我交谈甚欢。他说，你们这一代走出农村的人，毕业后若没有家里帮衬，多半都难以在城市立足，更不要说成家立业了。我本想反驳，可是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来，算了，还是扛化肥吧。

某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夏天，灰蒙蒙的天色，下着小雨，微风拂面，雨珠从店铺外的瓦棚上滑落，滴出一排水坑，叮叮咚咚，几位乡民把雨伞搁在墙根，湿着头发，随意地坐着，在一起时而笑着调侃，时而唠叨一点闲话，庄稼在地里默默地生长，孩子们在柏油路边，一脚一朵水花……

后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作者简介：吕涛，河南新乡原阳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学生。

鲜活而生动

□ 付 艺



很多时候，我都以某个人外显在周围人的形象去判断其为人，并打下刻板印象的烙印，接着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构认识，后来突然意识到原来对方并不是我印象中那样冷漠或死板、粗俗或平庸。她们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是拥有喜怒哀乐的生动的人。她们让美丽与优秀不再成为个体，她们善良又胆怯、勇敢又莽撞，失意时崩溃许久，又安慰自己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得意时想要与朋友分享，但又纠结对方是否会认为自己是炫耀张扬。

人是鲜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我现在才明白。

这几天看了一个名为《人间世》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因恶性肿瘤而切除左臂的小男孩，纪录片显示他的胸口、左臂和腹部全部肿胀变形，可双眼皮下仍翘起长长的睫毛，明亮的眼睛望着他的母亲。

录制过程中，他的妈妈始终拿着壳子泛黄的手机给儿子录像，眼里透着红血丝、嘴角难看地用力上扬，目光一遍又一遍朝向儿子又挪走、朝向儿子又挪走，她怨恨为什么命运要夺走他本该拥有的幸

福的童年，为什么命运的牢笼非要困住他，他本可以与同龄人一起欢乐玩耍、调皮捣蛋。病床上的男孩用右手拿着手机玩手游、看日漫和点外卖，桌上还摆放着日漫的一些人物手办，平日讨厌游戏背景音的我，反而庆幸他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对抗平日的无聊与命运的多舛。在医院组织的一场新年活动中，男孩穿上最喜欢的动漫人物的衣服，向全世界喊出经典的台词“如果还有家伙没有闹够的话，来吧，让我们来奉陪吧！”，内心最深的迫切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唤出来。因为已经切除左臂的肿瘤，不久后他们一家人就告别病友回家过年了，接着他拥有了一个漂亮且真实的假肢，穿上衣服丝毫没有違和感，他们想，以后会是幸福快乐的生活吧。

但命运像玻璃，越明亮，越闪亮，越容易破碎。

不久，男孩便去世了，他的眼角膜捐给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肿瘤从他的左胳膊转移到了肺部，从而影响他的呼吸系统，直至死亡。在没有生命体征的前几分钟，他努力睁大肿胀的眼睛，张开只能发出微弱气息的嘴巴朝着妈妈，他的母亲贴着儿子的脸感受他的温度和气息，无声地哭泣，左手记录她儿子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那个重新拥有眼睛的四岁小男孩，同去世的男孩一起，看过世界一切美好。

我有一位很喜欢的文学老师，在第一节课上，我带着好奇仔细观察这位老师，她身材娇小，留着微卷的长发、戴一副窄边黑框眼镜、倚靠在讲台桌旁，她给我们讲文学之用，谈自己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饱含深情、触动内心的言语，每每让我热泪盈眶。她知性、温柔、侃侃而谈，上她的课既是一份难得的享受，又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她的文学课，一次又一次的点燃起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热爱之情，激发起我对生活的感恩之心。她带给我们一个鲜活生动大爱大憎的人间鲁迅，她为我们分析那些如匕首如投枪的杂文和寄寓人生哲学的散文诗，改变了我多年来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刻板印象；她讲沈从文笔下淳朴自然的田园牧歌，带我们徜徉于那个未被世俗沾染的湘西边城；她教我们在纷繁复杂

的世界里，在这个“我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的时代中保持独立思考与冷静思辨；她提醒我们不要以“文艺青年”的标签感到羞赧，不要以躺平摆烂的姿态面对生活。我本以为老师读了鲁迅那么多批判性极强的文字后会对世界充满凌厉与失望，但慢慢我了解到，老师如此热爱生活，她精心培育的花草绿植，乐此不疲的长跑运动，点点滴滴都透露出生活的幸福与美好，也许这就是她和我们初次见面时告诉我们的那段话，也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世界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喜欢隔绝人群，沉陷流连于自我世界，不与外界沟通；我也经常封闭自己，在低落中跌入深渊，四周一片死寂。幸好，我的生活中有这么多鲜活的人，伸出双手拼命拽我拉我向上推我，恨不得直扇我耳光扒开我双眼，让我去好好看看这世间的花草树木和日月星辰，听落叶簌簌、看雪花飞舞，赏细雨淅沥、感清风吹拂。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很差劲我不够聪明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妈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我很好我很棒我一定能得偿所愿；爸爸身上的担子很重，一次次强调着日支出月支出年支出，却仍然在逼仄的生活中努力找寻我们之间相处和谐的平衡点；弟弟则像个小小的太阳，经常兴高采烈地对我讲述校园生活和青春烦恼，和他交流的我总像是在和曾经的自己对话。我身边还有三个从少年阶段陪我至今的知己，她们常常拉我出门远游，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情。进入大学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还遇到了两个高中同学，她们一个知性温婉、一个明朗活泼，却又有着同样的真诚、热烈和勇敢，我们彼此在深夜倾诉长大的烦恼，也分享青春的喜悦。后来转专业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班级的同学们又是如此美好而生动，她们热爱阅读和运动，举止大方、谈吐文雅，她们让我看到漂亮与优秀可以共存，刻苦努力的女孩子也不乏意趣横生的一面，

我和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人们在青春蓬勃的季节里相遇相交，在探寻未知的旅途中砥砺前行，互相

依存又彼此救赎。

涅槃的新生儿发出属于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哭泣，抗癌的病房里充盈着欢声笑语，精神抑郁的人们重新读书写诗、唱歌跳舞，深夜的角落里，人们从哭泣中再次站起，“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生活偶尔会让人失落，但也许并没我们想象得那么糟。

我想要再次重复罗曼·罗兰的那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世界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作者简介：付艺，女，河南洛阳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22 级 5 班学生。

无声的等待

□ 任梦瑶



以前总觉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最近却又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悟出几分不一样的味道。实话说来讲，现在的我是徒有看世界的愿望，却无看世界的能力，空在手机上窥伺着别人的青春，多了几

分覬覦的念头，想要从中抓住些幸福的影子，到头来却平白给自己添了不少焦虑。寻思着，世界那么大，我也看不完，不如过好自己当下的小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电影。这么想着，给了自己不少心理慰藉，在我的世界里，始终晃悠着个等待的身影，总想拥着她，带她信步于麦田外不一样的——我的世界。

像一块被抛弃的石头，呆呆的坐在轮椅上，被风日日的磋磨，这是她生活的日常。她老了，一只眼睛因手术意外失明，另一只也翳了。她看不清人们的面容，人们在她面前走过，在她眼中就像一个个高低不一、花色不同的法棍面包，可她总说我瘦了，让我多吃点。我来看她，往往是我扯开了嗓子开口喊她，叫了几声，她才循着声音转到我在的方向。是啊，她老了，耳背也越发严重了。她常常自嘲，说自己“五感尽失”，只有嘴巴还能品尝出一些味道，就连痛觉似乎都不如少年时那般火辣热烈，她也习惯了如此模糊无趣的日常，对生活少了许多期待，只是日日虚无的等待着我去看她。我总说让她多活些时日，多陪陪我。她却常常用“该死活不了”来应付我的唠叨。

不甘心她就这样死气沉沉的过日子，我给她整来了许多在她眼里稀奇古怪的“嘎二胡^[1]”。从汉堡薯条到饭团寿司，从菠萝炒饭到韩式拌饭，我制定了假期炸厨房行动，争取用食物的香气唤醒她对生活的热爱。许是习惯使然，也可能是我厨艺太差，至今她也依旧喜欢吃那“旧几样”，不过我也根据她的描述，一通捣鼓，做出了她心心念念的儿时味道——红薯叶窝窝头。一个饭盒，一套餐具，一杯神奇的饮料，一老一少两个人。这样的组合成了某条不知名街边经常出现的场景。驻足在她身侧，去尝尝她赞不绝口的美味酥饼，去看看她所感受的日日往返、川流不息的车流。那些屡见不鲜的事物，在静默的等待中，竟渐渐显出别样的景致。透过她的背影，瞧着她的电影，我无声的观望着过往的年代。

记忆能力的衰退，让她常常迷惑于今昔几何，

但过往的时光却镌刻在她的脑海。她的幸福是住在回忆里。这么多年的时光都在忙碌中匆匆过去，却未曾停歇驻足，如今再回头顾盼一二，往常烦心的琐事竟也成了幸福的累积。她永不厌倦地向我描述着她尚年轻的那个年代，双手比划着，嘴里念叨着怎么样参加集体大会，怎么样在晚上去参加女子学堂，怎样拉车，怎样放羊，怎样播种，怎样收割……她可是个“万事通”。那是她活力四射的青春啊！有时，又觉得她像个孩子，嘴上虽不说些什么，但却能让人一眼看出她的喜好，喜欢吃的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一口气能多吃两碗饭，不喜欢吃的，任谁来劝，都只道三个字“吃饱了”。

她出门我是极害怕的，总是走在她的外侧，怕她被车撞到。我给她拍了许多照片，总想用照片去抓住时间，但却时时惶恐于来不及。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疫情散去，人们终于待到春暖花开，可她却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重新注入活力，她的步伐更加蹒跚了……疫情前她还能推着小车，勉强称得上我们一起散步，如今却只能算作挪动，每一步似乎都耗费着极大的精力。

我常想，我能陪伴她的时日不多，倒不如说，她也无法再给予我更多的时日了。我多想她还能健步如飞，带她去看看北京的天安门，我多想给她描摹打扮，看看青春活力的她。我想要的，也许不多，只需时间倒退十年，也许是有些贪心吧……

她总是在等待，等麦子成熟，等儿女长大，等我出生，等我来看她……我想我是惯会说谎的，从小便会哄她开心，“我长大了对你好，等我有钱了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这些话常常挂在嘴边。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不能让她再继续等待了。她半辈子在田间，半辈子在厨房，见过小水洼，却从没见过大海。她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她游历四方，看海的愿望也落了空。“那不如去看鱼吧？”她这辈子，终于跟上了潮流，尝试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谁又知道她灰蒙蒙双眼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白鲸？什么样的海龟呢？是她期待和想象的模样吗？

你问她是谁？她是我的冰淇淋导师，在我妈不允许我吃冰淇淋的时间里，她的权力只手遮天，带我尝遍冰柜里的夏季美味。她是我的粽子超人，小时候她总是牵着我的手接我放学，保护我的安全，路上她总会问我，吃不吃粽子啊？如今我的世界中遍地种满了童年的竹筒粽子。她是我的仙女教母，我所提的愿望在她这里都能一一满足。她是我的姥姥啊！

帆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有风，如果没有风，帆也不过是块布而已。我来到世间，我以为我是为自

己而活，也许不是。在我肆意的年岁中如果只为自己，那生活也不过是时间的另一种计量单位，有了他们——抬头，才能感受到一束阳光的掠过。我想，当爱来临，等待便有了意义，那是无声的奥秘。

作者简介：任梦瑶，女，河南郑州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2级1班学生。

注释：

[1] 嘎二胡：方言，一般指稀奇古怪没有见过的东西。

玉兰花开

□ 王若凡



仲夏傍晚，闷热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凉意——快入秋了。

做婆婆的、做媳妇的在村口的玉兰树下围成个圈，家长里短，好不热闹。

“唉，老李家的怕是不好了。”

“婶子，老李家咋了？”

“狗子媳妇，你刚嫁过来，还不知道嘞。这么个老好人，可惜啊可惜……”

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李头他本是喇叭匠，一辈子喇叭讨生活，家传的手艺哟，到了小李无人承。”

老李身子骨还硬朗时，听到这句话总是一脸不耐，咬牙切齿让小孩“去、去！”

现在老李卧在病榻上，脑子里冷不丁地蹦出这句话。

“要成真了吗？”他暗暗叹息。

十六岁时，小李在吹唢呐；六十岁时，老李在吹唢呐。

现在老李七十岁了，不吹唢呐三五年了——吹不动了。

几十年过去了，久到小李变成老李，久到老李

的儿子小李成人离世，久到小李的儿子小小李长成玉树临风的小伙子。

老李吹了一辈子唢呐——老李家好几辈人都吹唢呐。赵家村李家人以唢呐为生。

初时是逃荒来着，贫苦人家逃荒不能顾全族谱，逃荒路上又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早已不知祖宗姓甚名谁。

逃荒来的，手里无银也无粮。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自是不会将土地拱手与人——土地是命。李家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央求着村长，得来个茅草屋遮风挡雨，又以无人耕种的僻远荒地安身立命。

正值耕种，没有种子，没有工具，本是难以生存。

里正老娘急病猝死，正愁找不到送丧的，老李家的站出来毛遂自荐。

解了里正燃眉之急，老李家的没要银两，借了些里正家农具种子，就这样在赵家村扎了根。在赵家村买了田地，盖了房子——虽是小平房，但一家人也是足够了。

现在他们是赵家村李家人了。赵家村姓李的，就他们一家；赵家村会吹唢呐的，就他们一家。

村里有人故去，都是老李家送的丧，迎来送往的，都是大事。没钱的，照规矩收几个铜板了事；有钱的，也不多要。

老老老李说，“不管活着清静不清静，闭了眼得安稳呐。”

李家人在赵家村生活了很久很久。久到小李变成老李，老李生下小李，小李又变成老李；久到李家一家子人现在只剩下老李和小李，小小平房倒显现出些许空旷；久到朝代更迭，现在的小李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现在的老李不能唢呐了，卧在床上；现在的小李不吹唢呐了，活在城里。

儿子去世，老李拿到一些赔偿金。孙子打小聪慧，他拿着这笔钱供孙子上学。孙子上学后，再也没学过唢呐。唉！不知道自己眼一闭，又是谁给他吹响？

“爷！”隔着门就听得到小李的声音了。小李和老李相依为命，小李在城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老李。

“爷，教我吹响吧！咱李家不能在我这断了啊！”小李是个好孩子，去城里读书也没有看不上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小李提过很多次了，老李都没有同意。孙子是上学的人，怎能像我一样一辈子给人送终吹响？

“行。”小李没想到老李这次会同意，他并没有什么期待，被拒绝的次数多了，询问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爷孙俩相约在下午的池塘边。

“小子，让爷爷看看你的基本功还在不在。”老李没想到小李基本功如此扎实。老李不知道小李背着老李从未松懈。

老李记性越来越差，老头子还不忘催促孙子上学。

小李学音乐已经毕业了，他一直想成为音乐家。小李认为唢呐是个不错的乐器。

小李发现老李病弱的身体，送老李在医院疗养。

老李病愈了，但老人家难免体弱。

医生说老人家还是要多加修养，小李带老李回

了赵家村。

“老李头，最近身子不错啊！”

“诶哟，你家小李可真是孝顺。小李啊，你爷跟着你可享福喽。”

村里的人或多或少受过些老李家的恩惠，听说老李回家，探望他嘞！

“诶，老李头，看小李上电视了！”村里老头们现在也是手机不离手，爱看短视频。

“真是小李，是你家小李嘞！”几个脑袋凑到一起，小小的屏幕里映着小李大大的脸。

一曲肝肠寸断，再曲千回百转。

屏幕里的小李手持唢呐，面颊鼓起，与几个帅小伙子一同，响彻天地。

唢呐、二胡遇上民乐，当进入一番新天地！

冬走了，春近了，村口玉兰树上，花开了！

作者简介：王若凡，女，河南南阳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2级5班学生。

海子

——荒野中的拾月人

□ 王梦瑶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海子 《夏天的太阳》

初读海子，便觉惊艳。如果说余光中是踏雪染月的浪漫本身；顾城是光中作画的红色稚童；木心是吴侬软语的烟雨船客；那么，海子便是胭脂换月，荒野中的拾月人……与其说是盐糖并交，不如说是胆汁融甘，荆棘开花，是在一万年寸土不生地，用

心浇灌发芽的第一颗种子。海子，就是希望本身。

“人们把那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它主要由你构成。”

1964年3月24日，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一声



啼哭，最耀眼的文曲星临世。从此，荒野中的玫瑰便如火般热烈，月撒满山，等待那个长发、白衫的少年。

海子是不幸的。出生于农村，家境贫寒；而他又是幸运的。当然更多来自于他的努力，十五岁便考上北大，后来还留任中国政法大学，这是小山村里的人都不敢做的梦。

“我请求：雨
雨是一生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我请求：雨》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如果说厨师的难过在于众口难调；将军的难过在于频频败北；皇帝的难过在于民不聊生；那么，世人的难过便在于别人用蔑视的眼光和唾沫将你热忱的诗稿浇冷……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可怜的诗人，他曾兴冲冲地将一沓最得意的长诗给他的挚友看，挚友只是哂笑两声，将长诗揉碎。海子便是那个来自北方的，不被理解的诗人。

海子一生是个极度浪漫主义者，他把女人比作黑暗中跳舞的心脏，比作月亮，比作姐姐。“姐姐，今晚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细腻得让人想流泪。而那些“月亮”、“姐姐”、又或者“玫瑰”、“牡丹”，都是独立的意象。她们疏远海子，逃离海子，即使祈求也于事无补，他的爱太热烈，太诗意，也太过依恋。可是，强扭的瓜不甜，最终他仍孑然一身。

“那幸福的闪电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998年，火车轰鸣而过，世上再无查海生。一

个年仅25岁的灵魂由火车带走，或许“过山，过水，过活死人的墓”，又或许“永不偏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总之，在前夜中写下“你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的海子注定是难过的，绝望的。然而他还是秉持浪漫本性，认真理了发，换了白衬衫，手握橘子与圣经，庄重地奔赴死亡。他终究是干净的，圣洁的。他的脸庞看起来比25岁更加稚嫩，他的灵魂永远干净、是不染尘埃的花。

海子一熄，大地便少了些许原始的声音。它关乎爱情，关乎希望，关乎那个手握西红柿走街串巷的白衣少年眼中不死的诗意。但是在“黑云压城”“风急天高”“琵琶催马”的荒野中，总有一个孤独的灵魂，真诚地向月亮叩首。

作者简介：王梦瑶，女，河南洛阳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秘书学专业2021级1班学生。

组诗四首

□ 张瑾



黎明

黎明啊
你想抓住什么

是夜的沉寂
还是黑的缄默
像雨滴一般的鸟群
冲入黑暗
你是否也视若无睹

黎明啊
你想成为什么
是夹缝中的光息
还是不让万物失味的盐粒
鸟群不再追寻希望
他们不会回头
你是否会任其自堕

黎明啊
光的使者
你想改变什么
是混沌的世界
还是苍白的人心

黎明啊
活水之泉
你想留住什么
是坠落的鸟群
还是迷失的灵魂

黎明啊
不要隐藏你的光亮
不要躲在乌云背后
尽情的挥酒吧
释放你的爱
你的光辉
你的希冀

雨滴一般的鸟群
冲入黑暗
在黑暗里

看到了他们从未拥有过的
开阔澄明

看 见

我看见
海面上红日涌出
光辉散落
驱尽城市里所有怠惰

我看见
花瓣上露珠闪烁
晶莹剔透
奏响清晨的歌

我看见
银杏叶缓缓飘落
大地上的旅行者
又多了一个

我看见
日头携着残霞走过
夕阳下的乌鸦
在金色中飞翔

我看见
月亮钻进云里
给夜晚归家的人
留些许落寞

我看见
乘风荡秋千的你
拥有加速心跳的魔力
让整个夏天甘甜无比

我看见
天空蔚蓝澄澈

浮动着梦的柔波
引你向广阔浩瀚处探索

给孤独症患者

太阳很亮
却没有一丝温度
月亮很美
可它只是凭借别人的光
星河浩瀚
但宇宙无穷
它的存在
似乎只是复制粘贴罢了

白云很轻
却没有半点温柔
黑夜已逝
可白昼迟迟未临
暴雨停歇
但彩虹并未出现
只留阴暗笼罩人间
只剩孤寂环抱世界

我讨厌下雨天
但我喜欢下雨的声音
就像
我爱笑
却不是十分开心的人

也许
也许会有一个如我一样的你
听着小众的歌
哼着冷门的调调
在无人问津之地
沐浴月光
吹着冷风
享受着无人能懂的孤独

有时候

不愿在世俗之泥潭挣扎
不愿与孤寂落寞为伍
只想逃到一个无人之岛
与潮汐共生
与孤鲸共眠

可我不愿被黑暗的空间掌控
我有年轻人的骁勇
有不甘堕落的心
我也想追风逐浪
奔赴山川海洋
诗和远方

来吧
那个如我一样孤独的你
我们一起找寻
一抹阳光 一点星辰
一颗真正快乐的心
学会去爱
去享受被爱
你当明白
你来人间一趟
值得这一场绚烂烟火

未亡之音

小小的坟墓上
长出艳丽的花来
夕阳为它们镀上斑驳的色彩
斜阳下的乌鸦带来古老的传说
说那是每一个亡魂
在用专属于自己的芬芳
讲着已被人淡忘的故事

也许
也许在天的那一边
也有一块绿草覆盖着的土地

开着不同色彩的花
每一朵花
属于每一个隐世的漂泊者
他们日日夜夜讲述着
这世间浮浮沉沉的迷离扑朔

也许
也许在地的另一边
有被困在过去的你
坐在小小的土坡旁
看着开着正艳的花
在无人之地
流着悄无声息的泪
唱着世界听不懂的歌

小小的坟墓上
长出彩色的花来
那是它们在告诉你
所有生命都未曾逝去
他们只是以另一种形式
永远的存留着
以只有清晨飞过的蝴蝶能听到的声音
告诉你
所爱之人从未消逝

作者简介：张瑾，女，甘肃武威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2级2班学生。

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五

交友当如庄子休

□ 庄桂森

惠施，战国中期人，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可怜啊！惠施这么大一个人物，生平在史书中查不到，《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写得不好，没人读没人抄没人传没人藏，丢了，可惜啊。我们只能在《战国策·魏二》《韩非子·说林上》《淮南子·齐俗训》和西汉时刘向的《说苑》中知道他的一些作为，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看到他的一些想法。庄子休先生满够意思够朋友，让他在《逍遥游》《齐物论·上》《德充符》《徐无鬼》《天下篇》中出场十多次。《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这话

是说，惠施有书五车，道术杂乱无章，说起话来，夸夸其谈颠三倒四，不怎么中听。有学者提出疑问，庄子休先生在这里是说惠施藏书五车还是说惠施著书五车，搞不清楚。从《汉书·艺

文志》著录《惠子》一篇来看，惠施著书五车的可能性不大。庄子休先生在《庄子·天下篇》中，以



摘要和关键词的形式，保存了惠施思想十个命题，学者们命名为“历物十事”。今天，我们了解、研究惠施的思想，只能认真地反复审读研读《庄子·天下篇》。

惠施，也是宋国人也应是蒙这地儿人，早生庄子一年，只活了六十岁。他“其书五车”，藏书大户，肯定读过不少书。而且是灵牙利齿能言善辩，他说起话来，给人的感觉是，很博学很有学问。因为在当时享有大名，魏惠王任人唯学，聘他为相，作魏国的二掌柜，将军国大事悉数交付处理。他，不负重托，对“老板”很负责，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为魏惠王作法”；他，策划齐国公、魏国侯都称王，提格晋级；他，协调齐、楚“偃兵”，不再打仗；他，倡导魏与齐、荆联合抗秦。这一套组合拳，厉害！为魏王打出了威风，为魏国打出了威望，真的让各路诸侯们刮目相看。

学者们研究，大致在公元前344前后，庄子休先生与惠施开始认识。初见面时谈得怎么样、彼此印象如何？《太平御览》中说，惠施初次与庄子休先生相见，就遭到庄子休先生讥讽，被比作燕雀。我看，作者有点想当然，有点不负责任。我猜猜，这时，俩人二十四五岁，年龄相仿，又是同乡。俩人都是文艺青年正是风华正茂，俩人都是青年才俊都爱指点江山，应该很谈得来。从《庄子》一书看，庄子休先生对他人还是很尊重的，除非无良不知耻，且又到他面前自我炫耀的曹商之辈。与“其书五车”享有大名的惠施第一次面，就说人家是小燕雀，不符合庄子休先生的操守品格。庄子休先生与惠施初见面时谈得应该是彼此印象很好。原因嘛，两年后，公元前342年，年长庄子休先生一岁的惠施到魏国，得到魏惠王信任重用，擢为国相，成了当时七雄之一的总经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喜可贺可赞可叹！庄子休先生很为“哥哥”可施展才华得大展拳脚有用武之地高兴，喜孜孜屁颠颠的从宋蒙赶到魏都城大梁去祝贺拜见。结果，为惠子抬轿子的人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惠子害怕了，传令在都城内搜寻，连续三天三夜。庄子休先生

气了，想想，惠施啊，也真有你的，好哥哥老朋友，干啥呀？弟弟俺可不是喜欢权的人，弟弟咱到魏都来，没别的意思，只是看看你这位老朋友好哥哥。你，尽往歪处想，去魏国与你争权夺利？啥人呀，得了吧你！你，真的不了解咱老庄？干什么呀？你以为你是谁，找不自在。颇有风度的庄子休先生没有跺脚骂大街、没有一走了之。别找了，我来啦，凛凛然的来啦，从从容的来啦。给你个段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涮你个头晕！讽你个脸红！刺你个闹心！挖苦你到无地自容！到唐朝，那个怀才不遇常写诗浇愁、借古人悲己的诗人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上写了一首诗，“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上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诗人自比西汉时“数上书陈政事，多所欲匡建”未被采纳气得吐血而死的贾谊；诗人自比年轻时曾流寓荆州依附刘表也不得志的王粲。以后，这段子并命名为“猜意鹓鶵”。这诗写于诗人考中进士、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之后，在此六十多年前，唐玄宗天宝元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为《南华真经》。想想，李商隐，学霸一枚，响应号召，按文件规定，肯定是熟读《庄子》。李商隐没有像李白那样洒脱自信，喊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而是从庄子拈出高傲来，去鄙视、嘲笑小肚鸡肠心理和行为，自树做人高标，并以此明志。在这里，我作这样想，庄子休先生的虚无、无为、自然、逍遥并不消极并不颓废并不不思进取。李商隐对自己登仕摄职寄希望寄厚望，但不刻意不顺从不屈服。他，懂庄子！他，真懂庄子！他，懂真庄子！

被人猜忌，友情热情甚至亲情随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被忘却被冷却，那是多么正常。曾经，

过去，或者一起扛过枪或者一起同过窗。现在，人家是领导了是总经理了，有地位了有身份了有权了有钱了。地位悬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来啦，干什么呀？办事？借钱？避而不见或给你个苦瓜脸，那是多么的正常，那是多么的自然，那是多么为合理，怎能够以情论以往论！

后来，惠施受张仪排挤，揣着一颗恋恋不舍的心，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乡宋国蒙地。这时，他应该是近或过知天命之年了。没有了军事外交政务烦恼，不需要再为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而绞尽脑汁了，不用再提防小人背后使坏了，朝为灌园夕偃草庐，尽情地享受田园生活的好时光多惬意啊多好啊！

惠施，他呀，什么人？身虽在江湖，可心系魏阙，官迷啊！刘向在《说苑》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不惜淹死，也要快快地作相爷，迷恋官权到心窍缺失。《战国策》记载：“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甘于寂寞？怎么能优游林下？找个人侃侃聊聊，想起了庄子休，想起了濠梁说鱼，想起了楚国说空骷髅。虽然败了，但棋逢对手痛快开心。必需去找身隐民间乐在逍遥的庄子休；必需去找委形天地寄傲林泉的庄子休；必需去找飞蝶入梦得道似仙的庄子休；必需去找有学问、有真学问、真有学问，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能说善说会说的庄子休；必需去找任着自己的想象编段子，按照自己的需要假名人之口说自己话的庄子休；必需去找超凡脱俗辞吏拒相的庄子休；必需去找生活在穷乡僻壤，天天与村民野夫相过从，日日钓鱼打鸟卖草鞋，一直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而愁着的庄子休。大名鼎鼎的惠子来了；能言善辩的惠子来了；嘴下败将惠子来了；不用编段子无需找过去的名人借嘴，见面就可以直接怼，怼一次，不服气，可以再怼的惠子来了。这人坦率！这人心眼大！这人不记仇！在怼中增添友谊，互怼中俩人成了好朋友。

惠子与庄子成为好朋友，猜猜吧，惠施是主动

的。擅于夸夸其谈，自我推销的惠子，曾位高权重。从“猜意鸛鷖”和“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之余鱼”看，庄子对惠施的一些作为做派是满满的“鄙之”。但俩人都认为对方坦率、宽容、大度、渊博，相处舒服。相居又不远，彼此见一次也方便。可庄子休，他超凡脱俗，治国安邦国计民生柴米油盐不考虑，更懒得给你扯。鱼在水里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不说了，咱说说大葫芦、大椿树有用还是无用，争呀论呀辩呀，服不？不服，靠树上想想，累了，坐田埂上歇会。

惠子也是一个好老兄，宽容大度，尽管每每口角败北，仍以与庄子打口水仗为乐，而且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庄先生夫人死时，惠子前去吊唁，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作为好哥哥、好朋友、曾经身为相爷见过世面的惠子，很是生气。庄子休啊，“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休，什么人？洒脱加超脱，视“人之在世，安知非弱丧耶？”又怼了，“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芴苒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休这番话说出来，估计惠施是惊诧到半天合不上嘴转不动眼珠子，这个老庄，他他他太超常了！我对这个老庄，他他他太不解了！学者研究，这一年大致公元前312年。这事没算完，再次相见时，两人又角舌撕扯“人故无情”与“有情”的问题。

咱想想，庄子休先生啊，你真的不应该！惠子什么人？离职的高级干部，家里有事了，人家来看看，鞠躬烧纸，这面，别说你那个村，就是蒙你那地儿就是大宋国也不见得几人有呀，好烟好茶好肉好酒好招待才对。妻子死了，你不伤心不落泪，还“箕踞鼓盆而歌”，箕踞，不雅！鼓盆而歌，不对！说你几句你还要没理辩三分？再说，作为妻子，她容易吗？生儿育女家里家外，操心吃苦。她走了，

说啥也是令您伤心的，你太超乎常情的“箕踞鼓盆而歌”，实在不能说好。

坦率、心眼大、不记仇、渊博，这是孔夫子仲尼先生说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啊。

孔夫子仲尼先生生前主要做人才培养工作，日常忙于课堂教学课下辅导。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交朋友，也是孔老师课堂教学和教书育人必讲课程，这门课程要检验学生对恭敬啊宽恕啊诚信啊这些东西掌握与否，实践性很强，虽然不比礼啊仁啊忠啊恕啊这些核心课程，但也是实现培养目标、使学生都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课程和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孔夫子仲尼先生生前，因为不需要评职称，抽不出时间也没有必要写论文写专著，“述而不作”。所以，关于朋友问题，既没有编写教材，也没有写论文啊探究啊思考啊一类的大篇文字。孔仲尼老先生世事洞明有知人之智，他呀，对朋友，对交什么样的朋友，在上课下，“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对学生不厌其烦的讲解不知疲倦的说教。孔仲尼老先生谆谆的对学生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大家一定要重视，要牢记死记记牢记死并认真实践。交有助于学习利于成才的朋友；交君子；交比自己有能耐的朋友，要交志趣相投的朋友。绝不能与谄媚逢迎背后使坏花言巧语嘴心不一的人交朋友。孔老师没有先见之明，不了解也不可能知道他以后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白眼狼”的人，如果他知道当今会出现许多不怀感恩之心不知感恩的“白眼狼”，他会讲损者四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这样的朋友处着舒服不累，有益于身心健康有益于个人发展。庄子休先生对惠施、惠施对庄子休先生是直友、谅友、多闻之友。俩人啊不能见面，见面就掐，治国安邦不说、国计民生不谈、柴米油盐不讲、物是人非不辩。大葫芦大椿树有用还是无用、鱼在水里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争呀论呀辩呀，撕扯这些事。这俩人呀！

惠施先庄子二十多年而去，我猜猜，惠子在九

泉之下会含笑在九泉之下会瞑目。如果让九泉之下的惠子开口，说说庄子休这个人，说说与庄子休的关系，他会说“交友当如庄子休”！

《庄子·徐无鬼》中，有这么一件事，庄子送葬，达到惠子的墓地，回头对跟随的人说：“郢城有个人的鼻尖上沾了白粉，像苍蝇的翅膀一样。让一个名叫石的工匠用斧头砍掉这点白粉。石匠挥动着斧头，带着呼呼的风声，听任斧头去砍白粉，白粉被削得干干净净，郢人的鼻子却一点没有受伤。郢人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将匠石叫来，说：‘请你给我也试试看。’匠石说：‘我曾经确实能够砍掉鼻灰。即使这样，那个鼻尖上沾了白粉让砍的人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自从惠子先生去世以后，我没有辩论的对象了，我没有说话的人了。”运斤成风的成语出自这段话，自从先生去世以后，我没有辩论的对象了，我没有说话的人了。这与高山流水有什么区别？

惠子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会说：“交友当如庄子休”！

惠施写的那本书，可惜已经失传了。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学者们命名称为“历物十事”。虽然是摘要和关键词，却使我们知道惠施曾对自然界作过分析，他思想的核心是“合同异”，而且能辩证的看物事。因《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使我们知道，战国中期人惠施，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哲学家。

惠子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会说：“交友当如庄子休”！

作者简介：庄桂森，商丘师范学院原学报主编。

● 学术论坛 ●

梁漱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探索

□ 高建立



20世纪初期，清王朝落幕，民国初立，社会依然动荡不定，国运衰微的局面没有得到大的转变。原因何在？一批学者开始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寻找中国国运衰微的原因，尤其是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中国国运衰微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法”（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1).）。而“国粹派”则主

张发扬国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乃“立国之根本”（许守微·论国学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10(7).）。而梁漱溟则似乎走了一条折中的路子，他一方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胜之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精到之处，其精髓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梁漱溟也对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给予了肯定，认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样，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二者不可偏废。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也充分体现并贯穿于其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中。

一、独特的教育背景及其二元文化观

梁漱溟出身书香世家，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18岁北京顺天中学毕业后，就到《民国报》任编辑兼记者，23岁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梁漱溟的父亲是清朝官员，但为人开明，6岁时就送他进入了中西小学堂，开始接触西方知识。梁漱溟非常喜欢阅读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地球韵言》等，在思维方式上也深受西学影响。他很欣赏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对杜威的实用主义著作研读深入，且能够阐发自己的见解，这对

其以后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积极影响。他在晚年时曾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89页）其所谓的“有思想”，其实就是他对中西文化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梁漱溟看来，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可以归结为人类的文化范畴，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来讲，也有其可兹借鉴之处。与同时期保守主义的国粹派不同，他们对西方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止步不前。梁漱溟则以开放的眼光触及到西方文化的优良之处，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对科学民主和个体人的关注，他认为西方的这一思想认识可视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也应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梁漱溟认为，“无论世界上哪一部分人皆不能自外的”（《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很显然，梁漱溟对于文化的认识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点，这种二元文化论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实际已包含有他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综合了中西文化之长而对传统文化作出的重新整合”（马勇·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二、乡村建设的教育理论

（一）创造新的教育文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生活条件恶劣艰苦，农民生活十分窘迫，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遑论接受教育了，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解决乡村问题，要解决乡村问题，重要的在于乡村的教育。所以梁漱溟主张创造新的文化，以改变当时中国之现状。为此，他提出了“老根新芽说”，所谓的“老根”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老根不活，不能及时发出新芽，则老树难以久存，必然走向枯槁，所以梁漱

溟呼吁，“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个大树”（《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如何在“老根”上长出“新芽”，那就必须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因素，以之培育“新芽”。也就是改造中国旧有的文化，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培育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新的教育文化。

（二）重建乡村教育的社会组织

要想创造新的教育文化，则必须重建乡村教育的社会组织，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但是新的社会结构还未能及时建立起来，这是直接导致乡村教育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建，是乡村教育的重点所在。基于此，梁漱溟认为既要复兴传统乡村的优秀教育文化，又要充分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使二者能够有效融合起来。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国，国家的人口主要生活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庞大的农村人口为开展乡村教育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不但如此，乡村地区人们的朴实，更利于接受新的教育。因此，恢复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就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希望所在。

（三）农民和知识分子相结合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的精神已经破产，“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这是乡村教育问题的根源所在。虽然农民是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文化知识的严重缺乏，束缚了他们的思想，遮蔽了他们的眼界，更缺乏现代意识，所以只能成为被引领者；而知识分子都是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现代知识广博，思维活跃，且觉悟高，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他们是乡村建设引领者。因此，要发展乡村建设，就需要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进入农村，走近农民，和农民打交道、交朋友，对农民加以引导和帮助，双方合作起来，用自己所学

知识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以“少部分人带动大部分人”，才能把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搞好。梁漱溟特别看重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将团体主要力量全面发动起来才能完成。而这都取决于乡村局面与知识分子。”（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各有其优缺点，更应当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教育，实现乡村的全面革新。梁漱溟坚信，知识分子能通过这样长期坚持不懈的乡村建设工作影响到政府，进而转移中国大局。（梁漱溟：《乡建的三大意义与知识分子下乡》（王永政笔记）《北碚》月刊1937年第12期，第1-4页）

三、情志教育的新儒家情怀

情志是可以教育的，但不是知识教育所能取代的。梁漱溟非常重视情志教育，认为情志教育可以使人们更好的调适生活，理顺生活，使生活本身更美好。情志教育在人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情志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应当是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情志教育不但在于传授知识、启迪智慧，更利于调适生活，使生活更加理顺适宜。

情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是一种生命教育、生活教育，是个体如何在完整意义上成其为人的教育。道德教育就是让人们自觉自愿地承担道德义务。而要自觉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家庭伦理上进行教育，培植深厚的情感伦理基础。“伦理关系以且当以家庭的天伦以为基础。”“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更推广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君与臣、官与民，比于父母儿女之关系；东家伙计、师傅徒弟、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比于兄弟或父子关系。伦理上任何一方皆有其应尽之义，

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梁漱溟深刻洞察到了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家庭的道德教育功能弱化，必然导致个体德性与社会风尚的退化。因此，教育不仅仅讲习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顾及学生全部的人生道路，教育“要在全生活上帮着走路，尤非对每个学生有一种真了解——了解他的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而随其所需，随时随地加以指点帮助才行”（《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就在于情志教育，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含固有的智慧和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或转自贻其戚，所以情志教育是更根本的”（《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主张教育人要过合情合理的生活，把目光投向人本身，体现了先秦儒家丰富的人学精神，但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融入新的东西，已经无法保持其本来的面目，尤其是儒家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程朱理学的诞生，以忠信孝悌教育人们，对人们的各种行为进行约束，已经不是孔子原来的思想本真，违背了孔子教育的真精神，自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情志的培养和知识教育的融合，则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影响。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毕竟培养出了社会上流行的孝悌礼让和恭宽信敏之风，人们不过于注重自己的一己之得失，更看重与他人和大自然混融和谐相处，进而养成并呈现出温良敦厚的君子之风。而西方人由于过于强调自我，忽视了与他者的利益关系，过于追

求个人权利，把很多事情都诉诸法律解决，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温情的一面，这也是中国人所不认可的。这种对中西文化的分析，体现了梁漱溟情志教育的新儒家情怀和对中西文化认识判断的理性分析精神。

四、教育改革的探索精神

梁漱溟为改变中国面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与改造，其主张的教育改革大体始于1924年，首先在山东曹州中学进行了教育改革。但是由于时局的影响，最终曹州的教育实践未能成功。随后，梁漱溟又奔赴广东、河南、山东等地，继续开展其乡村建设和教育实践的探索。

（一）梁漱溟在广东教育实践

马东玉在《梁漱溟传》中说：“北伐失败，中国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梁漱溟）反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走乡村建设的道路，是唯一救国之途、‘立国之道’。”（马东玉·梁漱溟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抱着这样的信念，梁漱溟离开山东后不久，便决意前往广东广州，继续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梁漱溟是1927年夏秋到达广州的，广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推行自己的乡村建设主张，但由于当局的行政效率低下，且推诿扯皮，他的乡村建设计划迟迟得不到审批。在等待行政审批期间，梁漱溟于1928年夏被聘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也乐于此职，正好以此来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在广东省立中学期间，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思路和办学要求，认为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要求学生应养成自我动手的习惯，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要求学校教职工，也要自己动手，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体现在实践中，就是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服，自己动手完成日常生活事务。梁漱溟还提倡师生平等、共同发展。总之，其办学的整体思路“就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是心、手、耳、目统一协调运用起来，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各种变化发展，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与能力”（吴洪成，王彤·困顿中对教育的执着——探析梁漱溟在广

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琼州学院学报，2014（1）：107-113.）。梁漱溟在广东省立一中的教育实践活动，对梁漱溟教育思想体系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梁漱溟在河南的教育实践

1929年，梁漱溟一路考察各地的乡村教育实验情况后回到北平，不久受中国村治派的代表人物王鸿一的邀请，一起筹建河南村治学院，目的在于“以自卫、自治、自富为手段拯救农村，进而拯救中国”（彭沛·彭禹廷与河南村治学院。中州今古，1996（5））。1929年10月，河南村治学院在新乡辉县苏门山南麓的百泉村正式建立，彭禹廷任院长，梁漱溟担任教务长。学院得到冯玉祥的大力支持，冯玉祥把袁世凯在辉县的遗产划拨给村治学院，以支持办学，1930年初正式招生。在此期间，梁漱溟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详尽阐述了其乡村建设的原则和理念。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除此必无生路”（白吉庵，李仲明·梁漱溟口述实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他进一步指出，解决乡村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要借鉴中国传统的合理内容，同时积极吸纳西方的建设理念，取二者之长，为重建中国乡村的社会组织服务。梁漱溟认为，之所以办村志学院，目的就是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培育师资队伍和力量。作为教务长，梁漱溟进行大胆尝试与改革，组建了农村组织训练部和农村师范部，以负责乡村教育人才的培养和乡村自治的理论研究。他还改革传统的教育方式，实行班主任负责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自理能力。学院管理亦具有军事化管理的特点，课程设置也侧重于实际知识的学习探讨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倡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在梁漱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河南村治学院取得了一定成绩，乡村建设理念在河南得到广泛传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教育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

（三）梁漱溟再回山东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省代主席张钫下令停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梁漱溟又一次来到山东，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把山东邹平县作为重点试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置有两个部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研究部，机构设置和教育教学方式，与河南村治学院相仿。学员以山东籍居多，他们在统一学习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课程之后，再根据学校安排和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学习。教员也采用了较为进步的教学方法，如讲授之后让学生自由讨论，并提出意见。另外，学生如果在校成绩优异，则可提前毕业。通过以上的实践工作，“1934年，邹平村立小学发展到308处，学生8903人；乡学14处，学生750人”（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虽然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因时局变化而陷入停顿，但此次山东实验区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建设经验，也促进了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四）梁漱溟在重庆北碚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停顿后，他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在重庆地区生活了10多年，直至1950年回到北京。这十多年来，尽管有去香港和广西，但主要在重庆北碚，积极推动乡村建设和兴办教育，并到重庆各地演讲，宣传其乡村建设理念和教育思想。他积极办学，先后创办了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直至勉仁文学院，并自任董事长兼校长。勉仁文学院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三系，延请名师到校教学，陈亚三、邓永龄、罗庸、李源澄、吴宓、杨砺坚、曹慕樊、侯思恭、杨中慎、张之伟、孙伏园等，都曾在勉仁文学院任教。梁漱溟在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文学院期间，并附办有勉仁农场、勉仁农工文化学校等，旨在推行其乡村教育理念。

（本文为2023年重庆勉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

作者简介：高建立，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应天书院）院长、教授。

●学术动态●

杨晶教授“创新消费赋能：文化产业建设中的青年动力”专题 学术讲座

9月19日晚，人文学院在汉梁楼国学堂举行了专题学术讲座活动。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港澳台青少年游学专家、博士后杨晶教授主讲，讲座题目为“创新消费赋能文化产业建设中的青年动力”。

杨教授的讲座围绕“旅游中的青年文化研究”“音乐与产业青年”“影视产业与青年”三个核心展开，通过介绍当前文化产业中的“阿那亚”现象与年青群体的“孤独情绪”、年青人投身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年青群体审美变迁等问题，指出年青人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建设者、消费者和推动者，引领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向，鼓励同学们对文化产业的未来要充满激情和信心。

杨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激情澎湃，各位同学认真倾听并记录。在会后的自由发言环节，大家一致表示深受启发和激励，在以后的学习中将会以更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将自己打造成优秀的文化产业建设者。

夏代大运河、大禹阳城考古探微

□ 韩 鹏



目前，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在尧舜“中国”和大禹“夏都”发源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倾向。但是，上古时期自然黄河的泛滥主要集中在自然黄河的下游地区，下游地区是自然黄河最早冲积形成的河州和伏羲划分的九州冀州之地。

直到大禹治水成功，仍然把自己的宫室“夏邑”、王都“阳城”建在黄河下游洪水主河道的鸿沟、汴渠，即夏代大运河之滨的开封禹王台之地，也就是尧舜之前诸帝居住、建都的旧地冀州。这一历史文化发源地问题如果搞不清楚，包括尧舜禹居住、建

都问题在内的华夏文明探源问题，就仍然会在错误的思想观念、错误的地理选择、错误的推演判定下，得出错误的历史结论。

对此，本文重点谈谈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大运河、四渎流域，是尧舜时期九州冀州、中国和大禹治水、居住宫室和王都等核心问题。

一、大禹开发中国最早大运河、四渎在黄河下游

尧舜时期，黄河下游的东部地区发生了渤海海侵太行山东麓的现象，导致黄河下游之水滞留，造成了“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在下游不断改道，浊水横流，大洪水泛滥于尧舜二帝的“天下”“冀州”“中国”。

对于上古时期，洪水在黄河下游的尧舜“天下”“中国”泛滥，古人有着明确的历史传承。据战国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

淪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

文中大意是说，在上古的尧帝时期，天下还没有平定。黄河下游的洪水乱流，在中国之地到处泛滥。草木生长茂盛，禽兽大量繁殖，五谷难以生长，野兽威胁人们。鸟兽所走的道路，遍布在黄河下游的天下之地。尧帝为此十分担忧，选拔虞舜担任执政官（太宰）来治理洪水。虞舜派伯益管火，伯益放火焚烧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野兽被迫逃避躲藏起来了。虞舜又派大禹疏通黄河下游的九河，包括济水、漯水、汝水、汉水等，让它们经东江、淮泗流入东部黄海之中。这样一来，黄河下游的尧帝“天下”“中国”才能够耕种并收获粮食，开始平定下来。

对于“九河”在黄河下游分流入海的地理历史，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禹贡·导水》中早有记载：“（河水）东过洛纳，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2]。文中的“洛纳”，位于黄河中游末端，即洛水下游入黄河处；“大伾”，位于黄河中游末端，即荥阳汜水镇口子村西的大伾山，而不是后来河南浚县大伾山（见图-1）；“降水”，指黄河下游的古漳河；“大陆”，在北魏时期称为大陆泽、或大陆陂，位于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交接的洼地，今河北邢台市隆尧、巨鹿、任泽区、平乡、南和区、宁晋等地；“九河”，为黄河下游排泄洪水入海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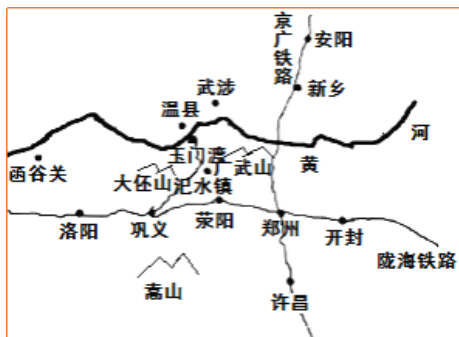


图-1 荥阳大伾山汜水位置图

这些记载，基本反映了黄河下游东部的洪水，泛滥于尧舜时期“天下”“中国”，以及大禹在黄

河下游治理洪水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过程。

不仅如此，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也记载：“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3]可见，尧舜时期的“九河”“九州”“九泽”“九山”，均在郑州荥阳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2008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的《黄河流域防洪规划》明确提出：“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荥阳市桃花峪为黄河中游，自桃花峪以下至入海口为黄河下游。”（国函（2008）63号）。这就对黄河下游地理位置的争论，化上了句号。

对于“九河”“九州”“九泽”“九山”，均在黄河下游的观点，古人早有论述。据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贡赋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不起于隋。世既久远，或名鸿沟，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于冀也”^[4]。所谓“尧都冀州，居河下流”，就是指在黄河下游的尧帝九州的中州、中国、即冀州之地；“汴渠”，便是大禹在黄河下游、荥阳东部人工开发的夏代“大运河”。说明大禹治理泛滥于上古“中国”的“洪水”，也在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在黄河中上游流域。

对此，中国最早史书《尚书·禹贡》也记载：“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淮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5]其中，尧舜时期的“兖州”，是指“济河”源头之地的济源、孟津、温县之地，正是尧舜时期九州的西方之州，也称“兖州”“沅州”等。故发源于济源的“济河”，也称“沅水”，东流为“济水”等。说明济河与兖州的地理、文化源头是一致的；“淮、沮”为二水，“淮”是指自黄河下游分流的鸿沟、汴渠，“沮”是指自济水分流的睢水。

据清末民初杰出历史地理学家《水经注疏》引

中国辞书之祖《尔雅·释水》记载：“自河出为灋，济出为漑。求之于韵，沮有漑音。二水，河、济之别也”^[6]。“灋”，指从黄河下游分流后，出入济水的反流之水，也称“反水”“汜水”“汴水”“鸿沟”等；“漑”与“沮”古为同音，“沮水”即“漑水”“睢水”，为黄河下游东部济水的支流。“灋水”“汜水”“大运（汴）河”与“济水”“沮水”“睢水”首先交汇之地的“雷夏既泽”，在黄河下游的九河流域，也是“大运（汴）河”与睢水交汇的开封古陈留之地。之后，向山东菏泽“雷夏泽”等地传承。虽然，山东菏泽为济水流经之地，却不是“大运（汴）河”与睢水会合、或二水共同的流经之地。山东菏泽“雷夏泽”为西晋惠帝时期，由陈留郡所分置济阳郡（治所在今开封兰考县东北堽阳镇）的一种文化传承，源头仍在陈留郡的“雷夏泽”之地。而“河、济之别”，也在黄河下游、荥阳荥泽东部的开封古陈留之地。

关于尧帝时期九州的西方之州，为“兖州”“沅州”“兪州”的说法，史典记载不绝。如西汉经学家刘安《淮南子·地形训》有“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7]的记载；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张衡传》引汉代易书《河图》中，有“正西兪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8]的记载。（见图-2）这是尧帝九州西方兖州、北方沅（济）州、中央冀州与大禹九州东北方兖州、北方冀州、中央豫州的主要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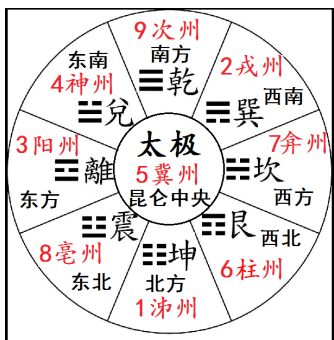


图-2 伏羲八卦九州、开封冀州图

关于尧帝九州西方州“沅州”在济源的历史，古人在史料中也有传承。据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记载：“王屋山今在济

源县西八十里，沅水所出。《北山经》曰：王屋之山，灋水出焉。郭云：灋沅声相近。即沅水也。《尚书》某氏传曰：泉源为沅，流去为济。按泉出沮洳曰沅，引伸为沅州。口部曰：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沅名焉”^[9]。这表明，尧帝时期济源县王屋山“渥地”“沅水”，是以尧帝九州西方州“沅（兪）州”而得名之水。“沅水”东流方为济水、潞龙河。济水穿过黄河东流后，也称“大运（汴）河”“沅水”“北济”“黑水”“玄（悬）水”“姬（若）水”“鸿沟”等。

可知，尧舜二帝时期的“兖州”“兪州”，本是指黄河下游九州的西方之州，其位置正在黄河中、下游结合部的济源、孟津、温县、荥阳、武陟一带，也是尧舜二帝时期“天下”“中国”的西方和“鸿沟”“汴渠”的上游地区。

尧帝九州的西方州“兖州”“兪州”，与大禹治理“大运（汴）河”“四渎”成功后，重新划分九州的东北州“豫州”，即“夏朝”“中国”东北方的“兖州”，存在的共同点是均在黄河下游流地区；不同点是一个在尧帝九州的西方州，一个在大禹九州的东北州，彼此在黄河下游地理上有着方位上的差别。

这也是造成自战国时期以来，黄河中、下游结合部的尧帝兖（兪）州，被误认为在今山西南地区；黄河下游的尧帝冀州，被误认为在黄河中游的今山西、或河北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华夏文明探源最大的地理误判所在，到了应该醒悟和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二、尧帝九州冀州与夏代大禹九州豫州同地

大禹受命后，在黄河下游东部尧舜二帝的“天下”“冀州”“中国”开始治水。故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10]这是大禹治水成功后，重新划分九州的重要依据。（见图-3）东汉经学家卢植在《冀州风土记》中记载：“唐虞以来，冀州为圣贤之泉藪，帝王之旧地”^[11]。这里的“冀州”，应指大禹重新划分九州之前旧九州的中州“冀州”，

是唐尧、虞舜之前“圣贤之泉藪，帝王之旧地”所在。



图-3 大禹依八卦划九州开封豫州图

“帝王之旧地”，包括五帝之先的黄帝在内，因为黄帝也居住在九州的中州“冀州”“中冀”之地，并在此地联合炎帝长子方雷氏，打败了篡夺炎帝帝位的蚩尤。据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尝麦篇》记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12]“中冀”，即指黄帝至尧帝时期九州的中央之州、冀州。因为中冀、冀州是古帝王共同的天下之位，故清代学者陈逢衡《逸周书·尝麦篇》注释：“古者指天下为冀州。”^[13]东汉高诱在《淮南子·览冥训》中也注解：“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14]“九州中”，即九州的“中州”“冀州”“中冀”，在“四海”环绕的中央之地。

到了尧帝时期，九州的中州冀州，仍然与炎帝、黄帝、蚩尤逐鹿中原时期的“涿鹿”“中冀”，同在黄河下游“帝王之旧地”的“天下”“中国”。今黄河下游郑州中牟官渡镇的古运河之滨，仍有“（轩）辕门”“逐鹿营”（见图-4）的村名传承至今，印证着黄帝九州中州、冀州在黄河下游东部之地的存在。



图-4 郑州中牟官渡镇逐鹿营村图

尧帝九州、舜帝十二州的中州“冀州”，不仅处在二帝“天下”的中央之位，也是上古时期天子

共同居住的“天下（地）之中”“中国”“帝王之旧地”。因此，也成为了大禹治水必须优先选择的地理位置。

古人多认为，大禹在九州治水有主次、先后之分，一般应从下游开始。可大禹为何却首先治理中州冀州之水呢？答案是因为冀州是尧帝帝都所在，也是保护尧帝和帝都的需要。故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记载：“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从冀州始。”^[15]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载：“治水先后”，“首从冀起”。^[16]这里的冀州，一般是指尧舜之前九州的中州，即冀州，而不是大禹治水之后重新划分九州的北方州、冀州。

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和传承的失真，古人也有把大禹重划九州北方州冀州，作为尧舜九州中州冀州的情况发生。如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九州之次，以治水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17]南宋经学代表人蔡沈《书集传》记载：“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州）之西，雍河（州）之东，豫河（州）之北。”^[18]这是古人误把大禹九州北方州冀州，作为尧帝之前九州中州冀州的例子。

总而言之，由于冀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上古帝王都城所在地，从而，被列为大禹治理九州洪水的第一州、第一位来对待，就再正常不过了。

大禹在黄河下游成功治水之后，形成了以“大运（汴）河”、即灋水、鸿（黄）沟为中央河流的“四渎”之水。“四渎”之水，与四象四方、五行五色等历法文化彼此依存、互为对应。如东方为青色、江水，南方为赤色、淮水，西方为白色、河水，北方为黑色、济水，中央为黄色、黄沟、河沟、洪（鸿）沟、大运（汴）河之水。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5年，即“（秦嬴政）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19]。文中“河沟”，即指“滎河”“洪（鸿）沟”“大运（汴）河”，而不是指自滎阳东北流向的河、或西河。（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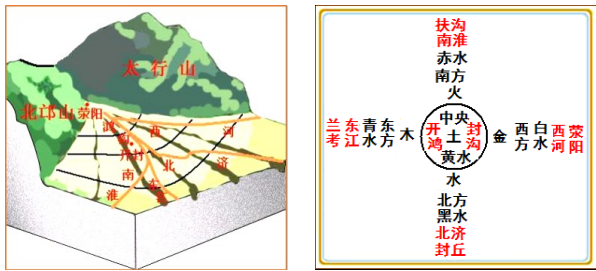


图-5 夏代大运河（鸿沟）、四渎方位图

对此，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禹贡锥指·附论历代徙流》也记载：“河沟者，鸿沟也”^[20]。中央之水的“河沟”“鸿沟”，也由此成为了黄河下游分流和调剂“四渎”的主河道“大运（汴）河”。由于当时人文黄河的名称尚未出现，“河沟”“鸿沟”便是后来人文黄河下游的主河道“大运（汴）河”，是最早孕育中原、黄淮平原和人民的“母亲河”。直到西汉时期人文黄河名称出现后，“母亲河”的桂冠才被黄河所取代，“大运（汴）河”“鸿沟”为“四渎之宗”的历史地位，才开始被黄河所占据。

古人把“大运（汴）河”“鸿沟”与“四渎”，合称昆仑山“五色水”、或“五色流”。据晋代汲郡（河南卫辉）出土战国魏国襄王墓竹简《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出东南隅而东北流。皆见《山海经》）”^[21]。“五色水”，便是以上古时期五行五色等历法文化得名的“大运（汴）河”“鸿沟”与“四渎”之水名。北宋开封政治家王安石，还把“昆仑”“五色水”与“五色流”“黄浊（河）”“中州”相联系，认为彼此同在一地。他在所作《黄河》诗中写到：“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22]文中“五色流”，即指流经黄河下游中原“昆仑山”上的“五色水”。

“五色水”来源于五行中的“五色”文化，五色水与五方水都是用五行等历法文化，来表示黄河下游“大运（汴）河”“鸿沟”与“四渎”名称的不同方式，彼此相互对应。它们分别是：五行中央、黄色的大运（汴）河、鸿沟水，也称中央（国）水、黄水；五行西方、白色的西河水，也称白水、金水河；五行北方、黑色的北济水，也称姬（洧）水、

黑（若）水；五行东方、青色的东江水，也称青（苍）水；五行南方、赤色的南淮水，也称赤水。

故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引商汤《汤诰》言：“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23]。大禹修建的“四渎”，具有严格的四方历法定位，其地理方位不可任意改变。这与汉唐时期之后“东为淮、南为江”的“四渎”，是有着明显地理范围和历史时间区别的，将其混为一谈的观点是错误的。

古人对尧舜时期大禹开发四渎、大运河（鸿沟）的理解，也与西汉经学家刘安《淮南子》所载“是故禹决渎也，因水为师”^[24]相一致。这里的“渎”，即指水沟、河沟、沟渠。史典中鲜见有大禹开发大运河的记载，但关于大禹开发沟、渠、鸿沟、汴渠的记载却比较多见，也是作者认定鸿沟、汴渠就是大禹开发大运河的主要地理和历史原因。

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也早有论述：大禹“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25]“鸿沟”，就是大禹人工开发中国最早的中央河，即大运河（见图-6），至于春秋时期的“邗沟”、战国时期的“鸿沟”、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均晚于、或继承于尧舜禹时期开发的“大运（汴）河”“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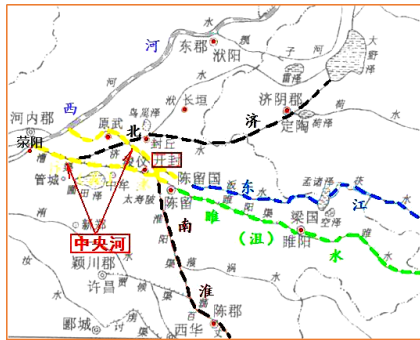


图-6 黄河下游鸿沟、四渎示意图

对此，南宋经史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也记载：“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26]。通往“淮泗”的“渠”，便是荥河、汴渠、鸿沟，也是上古时期大禹在黄河下游中国首创的中国大运河。

文中黄河下游洪水冲积形成的“昆仑”山，当与“天地之中”同义。据汉代易学著作《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者，地之中也”^[27]。“昆仑”山、“地之中”，也称“天地之中”“天下之中”，与上古时期的九州、中国同地同义。故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引后周知开封事王朴言：唐“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太）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28]。这是上古时期黄河下游“天地之中”，自西周误测登封阳城之后的必然回归：“黄浊”，即指黄河下游的“黄沟”“鸿沟”“汴渠”；“中州”，即指黄河下游尧帝的九州冀州，也指尧舜禹三代居住的“天下”“中冀”“中国”“天地之中”。

大禹治水时期，以黄河下游的鸿沟、汴渠、大河流域为中枢，开始了“中分天下”之先，重新划分了以豫州为中州的新九州。而新九州之一的中州豫州，便在鸿沟、汴渠流域，是大禹继承尧舜二帝的“天下”“中国”旧地所在，后人称鸿沟、汴渠为夏朝“大运河”。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发展建立了千秋功业。自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承蒙他所创下河运功利。大禹在尧舜之前以冀州为九州中州的基础上，重划了以豫州为九州中州的新九州。

据清代《开封府志·卷十一学校》引明朝都御史章焕记载：“余涉禹迹（指夏禹治水，足迹所走中国之地），按舆（疆域）图，知豫为九州之中，祥符又豫州之中，祥符虽一邑，藩省置焉。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29]可知，大禹足迹所到黄河下游的“天下”“中国”“天下之中”，与地处洪水泛滥“九州之中”的大禹中州豫州、夏朝“八州”“天下（中）枢”的开封“祥符”之地，在古人历史记载和地理定位中是可以找到历史依据的。

三、大河流域的冀州是上古帝王共同居住的中国

九州，最早由伏羲以八卦、九宫图等历法文化为理论依据，划分黄河下游冲积形成的河州而来。伏羲肇始的八卦、九宫图等历法文化，是伏羲及后

世帝王划分黄河下游不断冲积昆仑山、河州、中土、地之中的历法基础。中土、地之中在河图洛书中为五、十中数，在九宫图中是五宫、中宫之位（见图-7），最终黄河在下游依次冲积形成了九州、中原和华北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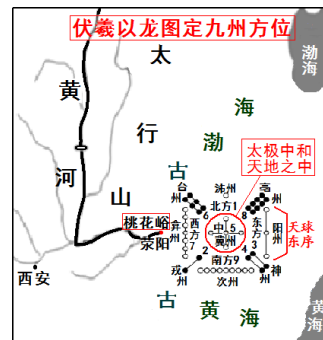


图-7 黄河下游洛书九宫对应九州方位图

据战国时期魏国大梁（今开封）编撰《竹书纪年·前编》记载：“伏羲始定四海之广，作八卦分九州，制九宫，因此制九州”^[30]。《竹书纪年·太昊庖牺氏》也记载：伏羲“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治九州”^[31]。可见，中国历史上最早九州的产生，是以伏羲根据八卦、九宫历法文化为依据划分的，九州也是早在伏羲时期就已经在黄河下游形成的特定历史、地理定位。

由于黄河下游洪水的不断冲积，形成了太行山、北邙山东部以开封为中心的“河州”，也是四面环绕大瀛海的“瀛洲”，并逐渐具备了华夏先民居住的自然环境。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的先祖燧人氏开始向黄河下游的灋水、沮水流域迁徙，并孕育了伏羲、女娲。进而，伏羲在灋水、沮水流域肇始了太极八卦等历法文化，划分了九州，“东瀛人”“东夷人”文化由此而衍生。

据出土于长沙王家祖山的战国《楚帛书·甲乙丙篇》记载：“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自（震），居于睢”^[32]。“睢”，也称“灋”，即指黄河下游、济水支流的古沮水、睢水。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载：“岁星与翼軫，晨出曰天睢”^[33]。“天睢”，是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天文学家石申，对木星在农历九月晨出东方的现象所赋予的名称。所以，“天睢”“睢水”在天象、地形

和开封天地之中的东方之位，正与睢水源头在开封古陈留，并向东方、东南方的睢县、睢阳流向相符。（见图-8）



图-8 汴（汜、丹）水睢水位置图

这篇伏羲居住“睢”水流域的记载，也与唐代著名画史画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古先圣王，受命应籙，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34]；明代考古先生赵搆谦《六书本义》关于“天地自然之图，伏羲氏龙马负图出于荥河，《八卦》所以由以画”^[35]等记载的“荥河”，在地理上相一致。因为“荥河”便是自河南荥阳东部的荥泽，东流中牟北部、开封南北的鸿沟、汴（汜）渠、夏代大运河。“荥河”同在灊（汴、汜）水与沮（睢）水的会合之地，也是伏羲肇始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和以河洲为基土划分九州之地。

故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水中可居曰州。”^[36] 东汉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也认为：“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曰角，世号太皞，都於陈”^[37]。文中“角”，指四象青龙七宿之一的“角”宿，是伏羲居住地的地理和文化象征；“陈”，指“勾陈”“中央”“陈留”，是中土、天地之中和东方、青龙、伏羲的位置所在。据清代易卜名家程良玉《易冒》记载：“勾陈之象，实名麒麟，位居中央，权司戊日。盖仁兽而以土德为治也”^[38]。说明“勾陈”“戊日”，本居五行的中央、土德、天地之中之位；“雷泽”又称“雷夏泽”，出自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禹贡》关于“雷夏即泽，灊、沮会同”^[39]的记载。灊水，

即河水的分支鸿沟、汴渠；沮水，即济水的分支睢水、灊水（见图-9），均在黄河下游首端的开封、陈留之地，也是尧帝九州的中州冀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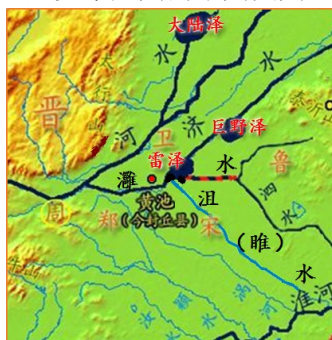


图-9 封丘黄池灊沮雷泽位置图

上古时期的九州中州冀州，是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居住和建都的地方，自然应当列为九州之首，即中央之州、中州之位。据战国时期著名经学家谷梁赤《谷梁传·杨士勋疏》记载：“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40] 由此，把上古时期的天子共同居住、建都于九州中州、冀州、开封古陈留的历史，已讲的明明白白。故明代《仪封县志》也记载：“唐虞仪邑，为冀州也，夏商因之。周属卫国，为翟人所灭。”^[41] 唐尧、虞舜至春秋时期的“仪邑”，为孔子周游列国“请见仪（邑）封人”的春秋卫国之地，也曾为卫、宋、郑、陈等国所占有，战国时期称大梁，汉代称陈留郡浚仪县，今为开封之地。

这一观点，一直传承到了汉代。据西汉易学著作《春秋元命苞》记载：“冀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曰冀州。”^[42] 这一记载，也把上古时期“帝王所都”与九州“冀州”联系到了一起。对此，西汉经学家刘安《淮南子·坠形篇》也认为：“正中冀州为中土。”^[43] 东汉经学家高诱注解：“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44]。所以，“正中冀州”“帝王所都”，也称“中土”“中央之国”“中国”。

西晋五经博士孔晁所注《逸周书》指出：“古者指天下为冀州”^[45]。可见，黄河下游九州的中州“冀州”一词，便成了上古时期帝王“天下”“中国”的代名词，并传承到了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三大学

之一、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46]九州之“中州”“冀州”“帝王都”“天下”“中土”“天地之中”“中国”等，在地理、历史、文化中的含义归于统一，也得到了古人系统阐述和认可，并在事实上定位在了黄河下游、大禹治水的鸿沟、汴渠、大运河、睢水流域。

明末学者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地舆》认为：“河南在华夏之中，故曰中州”^[47]。元代的“河南”，全称为“河南江北行省”，下辖今河南、江苏、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山东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省府为汴梁路治所开封；明代的“河南”，全称为“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简称“河南布政司”、或“河南省”，治所开封，下辖8府12州（含1直隶州）96县，大部分县名沿用至今。8府分别为开封府、河南府、归德府、汝宁府、南阳府、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直隶州为汝州。古代黄河下游的开封，在上古时期所处的“华夏之中”“中州”“冀州”的地理和历史位置，得到了古人的反复确认。

四、夏禹王都阳城在开封卑湿的大运河、鸿沟流域

大禹在黄河下游的九河、大运（汴）河、鸿沟、四渎治水时期，被尧帝封为“夏伯”，故大禹又称“夏禹”。故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夏者，帝禹封国号也”^[48]。

夏伯大禹，为黄帝、颛顼的后裔子孙。大禹居住的“夏”地，在五行为火、五时为夏季、五方为南方。本在中央黄帝所居五行土、五时长夏、五方中央的南方之位。据唐代王鹞《广黄帝本记》、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轩辕黄帝传》、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史典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嫫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器、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49]“大梁”，指战国时期魏国国都，是黄帝居住中央宫室的代称，今为开封北部济水南岸的“轩辕丘”之地。因黄帝居住的中土、中央宫室的“轩辕丘”，为洪水冲积形成的“悬（玄）圃土山”，且黄帝时期在山上建有“五

城十二楼”，故黄帝居住的轩辕丘也称轩辕山、或轩辕楼。今为黄河南岸的开封龙亭区柳园口乡轩辕楼村，村民世代复姓“轩辕”，且有明代“轩辕”家谱传承。（见图-10）



图-10 四时五行黄帝轩辕楼、大禹阳城图

开封北部的黄河，古称济水。上古时期的济水，以四象四方文化，称作玄武水、玄水、北济；以五行文化，称作水、黑水、冥水；以黄帝姬姓文化，称作姬水；以北方水神文化，称作若（弱）水；以高于开封南部禹王台夏都地面而言，也称悬水、悬河。悬河文化一直传承到至今。

此水在开封轩辕楼西部的河道分流后，冲积形成了青丘玄池、即黑岗黑池，史典记载为黄帝、商契出生的“青（晋）丘”，与黄帝杀蚩尤的“中冀”“青（晋）丘”互为印证。因自古以来黄帝轩辕丘高于开封地面数十米至十几米不等，也被古人称作昆仑山上的“玄圃”，或流经昆仑山上“五色河（水）”之一的“黑河（水）”，本是上古时期被黄河下游洪水长期冲积形成的河梁、堰堤或西高东低的土阜层台。

关于黄帝居住的中央宫室，被称作“轩辕楼”的来历，古人也由历史传承。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50]“方士”，是指尊崇河图洛书易学思想而推奉方术之士。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郊祀志下》也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51]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注引东汉泰山郡太守应劭言：“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常居。”^[52]“五城十二楼”，是黄帝时期依据伏羲“五行、十二地支”的历法方位文化，所创建“中央之国”的城郭、或十二候之位的地理标志。

既然，大禹在黄河下游、先祖黄帝居住昆仑山、轩辕丘之地的九河、大运河、鸿沟、四渎流域治水，那就应该安家、居住在九河、大运河、鸿沟、四渎流域，以便于生活，治水之土也取自昆仑山。因此，在黄河下游流域，也传承着大禹妃子涂山氏女娇“闻鼓”，为大禹送饭的史典传说。据隋唐时期经学家颜师古所注《汉书·武帝纪》引西汉刘安《淮南子》记载：“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53]“洪水”，即大禹治理的大运河、鸿沟之水，也是开封禹王台“阳城”北部数百米之地的汴渠（河），隋唐时期称作通济渠，今为惠济河，数千年以来史典传承不断，也成为了开封简称“汴”的文化来源；“轩辕山”，即大运河、鸿沟、汴渠、汴州北部的黄帝中央宫室“轩辕丘”“轩辕楼”；“涂山氏”，即指大禹妃子女娇，她“闻鼓声”为治理大运河、鸿沟、汴渠的大禹送饭，并在此地留下“屠（涂）府坟”“火神庙”“治台”“石牛”等地名文化。一说屠与涂本是一家，屠氏族谱里都包含有涂氏。

不仅如此，史典还记载大禹治理洪水、大运河的息土，也取自黄帝居住、建都的昆仑山、轩辕山之地。对此，西汉刘安在《淮南子·地形训》中讲的明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54]。“昆仑虚”，也称昆仑山、昆仑台、昆仑丘等，本质上是指大禹先祖黄帝居住和建都的中央之国、天地之中。古人认为，昆仑为地之中，地之中为冀州，故冀州与昆仑、地之中同地同义。可见，昆仑山本指黄河下游九州中州冀州、中央之国、天地之中的观点，是一个整体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体系，是华夏先民创世思想与创世实践的高度统一，正是古人“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具体方式方法。

鸿沟，地处黄河下游分流的开封南部之地。故西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引战国秦国丞相苏秦对魏国襄王言：“大王之地，南有鸿沟”^[55]。“大王之地”，是指魏国国都大梁城；“鸿沟”在大梁城之南，夏代称“大运河”，隋唐称“通济渠”，

北宋称“汴河”，今称“惠济河”。自夏朝建立算起，历史传承约有 4000 多年之久。



图-11 开封禹王台禹王庙康熙“功存河洛”匾图

大梁的大运河、鸿沟之滨，正是大禹治水时期在地势卑湿的开封所建“卑宫室”之地。（见图-11）“卑”，具有大运河、鸿沟地势低下和大禹宫室矮小之义，反映了大禹治水时期居住条件、自然环境的艰苦和简陋，也反映了大禹不畏艰难困苦、不顾修建家室，专心治理洪水的伟大情怀和自我牺牲精神。

对此，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渎。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56]说明大禹所建“卑宫室”、所开“沟渎”“九州”“九道”“九泽”“九山”，均在黄河下游的洪水泛滥之地，而不是在黄河中游地区的登封嵩山阳城高地，那里没有地势卑湿、经常泛滥的“沟渎”“鸿沟”“大运河”之水需要治理，也没有妃子女娇“闻鼓”送饭可以传达到近距离的“沟渎”为凭。

上述一类的史典记载，在西汉时期的记载还有多处。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言：“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渎，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57]又如《史记·夏本纪》言：“（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58]“渎”，同“渎”，指“沟渎”，即沟渎、水道、沟渠等，是我国古代的行水设施，起源很早。传说大禹治水时已经开凿了沟渎，以宣下泄水涝。文中的大意是，大禹在外面生活了十三年，虽结婚

才数日，为了治水却几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有进去。他节衣缩食，尽力孝敬神祖。居住在低下卑湿简陋的房屋内，尽可能地把所有资财用于治理沟渠。这里的“沟渠”，就是黄河下游的“鸿沟”“大运河”及“四渎”之水。

对此，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59]文中的大意是，孔子感慨地说：禹，无可挑剔。他自己粗茶淡饭，而供奉神祖的祭品却很丰盛；自己衣服朴素，而祭祀神祖的祭服却很华美；自己居住低下卑湿的宫室内，却用尽资财兴修水利。我对大禹的德行已无可挑剔。

此外，西汉经学家刘向《说苑》也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60]“卑小宫室”，是指地势卑湿、低下矮小的大禹住宅；“土阶三等”，代表进出大禹宫室的堂下为土垫的台阶，且只有三层，十分简陋。

对于大禹建宫室于开封禹王台一事，开封自古就有史料传承。如清代《开封府志·卷十八 祠庙》引明朝兵部尚书毛伯温记载：“吹台故有禹宫，宫之后有空室”^[61]，云云。其中“吹台”，也称范台（宫）、繁台、平台、禹王台、阳城等。（见图-12）



图-12 开封禹王台、古吹台图

对此，清代《开封府志·卷十八 祠庙》引清代河南巡抚、礼部侍郎顾沅《御书匾颂并序·御书〈功存河洛〉颂》言：“粤稽神禹，赐圭告成，顾瞻河洛，明德长存。后世报祀，吹台是因，岿然庙貌，平临汴城。”^[62]“功存河洛”匾，是清帝康熙专门为“河洛之地”的开封禹王台所赐亲笔御书；“赐

圭”，为大禹治水告成时，舜帝赐予大禹的黑色玉圭；“吹台”，最早是尧舜时期大禹治理鸿沟而建的宫室之地，后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在此台习乐，而称吹台；“汴城”，指因大运河、汴河（渠）而得名的开封汴州、汴梁、汴京都城，简称“汴”、或“汴城”。

开封自古为“河洛”都会，也是清帝康熙所赐御书“功存河洛”的历史原因。对此，清代初期藏书家、河南开封府按察使胡介祉《开封府志·卷三十七 艺文（七）·胡介祉禹王台》中有记载：“禹之功德溥（大）矣。其最莫如河洛。梁，河洛之都会也”^[63]。“梁”，指战国、西汉时期开封“梁（魏）国”“梁园”之地，也印证了开封吹台、即禹王台，在大禹治水于黄河下游河洛地区的历史地位。而开封最早也以汴水建城。故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开封府志·卷三十七 艺文（七）·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也记载：“维汴州河水，日中注阙，初距河为城”^[64]。这个“城”，就是自古以来依据汴河建城的开封。

黄河下游的洪水、地势卑湿的沟渠、妃子卑矮的宫室，闻鼓送饭的距离等，这些大禹开发大运河的史传因素，共同构成了夏伯宫室“夏邑”、大禹王都“阳城”必备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定位。没有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九河地理环境，没有大运河、鸿沟调济四渎分流的自然条件，没有大禹居住卑湿低下的“宫室”“夏邑”作依托，认定大禹王都“阳城”之地的依据就无法成立。而只有黄河下游大运河、鸿沟之滨的开封禹王台，才具备大禹建宫室“夏邑”和王都“阳城”的客观自然环境。

因此，战国时期赵国史官《世本·居篇》记载：“禹都阳城，在大梁（开封）之南。”同时记载：“言自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域也。然则居阳城者，自为禹避商均时非都也。”^[65]“非都”的原因，是大禹此时为夏伯，还未称夏王，是唐尧虞舜的臣子，故夏伯居住地称“夏邑”，而不称夏禹王都“阳城”。等到大禹称王后，“夏邑”才被称作“阳城”，两者本在一地。

西汉理学家戴圣所编《礼记》记载：“礼缙衣正义，禹都阳城，在大梁（开封）之南。”^[66]因阳城“自禹至太康”均“不易（移）都域”，故夏启之居、太康王都灌台也在此“都域”的较小范围之内。包括东夷人后羿、寒浞篡国，直到夏王桀等六世建都开封杜良乡老丘（见图-13），历时约216年之久，均在大运河、汴河流域的开封之地。



图-13 开封黄帝宫室、夏代王都分布图

对此，西晋学者臣瓚会所注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禹都阳城，在大梁（开封）之南。”^[67]

北宋宰相李昉等人所编《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州郡部一》记载：“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开封）之南。”^[68]

南宋秘书郎、开封籍人王应麟所编《通鉴地理通释》也记载：“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也。”大禹王都“阳城”，今为开封禹王台。^[69]

开封禹王台在战国时期，是魏（梁）国惠王在大运河之滨的范宫举行“逢泽会盟”，仿效大禹在王都阳城“称夏王乘夏车”之地。故西汉经学家刘向《战国策·或为六国说秦王》记载：“魏（惠王）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70]。由此，进一步印证了魏（梁）惠王在开封逢泽北岸“乘夏车，称夏王”的魏（梁）国范宫，正是大禹“乘夏车，称夏王”的夏都阳城之地。

到了西汉时期，大禹王都阳城、魏（梁）国范宫之地，为梁国孝王的宫室梁园之地。因为这里延续着大禹时期地势低下、卑湿的地理环境，后被迫迁徙到了睢阳（今河南商丘）之地。故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七》记载：“开封县蓼

堤，在县东北六里，高六尺，广四丈。梁孝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湿，东徙睢阳，乃筑此堤。至宋州，凡三百里。”^[71]

唐朝魏王李泰《括地志》也记载：“汉文帝封子武于梁，以其卑湿，徙睢阳，故曰梁。”^[72]“武”，即指西汉自开封梁园东迁睢阳的梁孝王刘武。再次印证了大禹治水的大运河、鸿沟流域卑湿之地，大禹居住的“卑宫室”在开封禹王台，即古“夏邑”“阳城”的历史、地理环境。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大禹在黄河下游治理洪水的鸿沟、汴渠，还是大禹的宫室夏邑、王都阳城，均在夏代大运河，即开封鸿沟、汴渠之滨的禹王台之地。



图-14 开封禹王台岫嵎文、福建赵家堡岫嵎碑图

开封禹王台建在龟蛇环绕的土台之上，台上的禹王庙内，保留着印证大禹治水的“禹王碑”文，也称“岫嵎碑”文。（见图-14）北宋时期开封朝奉郎刘跂，将开封阳城“岫嵎碑”文刻石到了湖南衡山祝融峰之上；明代赵宋后裔，又将开封阳城“岫嵎碑”文传承到了福建漳浦县赵家堡。由此，促进了大禹文化向中国四面八方和海内外的传承，成为印证大禹在开封治理大运河、鸿沟，建都开封禹王台、阳城的重要依据。

作者简介：韩鹏，河南夏邑人，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现为开封市社科联聘任专家、河南省孔子学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华夏文明发源地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中原华夏文明发源的学术著作十余部，曾获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特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课一等奖。

参考文献：

- [1] 孟轲. 孟子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03。
- [2] [39] 王宝琳 校. 尚书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07。
- [3][5] [19] [23] [25] [33] [50] [55][56][57][58] 司马迁. 史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06。
- [4] 马端临. 文献通考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05。
- [6] 郭璞 注. 尔雅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02。
- [7] [24] [54] 刘安 等编. 淮南子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09。
- [8] 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09。
- [9] 许慎 撰 段玉裁 注. 说文解字注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01。
- [10] 郭璞 注. 山海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03。
- [11] 刘纬毅 辑. 汉唐方志辑佚·冀州风土记（东汉卢植撰）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7-12。
- [12][13] 罗家湘. 《逸周书》研究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
- [14] [43][44] 高诱 注 庄逵吉 校. 淮南子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01。
- [15] [51][52][53]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06。
- [16][17] [67] 孔安国 孔颖达 正义 黄怀信. 尚书正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 [18] 蔡沈. 书集传（宣纸线装） [M]. 黄山书社，2012-08-01。
- [20] 胡渭 著 邹逸麟 编. 禹贡锥指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07。
- [21] 郭璞 等撰. 穆天子传·博物志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
- [22] 王安石. 王安石诗文鉴赏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08。
- [26] 王应麟. 困学纪闻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01。
- [27] [4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12。
- [28] 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2。
- [29] [61][62] [63][64] 开封府志（康熙三十四年整理本） [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8。
- [30][31] 王国维 著 黄永年 校.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03。
- [32] 李零. 子弹库帛书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07。
- [34]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2。
- [35] 赵搢谦. 六书本义（复印本）》，四库馆，1868-08-01。
- [36] 许慎 撰 徐铉 等校. 说文解字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8。
- [37] 王符 撰. 潜夫论 [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02。
- [38] 程良玉. 易冒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0。
- [40] 承载. 春秋谷梁传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07。
- [41]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9）嘉靖仪封县志 嘉靖郟城县志 嘉靖贡县志》，上海书店影印，1990-12。
- [45] 孔晁 注. 逸周书 [M]. 北京：中华书局，民国（1912-1948）。
- [46] 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点校.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 [47] 程登吉 著. 幼学琼林 [M]. 长沙：岳麓书社，1986-03。
- [48] 袁传璋. 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 [M].

北京：中华书局，2016-06。

[49] 张君房. 云笈七签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01。

[59] 杨伯峻 译注. 论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60] 刘向：说苑全译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04。

[65] 宋衷 注 秦嘉谟 等辑. 世本八种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08。

[66] 戴圣 著 王学典 译. 礼记 [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05。

[68] 李昉. 太平御览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04。

[69] 王应麟 著 傅林祥 点校. 通鉴地理通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1。

[70] 刘向. 战国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1。

[71] 李吉甫 撰 贺次君 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06。

[72] 李泰 撰 贺次君 辑校. 括地志辑校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02。

●学术动态●

河南科技大学王东洋教授为师生做学术报告

10月20日下午，人文学院邀请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校友王东洋教授在汉梁楼国学堂做了题为“西汉初年的都城选择与国家奠基”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高建副院长主持，发展规划处处长岁有生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志伟副教授、历史系教师于志刚博士及历史系各年级学生1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东洋教授回忆了九十年代后期在商师历史专业求学的美好经历。随后，他围绕“西汉初年的都城选择与国家奠基”这一主题，分别从“刘邦称帝与定都洛阳”、“制度建设与帝国奠基”、“迁都关中之争”、“洛阳都城功能延续”等维度展开，重点讲述了西汉初建都洛阳的历史原因及都洛期间的重要政治举措，考察了其又“西都关中”的深层次原因。王教授通过对史料抽丝剥茧的解读分析，还原了西汉初都城选择背后的诸多历史真相，认为西汉定都洛阳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四个月，但却做了系统的制度建设，为大汉帝国数百年的基业奠定雄厚根基，可谓影响深远。

王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学术兴趣，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史学素养。讲座结束后，部分同学和王教授做了亲切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最后，冯志伟副院长做了总结。他希望同学们以学长王东洋教授为榜样，本科阶段认真学好历史专业知识，夯实基础，努力提高史学素养，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者。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学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形式

——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

□ 李瑞华



歌谣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来自民间集体创作，并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传播渗透于社会生活。“歌”和“谣”的说法来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篇目《园有桃》里的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后来被统称为“歌谣”。关于歌谣的发生，古代典籍也有相应的阐述，如《汉书·艺文志》中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解释，而《春秋公羊传》

中则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说法。

纵览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歌谣作为一种民间创造，最初“起源于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繁衍的人类求生存的实践活动”^[1]，并未被赋予太多的诗学意义，正如朱自清所论：“歌谣以声音的表现为主，意义的表现是不大重要的”。^[2]但五四启蒙运动以来，歌谣以它在现代文学中启蒙使命的承担而和其他民间形式区分开来，成为左翼文学作家的革命武器。朱自清对“歌谣”的功能做出的论断，虽然背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激进姿态，但却道出了歌谣真正原初意义上的价值承载。事实上，歌谣在五四启蒙初期被纳入文学革命的轨道，乃是五四精英的有意为之，意在丰富新诗资源，为建立一种“民族的诗”找寻方向，但在以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随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歌谣体”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含义，承载了多重使命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不仅肩负起社会和文学变革的任务，还伴随左翼文学的战略方向而不断发展变化，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一、五四启蒙知识者对歌谣的发现和征用

现代文学发展中对“歌谣”的发现肇始于五四时期。鲁迅强调了民间文学的价值并最早提出搜集

和研究歌谣，而真正把这种倡导付诸行动的则是一批北大精英学者。^[3]1918年2月，在文学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并正式发起歌谣征集运动，其目的相当明确，一方面是从启蒙者角度出发，希冀在文学革命大潮下为新诗变革寻求更多的表达形式，以呼应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从启蒙的对象考虑，推崇大众易于接受的民间形式，契合“平民化”的启蒙需要。机构的设立本身便预示着反抗，以民间视角对抗陈旧的贵族化文学，对保守派和卫道士造成冲击，五四初期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提倡，使得“歌谣体”新诗这种形式在五四时期出现之初，作为新文学建构的重要资源，带有明显的文化变革的诉求，成为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歌谣体”这种被埋藏已久的民间形式在五四时期被引入现代新诗的建构时，倡导者对功用价值的期待就明显高于审美价值，体现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

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发起“歌谣运动”之后，俞平伯、刘半农等大批诗人纷纷投入到拟歌谣体新诗创作中，这种体式的新诗采取了方言入诗的手法，带有强烈的乡土地域色彩，一时间，“几乎形成了新诗的一个小小的传统”^[4]。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推翻旧传统为主要旨归，五四学人却把来自民间传统的歌谣援引到反传统的新诗建设中，诗人把歌谣作为新诗建设的重要资源，其中最为看重的便是它的真实和朴拙。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上“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以“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5]。他在论述歌谣和新诗的关系时中还这样说到：“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6]而对“歌谣化”的提倡和实践用力最多的刘半农，也和大多数启蒙者对于“歌谣体”的看法不同，更多着眼于从诗歌的审美质素出发将其纳入新诗建设之中。在《国外民歌译》序言中谈及创建歌谣征集处的缘起时，周作人重申自己对于

歌谣的旨趣“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真实”是刘半农诗歌审美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民歌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借着歌词，把自己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7]。而这些民歌的初创者，“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样的“抒发”，乃是“文字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素”^[8]。

从诗歌的审美功能出发，刘半农更看重歌谣所承载的民间文化价值，他搜求和整理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歌谣，甚至在地摊上收集唱本，并运用家乡江阴方言中“四句头山歌”的声调自拟民歌，1926年结集出版《瓦釜集》（1926年4月北新书局）和《扬鞭集》。《楚辞》中有“黄种毁弃，瓦釜雷鸣”一句，刘半农的《瓦釜集》就是要尝试尽一己之力用民歌的形式“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9]。诗歌采用了江阴方言，并配以江阴民歌的声调，集后还附上了他之前采集来的大量江南船歌，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写作的民歌体新诗集；《扬鞭集》则是诗人把自己诗歌创作十年中的作品加以删减，按时间顺序编成的集子。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来看，这两部称得上是诗集现代新诗史上“歌谣化”新诗的经典之作，沈从文就认为《扬鞭集》是刘半农诗歌中最美的作品，是“为官能的放肆而兴趣的欲望，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狴，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悱的心绪”^[10]。

在这些拟歌谣体的诗作里，张扬着民间纯朴的情爱欲望，散发出活泼生动的民间意趣，如《瓦釜集》附录第一歌：“结识私情过条河，/手攀杨柳望情哥，/娘问女儿‘你勒浪望啥个？’，/‘我望水面浪穿条能更多！’。”^[11]诗歌运用了大量方言展现江阴底层民众的风俗民情，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语言素朴粗犷，情感自由恣肆，体现出真实有趣的“民间性”特质。周作人也乘兴用绍兴话为

该书写下序诗：“半农哥呀半农哥，/ 侬真唱得好山歌，/ 一唱唱得十来首，/ 侬格本事直头大。……今朝轮到我做一篇小序，/ 岂不是坑死俺也么哥！/——倘若侬一定要我话一句，/ 我只好连连点头说‘好个，好个’！”^[12]与刘半农的歌谣相映成趣。但是，由于这种特质和后来左翼文化所建构的道德导向和审美倾向大异其趣，刘半农在歌谣征集上更多呈现出的学者研究兴趣要远大于革命姿态，加之受众在方言理解上的局限性，无法走向“大众”，因此，尽管这些民间歌谣把五四时期新诗歌谣化的理论提倡在实践上推向了新高度，但在以后的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却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在后来的文坛中，“以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于无人注意的情形中”。^[13]

在新诗坛上，和刘半农同时进行歌谣化诗歌实践的还有刘大白和沈玄庐，他们除了作为新诗诗人的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代表大会最早的几个发起人之一，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对歌谣的切入和利用上采取了更为贴近现实变革的角度，作为左翼诗人的早期代表，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侧重于站在鲜明的政党立场上，在诗歌内容中书写劳动阶层的生活和困苦，希望通过这一源于民间的形式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如刘大白1920年创作的歌谣体叙事诗《卖布谣》，“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土布稀，洋布贵，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14]单从诗歌艺术上来说，这首诗的审美价值远逊于其抒情诗，但却因其中包涵的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情绪，又加上1922年被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上曲子，把农村底层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演绎的如泣如诉，而受到启蒙者激赏。沈玄庐发表于《觉悟》上的《十五娘》，以民间说唱文学为基础加以创新，抒写了一个农村妇女悲惨孤寂的人生命运，被朱自清称作新诗史上“第一首叙事诗”。他们的创作使得“歌谣体”这种作为平民身份的文化象征意味得以彰显，于是，这一本来无意于功利价值的古老诗歌表现形式被援引到急剧变革的文学

中，以极端矛盾的方式进入了新文学的视野。

这种体式的出现和创作为其后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成员蒲风、杨骚、任钧等人强劲的无产阶级诗歌开启了一代诗风。此外，新诗对歌谣化的重视改变了以往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上的贵族性，呼应了五四启蒙时期“平民化”的价值诉求，也为后来的民族性和大众化的诗歌建设奠定了基础。由于五四时期文坛的欧化倾向，大部分歌谣体新诗并未引起关注，在众声喧哗的文坛中发出的声音相对微弱，再加上在自身创作上“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15]，歌谣体一时也为诗坛诟病。最重要的是，民间歌谣里展露的情思意绪有悖于五四启蒙精神，因而它作为一种新诗资源是否体现了现代发展方向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朱自清在观察了“歌谣体”新诗的发展后认为，歌谣不能称作新诗：“歌谣的文艺价值在作为一种诗，供人作文学史的研究；供人欣赏，也供人模仿——当作玩意儿，却不能发展为新体，所以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16]对于五四时期文坛对“歌谣体”新诗存在的争议，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五四的民俗文学研究既不是由国家官方发起，也不是市民文化推动的结果。追其导因，则应回到民国初年的历史中去看，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和知识菁英的功能与角色之变迁中去看。”^[17]追溯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起源可以发现，对民俗最初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是来自北大师生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的提倡，而从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一种文学体式的兴起和推动，还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动以及意识形态的变更演进，具有直接的关联，这也是为何在以后的左翼主流话语中，对刘大白和沈玄庐的“歌谣体”新诗意义和价值的较为推崇的重要原因。

二、“大众化”语境中“歌谣体”新诗的承担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深化，五卅惨案点燃了革命激情，阶级观念日益突出。郭沫若写下了《革命与文学》，把文学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类，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写实主

义的文学，号召文学青年们“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18]。成仿吾在1928年初也谈到文学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为我们的对待。”^[19]由此提出“普罗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茅盾在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并规定了创作的题材、方法和形式，“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懂，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因此，作家必须竭力排除知识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20]。“大众化”逐渐成为左翼文学的主流话语，作为“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语”成为左翼文学言说的主要方式。在诗歌领域，“大众化”也成为左翼诗歌的艺术目标，它要求新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政治动员，争取最大限度地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歌谣以其民间特点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被进一步赋予特殊功能和意义。

诗歌“大众化”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导下成为文学主潮，而中国诗歌会的“新诗歌谣化”运动则最为鲜明地贯彻了这一方向。193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之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组织，倡导采用朗诵诗和民歌体等多种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形式从而推进诗歌大众化，其创作宗旨与左联的革命导向保持高度一致，因此，这一组织所致力“新诗歌谣化”，和左联30年代提倡的“大众化”之间具有同构关系。1933年2月，《新诗歌》创刊号的《发刊词》发出了为“歌谣化”新诗定下基调：“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21]其中所说的“大众歌调”就是要从以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洋化和风花雪月的风气中拯救诗歌，借用民间文学资源以承担新诗的社会使命。事实上，

早在中国诗歌会成立之前，瞿秋白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言说，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直接手段，使文艺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艺”。在1932年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中，瞿秋白再次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22]作为左联领袖，瞿秋白的论述对中国诗歌会产生了直接影响，歌谣作为新诗的一种资源，以牺牲审美感性的代价被纳入了现实政治框架，束缚其上的意识形态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当时阶级意识和政治功利化上升的产物。

左翼启蒙下的“大众化”要求采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以实现“教化”，他们认为诗歌是听觉的艺术，因而极其重视歌谣的作用，为了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23]，《新诗歌》在1934年6月的第2卷第1期还特意开设了《歌谣专号》，刊出歌22首，谣22首，时调与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民歌数十首。诗人穆木天在“歌谣专号”中写道：“新的诗歌应当是大众的娱乐，应当是大众的糕粮。诗歌应当同音乐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民众所歌唱的东西。是应当使民众，在歌着新的歌曲之际，不知不觉，得到新的情感的熏陶。这样，才得以完成它的教育意义。”^[24]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运动通过诗歌创作实践把新兴的阶级话语和歌谣体这一传统形式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倾向。中国诗歌会诗人任钧在《我歌唱》中慷慨激昂地写道：“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音，/去唤醒沉迷的大众……”^[25]整首诗歌以宣传号召为主，语言表达平实简洁，形式上自由奔放，而诗歌中的“唤醒沉迷的大众”则紧密契合左翼诗歌实践所提倡的“为着教养、训导大众”^[26]的“大众化”目的。但事实上，这些歌谣体新诗尽管采用通俗形式为手段，具有强烈的鼓

动性和感染力，却仍然和大众的心理存在距离，诗句“唤醒沉迷的大众”背后潜隐的正是知识分子对大众自上而下的“训导”，这也是当时左翼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时存在的问题，“大众化”的口号和贵族式的姿态出现了一种悖谬。虽然中国诗歌会尝试“旧瓶装新酒”，以民间传统形式承载新的时代内容，但却缺乏一种真正“向下”的眼光，因此尽管杨骚借用中国弹词的格式和调子创作了《受难者短曲》，却反应微弱，成为歌谣体新诗创作一个失败的例子。民间形式成为知识者写作中的乌托邦，而真实的民间并没有和知识分子融为一体，正如鲁迅早年所描述的启蒙者困境中所述，先驱者在追寻光明时“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稿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湏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他们的箜篌了。”^[27]存在于民众和启蒙者之间那难以消弭的“厚障壁”，使得左翼启蒙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实践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歌谣体新诗显然变成知识者的集体独白，而真正需要表达自我的民众则成了沉默的失语者。

三十年代左翼“大众化”的倡导把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文化选择植入新诗创作，其间蕴含的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讨论又赋予了歌谣体新诗以新的历史使命。三十年代，面对日益激化的民资矛盾，“民族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话语方式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左翼力量还是国民党方面都非常重视“民族形式”的运用。站在左翼启蒙角度来看，“民族”主体即是工农大众，早在左联期间，“大众化”和“通俗化”就成为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抗战全面爆发后，宣传抗日和动员群众的要求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内在驱力，进一步把“大众化”推向了中心。因而，左翼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形式”时侧重于对工农大众的启蒙，而“旧瓶装新酒”则是这一时期左翼启蒙作家们创作的主要方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下，“歌谣”这一

贴近民间的形式就成为承担新诗“大众化”实践的重要工具。虽然鲁迅在三十年代“大众化运动”讨论中曾经对“旧形式”这一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早采取旧形式应“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28]但是，左翼知识分子在利用这一形式的时候，带着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启蒙预设，致使进入新文学视域中的歌谣创作，已不同于以往歌谣所呈现出的民间化和原生态的特点，而是承载着更多的意识形态任务，在诗歌艺术上也缺乏深入探讨。施蛰存就批评中国诗歌会的大众化“乃是民间小曲的革新，并不是新诗的进步”^[29]。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抵御外侮的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如何更好地利用“民族形式”以配合时代变化成为文坛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郭沫若在分析了当时的现实状况后认为，“民族形式”并非是复活旧形式，而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所以“为鼓舞大多数人起见，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使用价值，放在民间形式上面”。^[30]而歌谣源自民间，作为民族传统中“野趣”的一种重要载体，在民族认同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基础功能，而且由于表达方式和语言上的通俗性和直接性，更由于它的构成和生产始终建立在集体性的想象和幻想的基础上，和大众和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思想感情相吻合，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而在民众中易于传播。四十年代“民族形式”的倡导是对五四以来“全面反传统”宗旨的一次反拨，也是中国现代启蒙者从精英化真正走向大众化的重要转折点。考察“歌谣体”新诗进入左翼启蒙话语的路径，可以看到现实需求的驱动，以及在这驱动背后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引导，在整合后的“民族文化”观照下，这一诗歌形式被左翼作家挪用到现实经验中，和当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针对被启蒙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功用。

三、从民族形式到“人民”话语的建构

四十年代战争语境下，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如

果说三十年代“大众化”文艺的倡导是左翼知识分子由上而下的启蒙，那么进入四十年代以后，左翼文化界出于动员民众的需要，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创作形式，把重点转向发动民众，希望利用大众自身的文化素养来实现文艺的大众化。1938年初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面向大众发出“征求歌谣”的启事，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使用“民族形式”一词，提倡树立“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报告无疑对左翼文坛起着决定性作用，延安文艺界反响强烈，其影响甚至还伸展到国统区，从而引发了之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民族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话语之一，歌谣体新诗的发展也在“民族形式”的弘扬下获得了广阔的生长空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所谓的“新文化”应该是把“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两者相结合，这无疑给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指向。这些文艺活动和方针政策说明了这一时期左翼文学对“民族形式”的利用主要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试图从美学层次上去分析和评价四十年代的“歌谣体”诗歌的价值也许是徒劳的，知识者对于现代民族形式的乌托邦想象以及左翼内部多种力量的合力建构，共同形成了“歌谣体”新诗生长的历史情境。

左翼文学历来有两大传统，一是让文学起到鼓舞人民和唤起民众的现实战斗作用；二是试图解决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尽管左翼文学肇始之初就抱着启蒙大众的真诚理想，但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入了“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的误区，无法做到真正的沟通和平等。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讲话》中提出，希望作家们转变高高在上的俯瞰大众的姿态，把注意力投射在接受主体即“工农兵”身上，真正融入大众，采用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创作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文学。尤其在谈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无疑为“民族形式”的利用又加强了理论上的支撑和政策上的导向。这一姿态的改变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分水岭，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文学通俗化成为众多左翼作家创作时抱持的观念，同时，高雅艺术由于和群众接受水平不相匹配而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歌谣体”新诗也借由意识形态话语被进一步重视。

承续着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对新诗歌谣化和大众化探索的传统，结合毛泽东讲话内容的精神和对“民族形式”的合理运用，四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歌谣化诗歌创作实践中收获颇丰，国统区有以袁水拍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解放区有以李季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歌颂为主调的民歌体叙事诗，两种不同基调的诗歌相颉颃，成为这一时期“歌谣化”新诗的优秀代表，把“五四”早期白话诗倡导的“歌谣体”新诗试验和“诗的平民化”命题发挥到极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诗作者李季深入陕北民间，亲自采集了近三千首信天游民歌加以利用和改造，把歌谣的形式和方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歌体叙事诗。这种新型民歌把陕北信天游中大量关于“性”的朴野表达过滤成男女间纯洁的爱情故事，来自贫农家庭的男女主人公则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使民间话语不仅获得了一个合理合目的性的“民族形式”，还植入了现实政治中最为核心的阶级革命斗争主题，从而使阶级性和民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里的民间已失去了它原初的意义，成为被革命话语改造的“民间”，一种经过“人民性”伦理建构的“民间”。长诗的出现契合了左翼文学对“人民”话语的诉求，成为延安左翼文化表述中“划时代的大事件”，迅速走向经典化。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采用通俗易懂的“山歌”这一创作形式为普通老百姓代言，讽刺国民党当局，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与亲近，在国统区获得了高度评价，这种政治讽刺诗在四十年代社会场域中发挥出独特的政治批判功能，成为国统区“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向”

成功结合的典范代表。可以说，在歌谣体新诗的探索中，四十年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

从二十年代初期北大学人对“歌谣体”的探讨，到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大众化”口号下诗歌和民间的结合，再到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大力提倡，歌谣这一民间形式在左翼启蒙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可否认，歌谣体新诗的发展历程，是启蒙话语、民间话语和现代诗学相伴相生和复杂纠葛的过程，也是左翼话语和历史语境的双重体现。虽然诗歌中承载的政治功利性使它在社会革命的现实层面获得了众多赞誉，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很多欠缺，出现了许多粗浅苍白之作。从现代美学意义上来看，过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会造成艺术上的“伪革命”状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论：“文学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为‘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艺术品越带有直接的政治性，便越削弱了疏隔的力量，缩小了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31]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中国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发展，4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社论文章《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接下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在一系列行政干预下，一场群众性的诗歌“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面对民歌在新诗创作中几乎一统江山的局面，关于新民歌运动的争议也越来越多。何其芳就认为，因为民歌体自身的限制，它“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32]。他从诗学角度分析指出，民歌体式的弊端主要在于其句法和现代口语的矛盾，以及相较于现代格律诗在体裁上的单一狭窄，所以在新诗的民族形式建构基础和来源上应该多元化，建议“批判地吸取我国过去的格律诗和外国可以借鉴的格律诗的合理因素，包括民歌的合理因素在内，按照我们的现代口语的特点来创造性地建立新的格律诗”^[33]。何其芳把现代口语作为新诗建设的主要因素来考虑，提倡

为新诗构造一种合适的格律，然而他关于格律诗的设想引来了大量批判，他有益的提醒也很快就被淹没在“新民歌运动”狂热的众神喧哗之中。

福柯曾在传统上的“权力”理论上引入了“知识”和“话语”等概念，作为生产装置的“权力”以话语为载体，话语往往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时代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力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无论科学、法律、人文科学甚至医学、莫不如此。”纵观歌谣体新诗在现代文坛的发展，从左翼文学对它的选择和建构再到围绕它的边缘化或中心化的种种争议，背后都有复杂的权力运作的程序，对形式的选择和建构本身就标示了某种价值判断乃至价值等级。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创立初衷是要让民俗成为一种有关“现在的”学问，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认识和改造社会生活”，^[34]歌谣征集是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从这种宗旨来看，歌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方式也是现代启蒙的题中应有之意，歌谣体新诗发现和征用本身又是启蒙者借助民间文学向传统挑战和反抗的一种方式，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歌谣被重新发现并引入现代新诗资源，到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的“新歌谣运动”，再到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歌谣承载了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多重功能和意义，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但同时也由于各个时期政治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相应地被赋予不同的特质，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随着场域的不断变化而生成不同的现实意义。

历史和社会语境等外部条件的干预固然对歌谣体新诗的发展走向造成一定影响，但从诗歌的内在发展来看，诗歌形式和诗歌本质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注定了它在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行之不远的命运，正如有学者对“新民歌运动”的分析：“‘新民歌运动’可被看做‘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

化’（民间化乃至民族化）的一次努力。只不过，众所周知，这次努力最终以‘古典’+‘民歌’的极端模式纳入了政治化的轨道，从而适得其反地将诗推向它的反面即‘非诗’，新诗的‘大众化’也未能真正实现，而是越来越远离这一目标。”^[35]现代新民歌由于充塞了越来越多意识形态的内容，销蚀了它天然具有的质朴本真的个性，也缺乏真正的民间立场和民间世界的自在呈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其审美性特质，也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诗歌资源应有的魅力和光彩。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歌谣体”新诗虽然表面上出现了短暂勃兴，但却渐显无力，在诗歌艺术上已难见昔日荣光。通过“歌谣体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命运，诗歌的民族形式如何与复杂变动的时代相结合，“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36]，这些都将是以后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和建设的历程中需要不断致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瑞华，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 [2] 朱自清.：《〈粤海之风〉序》，《民俗》周刊，1928年11月28日，第36期。
- [3] 征集歌谣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两个月中间征集到歌谣一千一百多首，其中一百多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
- [4] 张桃洲：《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 [5] 周作人：《歌谣》，《晨报副刊》，1922年4月13日。
- [6] 同上。

- [7] 刘半农：《海外民歌序》，《语丝》第一二七期，1927年4月。
- [8] 同上。
- [9] 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北新书局，1926年。
- [10] 沈从文：《论刘半农的〈扬鞭集〉》，《文艺月刊》2卷2号，1931年2月15日。
- [11] 刘半农：《瓦釜集》，北新书局，1926年，第63页。
- [12] 周作人：《题半农〈瓦釜集〉》，刘半农《瓦釜集》，北新书局，1926年，第1-2页。
- [13] 沈从文：《论刘半农的〈扬鞭集〉》，1931年2月15日《文艺月刊》2卷2号
- [14] 刘大白《卖布谣》，1931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第14-15页。
- [15]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中华书局，1936年，第108页。
- [16] 朱自清：《歌谣与诗》，朱正编注：《朱自清集》，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
- [17] 刘禾：《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45页。
- [18]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 [19]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第1卷第9期。
- [20] 茅盾：《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8期
- [21] 同人：《发刊词》，《新诗歌》创刊号，1933年2月。
- [22]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 [23] 蒲风：《关于前线上的诗歌写作》，《蒲风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22页。
- [24] 穆木天《关于歌谣之制作》，《新诗歌》1934年6月第2卷第1期“歌谣专号”。
- [25] 任钧：《战歌》，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7年。
- [26] 瞿秋：《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 [27]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252页。

[28] 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29]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1卷第1期，1933年11月。

[30]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1940年6月9—10日。

[31]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页。

[32] 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何其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

[33] 同上。

[34] 中国的民俗研究开始于1918年2月1日，标志是蔡元培先是成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在《北大日刊》上征集歌谣，1920年冬又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17日，编印《歌谣》周刊，基本理论大多来自西方。1925年6月《歌谣》周刊停刊，歌谣运动走过了7年时间走向衰亡，直到1936年胡适主持复刊《歌谣》，又出了一年。

[35] 张桃洲：《“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36]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9～640页。

●学术动态●

郑州大学崔波教授应邀来人文学院做学术报告

11月16日上午，郑州大学崔波教授以“范仲淹的读书生活及家国情怀”为题，在人文学院应天国学堂为学院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冯志伟副院长主持报告会。

崔教授从宋代读书日兴、学校兴办谈起，进而介绍了范仲淹的读书生活、研究著述及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崔教授还结合自身阅读体验，阐述了青年学生要敬畏圣贤及深入阅读经典的重要性。崔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风趣，思想逻辑性强，使在座师生受益匪浅，反响强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学子文苑 ●

从《美的历程》认识理性之美 与感性之美

□ 李园园

从蒙昧觉醒的时代到思想艺术迸发的时代，从本土五千年璀璨文化到西方几乎埋葬在土里、海里的历史，理性的精神在文明进程中无数次绽开绚烂的艺术玫瑰，美得惊心动魄、美得与世殊俗。然而文明诞生之初、文化历史的每一个转折，也往往会源于感性状态下的灵光乍现，燃起燎原之势。如果文学的历史没有理性，我们只能陷于缥缈虚幻、蒙昧黑暗的艺术世界，也更不会有民族的文学了。如果文学的历史没有感性，就更遑论文明的诞生了，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大抵也从不脱出封建的桎梏的。在有五千年丰富历史与文化艺术财富的我们的国度，理性之美与感性之美常常交织碰撞，奏出动人的艺术。抽象的飘逸之美与具象的人间之美都成了难得的经典，士子们出世之心与入世之志似乎也并不矛盾，正统理学与世俗文学之争也总是交替呈现，谁也不曾真得输了谁去，理性之美与感性之美



造就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文士的价值观。

一、抽象美与具象美的演变

若论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神话必然是许多中国人的首推。然而经过几千年的流传，神话则变成了“人的神话”、“君主的神话”。虽然《山海经》里的故事还充满着奇异的想象和浪漫的激情，而儒家却在北中国把这些朦胧时期尚且感性模糊的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原是说的有四面脸，“黄帝三百年”原是说黄帝活了三百年。在后世的解读中，却更倾向于黄帝派了四个大臣去治理四方，他对于

百姓的影响力延续了三百年。在被儒家注解过的《诗经》里，《蒹葭》一首中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女，而被认为是后妃之德。如果说这些看似荒诞不经、虚幻缥缈的神话故事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那么儒家学者归为现实世界的解读就可以视作理性精神的启蒙。这样的例证在雕塑、建筑、绘画等领域也有表现，且更为具体。

麦积山石窟雕塑大多是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表现出对世间一切完全的超脱，却正折射着魏晋士人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汉代建筑艺术里则透着人对世界的征服的气势，突出的是不事细节修饰的高度夸张的形态体姿势和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粗线条、粗轮廓的整体形象。在飞扬流动中，表现出生动活跃却又古拙气势的美。宋初山水画则强调既不满足于追求事物的外在模拟和形似，尽力表达出某种内在的风神，这种风神又要求建立在对自然景色，对象的真事而又概括的观察、把握和描绘的基础之上，要求对自己熟悉的自然地区环境的真实描写，使人清晰的感受到那整体自然与人生的牧歌式的生活风神与人生理想。如果说这里画家匠人对时代气象和社会观念的感知是理性之美，那么通过艺术的呈现即是有感于时代的感性之美的创造。不同社会、时代、阶级，客观上的截然不同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共同认知的，然而相同的内容也能开出不同颜色的花，这当然是感性之美的作用。

二、出世与入世的选择

我们谁也不敢轻易断言到底出世与入世究竟哪一个才是最佳的选择呢？良臣与隐士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都被尊崇到了超然的地位，这也无关道德，不过是特殊时代下关乎人生价值的选择。魏晋时狂放不羁的“竹林七贤”，洒脱自由的裸奔、醉酒、嗑药，用现在人的目光来看，活脱脱一群地痞无赖。而如果将这些洒脱超然的人放到清平盛世，他们或许大有可能做一代治世良臣。王安石不遗余力的改革图新，严谨、务实、是十分古直的形象，难道他内心深处就没有那么一小片不想裸奔，不想醉酒、嗑药吗？不过是前者不得不活在了感性的世界里，后者更受理性精神的支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魏晋士子们高谈老庄，纵情享乐，似乎是那么超然自得，那么潇洒不群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文人们心怀天下、兼爱黎民，似乎是

那么庄严神圣、义不容辞。而魏晋文人也全不都是外在的放浪形骸，北宋士子们也浅斟低唱、哀婉凄切。相反，竹林名士们于朝政还是留心的，也不能忘掉“死”。无论是陶潜的超脱尘世还是阮籍的沉湎酒中，实际都只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而已，其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阮旨遥深”，说的是阮籍咏怀诗中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这正是理性之美的隐现。如若不然，他的人头或会搬家的更快。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在《陶集》里也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虽然现实黑暗，但是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并没有对整个社会人生的空漠之感。“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与其无望的苦痛，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无疑是理性之美所呈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犀利如王荆公，也会细腻、亲切的描写日常生活，表达内在积极的生命意兴，有感性的诗意与自然之美。中国文学以抒情胜，这是感性之美的所在。但是，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想结合统一，这是理性之美的所在。理性之美与感性之美的和谐，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和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作品。这正如文学作品中逐步形成的，历来被后人所讨论效法的出世与入世的价值标准。

三、正统与世俗之争

什么是正统？什么又是世俗？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标准，但究其根本，到底是关于“人”的文学。我们能仅看到明清虚伪、矫饰、扭曲了的儒学经义就否定儒学全部都是不好的吗？传承千年的儒学也毕竟滋养出了一个像我们这样良善的优秀民族。一种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奔流不息，也必然是有内部矛盾相互转化、此消彼长的过程。如若不然，她就没有黄河的九曲回肠的精彩了，若只有一种偏向，她也很有可能就成了断头河了。儒家在汉代没有被

奉为经典之前也不过是世俗文学的一种，集大成如孔子也是带着三千弟子四处流亡，狼狈极了。一种文化的觉醒，总要历经坎坷，这也正如人类在与猛兽搏斗的一次又一次惨烈的伤亡中，妙手偶得了尖锐锋利的石器那一刻必然是感性之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如何制作更多的可以防御攻击的武器，如何建设安全的家园，这又是一个漫长的需要理性之美不断努力的过程，而这个艰难漫长的过程里也一定时时有感性思维的迸发，反之这一文明也必然走向落幕了。孔子有感于礼乐崩坏的现实，于感性的灵感乍现中首创儒学，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二程和朱熹等等，他们不断的去思考儒学对于社会的责任以及社会需要儒学的什么，不断丰富那棵柔嫩的小树长成参天大树，在儒学的传承中恰如其分的承担了理性部分的责任。那么魏晋的玄言、游仙题材，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世情小说也都盛极一时，正说明了正统与世俗此消彼长，有时甚至并行存在的过程。那些生动浪漫、洋溢着感性之美的世俗故事或许并无意与儒家正统

分庭抗礼，李贽也不过只是表达了“夫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也”。也确实没有那么深刻直接的理性因素，也的确确实偶然开了不一样的花，结了不一样的果。总而言之，历代文人维护正统也好，反应反封建的先声也好，都不过在思索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要做怎样的自己？分封制的崩塌迎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也取代了明清的腐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与正统，不过是文学艺术上理性之美与感性之美的不断交手，而也确实并不算切磋，用碰撞形容更为恰当，也因此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时代。

没有绝对的理性之美，也没有纯粹的感性之美。有的只是每一个不同时代的独特故事而已，如汉之拙重，魏晋之超然，盛唐之激昂，宋元之雅俗，明清之启蒙。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李园园，郑州西亚斯学院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升本）专业 2021 级学生。

●学术动态●

人文学院高建立院长应邀参加

“勉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梁漱溟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

2023 年 10 月 13—16 日，“勉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梁漱溟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台湾地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等海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高建立院长应邀参加了研讨会和纪念会。

此次会议就“勉仁书院与中国书院教育”“梁漱溟的哲学与文化思想”“梁漱溟勉仁教育思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佛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文明互鉴”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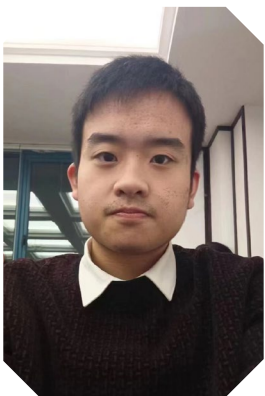
在研讨会间隙，还召开了梁漱溟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北碚区政协主席以及市、区民盟主要负责人、梁漱溟先生亲属代表等参加了纪念会，与会代表还向梁漱溟先生雕像敬献了花篮，参观了梁漱溟先生展览馆。

文本视角与史事叙述

——读《明代权力构筑与运行逻辑》

□ 崔永跃

方志远教授所著《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一书，精准地分析了明代政治体制架构与流变，一直是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必读书目。最近再次研读此书，感触良多，谨以此文记录所感，兼与同好浅作分享。



全书将明代政治精准划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为：明代中央决策的权力关系（内阁、内监与皇帝）、明代中央行政系统的权力制衡（外延、内府与科道）、明代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巡按、司道与乡里组织），围绕着权力金字塔“上中下”分别展开论述，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十分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明代政治，下面对上述三个部分依次详细展开。

一、重组与构筑——皇权及其延展的中央决策系统

明太祖自建国之初，便十分重视权力机构之间的平衡，他吸取元衰的教训，一改中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洪武十年（1377年）夏天，明太祖连续采取了三个措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五月，“命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1]。六月，下敕谕一道，以“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2]为由，要求凡军民言事奏章，“实封直达朕前”。七月，设置通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即废除中书省后的十五年，明太祖下了那道著名的“不许复立丞相”，“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3]的敕谕。敕谕是明太祖对明初政治中央权力结构改革的调整与总结，也是对历代中央—地方权力组织结构利弊的总体认识。根据这道谕的精神，明代中央权力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权力的分化，职能的分责，《明史》中生动的记载了明太祖对此番设计的态度，有了“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

总之，所以稳当”，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明太祖设计的这座权力“金字塔”，以其本人亲理政务作为统治基础，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等军事强力部门作为国家权力强制力的基本保障。行政上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主体骨架，另设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文官管理机构并立，相互制衡、分别对皇帝负责。这一权力结构的设计并最终定型，既反映了明太祖力图在政治体制上扫除一切危及皇权的因素以维护朱明皇朝统治的个人主观意志，也反映了明初统治阶级在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权力斗争、总结了先代政治治乱经验之后，希望通过强化君权、保持各层次权力的动态平衡，以缓和内部矛盾、维护长远利益的政治意向。

由于这一体制较多地注入了明太祖个人的专权主观想法，尤其是受到明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强烈影响，经常出现过于极端化的事件，如明太祖对于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的专断要求，弘治《明会典》卷2《吏部一·事例》载：“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又载：“凡江西、浙江、苏松吏，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许于户部内用。”万历《明会典》卷5《吏部·选官》载：“凡户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凡户部更，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许用江、浙、苏松人。”《明史》卷72《职官志一》载：“（洪武）二十六年，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这是有关明代任用户部官员和吏员实行地域回避制度的三条权威性记载。“洪武十五年发生的空印案和十八年发生的郭桓案，对于苏松江浙更不得任户部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太祖认为，空印案和郭桓案所以严重，就在于中央户部的主管官员和地方把持财赋的吏员相勾结”。^[4]由此可见，君主个人所接收到的一切信息，而后产生的印象，延展出政策端所推行的政令，所有的评判规则，评

价标准都来源于君主的个人意志，仅凭先前的案例，与对江浙人的刻板印象，不加考证，不去研判，任意武断地对其持以限制打压的态度，明太祖“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的要求，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一个例证。

内阁与司礼监是明代政治的特殊产物，它们的出现，代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强化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种经过授权的秘书政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常态的权力架构已经无法满足晚期封建社会的需要，是一种异于常态的“变态”。我们该如何解释，如何界定这种特殊的权力衍生物呢？笔者认为，这是统治者吸收对过往王朝的治乱兴衰经验之后，为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动态平衡，总结组合出来的独特政治产物及其一套特殊的具有中国式古典帝国特点的政治模式。权力不会消失，只会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转移与调整，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及缺失法治基础的人治社会，权力的大小往往并不是由品衔、级别、名号所决定，而是看它距权力中心（君主）的关系距离远近来判断。这也就解释了古代内臣，内廷，宦官权力之大的原因，为什么会出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的情况。权力由核心中枢向周遭外延让渡，外延作为中枢意志的具体权力映射与物质体现，作为中枢权力核心的抓手去管理国家，处理政事。

明代的朝堂政治相对于其他朝代，又带有别样的特点，即“庙堂政治的双轨化”^[5]与“中枢权力的分解化”，“双轨化”体现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合作共治，而“分解化”即明太祖采取的“以文制武，以内制外”的原则进行的具体权力分配。与宦官问题严重的汉唐一样，明代中后期也陷入了严重的宦官专权问题，但并未产生过党锢、甘露之事，宦官的权力即使到魏忠贤“立生祠”^[6]，众人山呼“九千岁”的时期，也仍然处在相对的牵制之中，致使其始终作为皇权的工具所存在。这固然有很多

的原因，其中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便是明代宦官的知识化趋向（儒生阉割入宫与内书堂等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的设立），宦官的文化素养与水平在此时得到提升，长久以来统治者对精英宦官进行的文化思想教育，这使明代的宦官与文官集团具有较多的思想共识。同时，多年来儒家文化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也影响到高级宦官的思维理念，也能解释终明一代并未出现汉唐宦官一般废立君主之事。^[7]

二、抵牾与磨合——中央行政系统中的权力制衡

明太祖攻取南京之后，立江南行中书省，号令四方。又于江南行中书省内设四部、合理钱谷、礼仪、刑名、营造诸务，这相当于后来的户、礼、刑、工各部，但是而缺吏、兵二曹。用王世贞的话说，是“战事紧迫，势不遑设”^[8]。而实际上，这部分缺失的权力是由明太祖亲自掌握的。明太祖在创业之中就认识到官员任免权和军事指挥权的绝对地位。建元洪武后，国家已成规模，设官也需完备，遂按隋唐宋元以来的旧制，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正三品衙门，仍属中书省。各部均设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等官。

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在设立通政司以沟通和内外诸司的直接联系之后，命六部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实际上已开始越过中书省直接向六部发号施令。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同时升六部为正二品衙门，直接对皇帝负责。于是，原中书省之政既分于六部，又终于皇帝。洪武十三年四月，罢御史台及各道按察使，十五年十月，置都察院及十二道监察御史，十七年正月，升都察院为正二品衙门。以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合称“七卿”。加上通政司、大理寺，

遂为“九卿”^[9]。在废中书省的当天，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也就是明太祖所设计的既“分理天下底务”又“彼此颀颀、不敢相压”的“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虽然说是“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但这些衙门之间的地位及具体事权却仍是轻重有别，大小不同。六部之中，有高下之分、尊卑之别。吏部，户部，兵部因其“事繁权重”，地位高于礼、刑、工三部，称为上三部。六部之间，六部与六科之间，以六部为代表的外延与内府“二十四衙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又在内廷中达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稳态”。明太祖建国所设想的“彼此拮抗，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虽在体制上保证了皇权的绝对独断，专制政治的绝对掌控。但另一个方面，这也造成了各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的情况（也是中晚明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一大原因）。

《明史·宦官传》载：

范弘，交陆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弘）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书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监太监，偕（金）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10]

《明英宗实录》中载有英宗给王振的一道敕文：

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侍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肆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朕自春宫至登大宝，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良多。兹特救赐给赏，擢为尔后者以官。^[11]

从以上两篇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单元，对于明王朝中

枢权力运行的特殊作用。因其与权力核心独特的关系，明朝对于这批人，采取了同以往不同的措施，也即对其进行知识文化教育。方志远教授在其论文《明代的“知识宦官”》中这样说道：“随着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明太祖对中央权力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皇权的改革，外延政府部门的权力被削弱了，而宦官机构经过几次扩充，建立起一个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的庞大体系，成为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宦官文化水平的要求也提高了宦官知识阶层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明代宦官知识阶层的形成，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儒士的自宫或被强制阉割，二是设内书堂对小内使进行正规化教育，三是部分宦官的自学。”^[12]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宦官，培养什么样的宦官，都有十分系统完备的制度，更加体现了在中央行政系统中，文官与宦官“双轨制”的权力运作体系。

另外，还要注意，明代的宦官与汉、唐宦官有着鲜明的不同，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要点便是明代宦官的“知识化”，与其称为内廷近侍，明代的宦官更像是另成体系的内廷“文官”。“明代中后期，在内廷执掌权柄、有权有势者几乎都是“知识宦官”。魏忠贤可算例外。但魏忠贤本人虽不识字，其谋主王体乾、涂文辅、李永贞却都是“知识宦官”。王体乾是内书堂“读书正途”出身，天启初与魏忠贤合谋害死王安，升司礼监掌印，魏忠贤因不识字，只能掌东厂，凡是遇到批红、判答等事，都由王体乾主笔，而魏忠贤则‘默然也’。涂文辅入官前曾为整师，后冒姓自官为宦官，在阉党中以‘有心计，善书算，通文理’而居重要地位。他们名下的主要办事人员也多属知识宦官”。

“明代宦官知识阶层的形成，以及知识宦官人品的高下，就不能不对明代的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13]兵部左侍郎的陈洪谟，曾对嘉靖以前的一

些宦官作了这样的评价：“近世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说，皆不可少。前些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治世余闻》）

从上面两则材料中也可以体现，宦官本身所谓权力体系的一环，其评价褒贬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主观性，“知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宦官具备的文化修养水平与其宦官身份独有的政治能力。

三、下移与解构——地方权力的调整与重组

全篇简要介绍了巡抚、按察、司道以及基层乡里组织。其中，著者对于巡抚的理解有十分独到之处。从巡抚的设置到其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成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整个过程是在不自觉和被动中进行并逐步完成的。明政府一开始就力图维系原有的三司并立体制，坚持巡抚临时性差遣的原则，官员选派缺乏系统与规则，带有极强的主观臆断。成化以前一些地区巡抚的“置而复罢、罢而复置”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则不断冲击并最终改变了明朝最高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明代巡抚逐渐显现出的地方化和制度化趋向，宣德、正统时开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各地发生的暴力事件为主要诱因。巡抚一职的出现正是此时为应对中央对地方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明政府推行的维护自然经济的政策，在王朝初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即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其所带来的后果在宣德、正统时开始暴露出来。流民问题贯穿明代始终，官民关系紧张，阶层矛盾严重，各地农民的反抗时有发生，政府的赋役来源也受到影响。河南、江西、浙江、山西和南直隶等地巡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设置的。

以往学者谈论晚明政局，在称赞官僚士大夫限制皇权专制的同时，也留意到朝堂上的“混乱无序”“士大夫政治的困境”。^[14]但我们如若将观察视角从“庙堂”转至“江湖”，则又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传统君臣对立视角的阐释下，学者更倾向于探讨士大夫政治反传统、反专制、多元化的一面，“混乱”和“困境”常被轻轻带过，或是虚化为时代背景，或是消解在党争人事的具体分析中。^[15]

明政府的初衷，是指望出现问题时有廷臣处理事端，快速解决地方纷争。对巡抚的要求也只有“事毕复命，不复遣”这八个字。但是，巡抚尽管可以凭借朝廷重臣的身份在灾情严重地区开仓赈民、招抚流亡，以解燃眉之急；也可以督促地方有司平定民众的斗争，以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还可以持敕惩治某些横行乡里的乡绅豪户，祛除民害。王世贞代书的《重建（郟阳）提督军务行台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郟阳）名为提督抚治，而不恒受符节，不得从军兴法以便宜从事虽亦用考功计吏，顾三方之抚臣实共之，而其黠桀者阳受束而阻挠（之），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躯椎埋。奸铸亡命之徒一探丸，而繁丑靡至纳附。距弘治于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杀卒，二杀令，三杀尉而祸未已竟也。则岂其先臣之咸勿事事，毋亦县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尽欤？臣不胜过计，窃以当武宗朝，赣实据江闽岭海要害，数困贼，而都御史（王）守仁以提督军务请，诏许之一切便宜从事，守仁用是得募卒搜伍，缮甲尼警。臣不佞，不敢望守仁。^[16]

但它只能缓和一时一地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会矛盾。而自景泰、天顺，尤其是成化以后，农民的流亡和闹事乃至起义已不再是个别的地区性问题，而是普遍的全局性问题。为应对此时的时局，作为中央权力的外延体现，巡抚不仅仅要

做到“事毕复命”，一些早已被撤回的巡抚也纷纷恢复，并加速了巡抚制度的地方化和程序化。

明初，为解决行省体制过重、权力过于集中和文、武两大集团权力分配的问题，在各省设置都卫（后改都司）以统驭卫所，形成了行省—府县—都卫（都邑卫所两大平行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都、布、按三司并立的省级政治司）体制。三司并立，有利于保持省级机构权力间的往来与平衡，有利于中央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从理论上说，“各有所司，事有所归”这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前进方向。但社会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却不总是同步的、协调的。换句话说讲即“平衡总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宣德、正统以后三司开立的体制以及无法适应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充，无法适应军人集团地位的下降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新的权力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会打破旧有的三司的平衡。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使三司条条分割、运转不灵、相互牵制、事权不一的弊端暴露无遗。

地方上，在乡党政治下，个人利益、私情交际主导着大部分官员的政治行为。巡抚“以乡绅力得巡抚，则法必不得行于乡绅，乡绅力能抗之，亦能坠之”^[17]至崇祯年间，行取考选以同省位次决定翰林、科道等衙门去向，“每遇考选，必同乡诸公为政”。^[18]可见地方权力在民间的“异化”与重构。明政府基于地域平衡理念，规定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逐步固化，再到制度的最终形成，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反作用于官僚群体本身所带有的乡党观念和身份认同，从而导致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权威性的减弱，最终形成了“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严重妨碍皇权对

于基层的直接控制，地方上的官绅勾结，互为表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古代对于地方权力设计的漠视与无能。

从明代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来看，与汉之刺史、州牧，唐之处置节度使，宋之制置、转运使，乃至元之行省丞相、平章，颇有相同之处，即均由中央的派出官员转化为地方长吏，由临时差遣转化为正式机构。这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但历史上如此多的相似与反复，主要原因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君主个人主观意志上对集权的渴望，而是在相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中央集权条件下各个时期所出现的相似的、客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要求。值得指出的是，从刺史到州牧采访使到节度使的转变过程，是逐步获得军事指挥权、财政控制权两大权利的过程，其中并没有出现新的监察监管力量；而无论是制置使、转运使，还是巡抚，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控制权，这两大权力总是由中央牢牢控制，他们诞生的同时却出现了新的监察力量，因此，它们都不易发展到与如汉末州牧，唐代藩镇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

可以说，明代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有一个由重建到强化再到削弱的过程。或者说，对于基层社会，明代经历了一个由国家直接控制转向由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控制，再到国家失控的转变。这个过程或转变是由三个方面因素的消长而造成的，一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进退，二是基层其他社会权力的消长，三则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出入。而在这三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国家权力本身的变化。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他两个因素正是在国家权力衰退的过程中得到积累和强大的。作为地域平衡理念在明代铨选制度中的首次实践，吏部司官分省惯例影响并塑造着晚明的官僚政治。晚明党争以地域为分界，研究明代政治制度中的地域因素，也有助于深化对晚明政局的认识。^[19]

作者简介：崔永跃，男，河南郑州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22级历史普师一班学生，喜爱阅读，积极开朗，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商丘师范学院“文明学生”等荣誉称号。

参考文献：

- [1] 《明太祖实录》112，洪武十年五月庚子。
- [2] 《明太祖实录》113，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 [3] 《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条载：“上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家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入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
- [4] 方志远，李晓方：《明代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70页。应该说，洪武时所定苏松江浙人不得任户部的禁令不仅是事实，而且尽人皆知，只是文字记载语焉不详而已：高皇帝制：“直隶苏、松二郡人不得官户部。永乐中，皇太子监国，请以江西人给事中王高为户部侍郎，不许。正统末，吉水周忱拜户部尚书，仅数日而改工部。以后虽巡抚衙亦避之。惟内阁学士不论……”又吾郡（按：指苏州）滕思勉、顾礼，衢州徐恢，皆实拜户部，盖洪武中未定之制也。这段记载指出了三个事实：苏松人不得“官”户部是以“制”的方式发布的；除了内阁学士之外，苏松江浙人不仅不得在户部任实职，而且不得带衔户部；在“洪武中”未定制之前，苏松江浙人是任过户部实职的。但这段记载也遗留了一个问题，即“洪武中”是与“洪武初”、“洪武末”相对应的时段性概念，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洪武时”、“洪武间”的笼统性概念？而其矛盾处则更显而易见，题名为“苏松江浙人户部带衔”，且列举了江西人王高、周忱为例，起始句却说“苏松二郡”。但这一表面上的矛盾却掩盖了或许是因为时人尽知而毋须说明的事情的真相，即苏松人不得官户部和浙江、江西人不得官户部的禁令并非一次性发布。

- [5] 参见方志远：《明代权力构筑与运行逻辑》第五章第三节，《明代宦官再认识》第95页。
- [6]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魏阉生祠》，对建祠人员、官职、所建年份、建造地点，一一加以记载。“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
- [7] 赵沛：《试论汉唐宦官典章军制的演进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一期，135页。
- [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7，六部尚书表述。
- [9] 《明史本纪卷二 太祖二》
- [10]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有详细记载：“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来吉士。十四年从征，殁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水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时始卒。”
- [11] 《明英宗实录》卷137，正统十一年春正月庚辰。又《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引文系据中官考。据此救文，《明史·宦官传》说王振少选人内书堂之说是可信的。且振于永乐中人官，曾侍仁宗于东宫，嗣侍英宗者又几二十年，年岁亦相符。严从简《殊城周咨录》与查继佐《罪惟录》谓振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乃自官以进，授宫人书云云，其说虽难以为据，但在当时却流行其广。
- [12] 参见方志远：《明代的“知识宦官”》，《文史知识》1990年第七期，第13-14页。
- [13] 参见方志远：《明代的“知识宦官”》，《文史知识》1990年第七期，第15页。
- [14] 商传：《走进晚明》，第128页；李佳：《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
- [15] 方志远：《明代的“知识宦官”》，《文史知识》1990年第七期，第16页。
- [16] 王世贞：《重建（郟阳）提督军务行台记》，《明经世文编》卷334。隆庆三年（1569）二月，抚治郟阳右金都御史孙应鳌以亲疾乞归，上许之。于是郟阳抚治相继以廷命，由汪道昆、凌云翼、汤宾接连任之。至万历元年（1573）六月，诏起原任抚治郟阳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孙应鳌，仍以原职抚治郟阳。孙二次莅任以后，以其曾任斯职深有体会，感到身为抚治，虽则领名为提督，实则无权节制军队，每遇有警，必得请示于朝廷，始可征调军队，如是往往缓不济急。他经过深思，于二年（1574）春据理上奏于朝廷，谓“名为提督抚治，而不恒受符节，不得从军兴法以便宜从事，请更玺书，为提督军务兼抚治”。上是其言，即于当年三月二十八日下诏：“改提督抚治郟阳等处都御史”为“提督军务兼抚治郟阳等处”。由是郟阳以抚治管理军务自孙应鳌始。
- [17] 黄景昉：《宦梦录》卷4，黄景昉：《宦梦录馆阁旧事》（合印本），第113页。
- [18] 李清：《三垣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7、28、193页。
- [19] 学界对晚明政局的研究，多以党争中的人、事为考察对象，间及君臣关系、制度运作乃至政治文化。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转变，参见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 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求是学刊》2019年第3期。近年关于党争中人事的研究，参见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以楚宗、妖书、京察三事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黄阿明：《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私书”与辛亥党争》，《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马子木：《明季浙党考》，《文史》2022年第1辑；朱曦林：《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关于晚明政治中的君臣关系，参见李佳：《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关于制度运作，参见余劲东：《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

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6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84—107页；李小波：《晚明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关于政治文化，参见马子木：《重塑纪纲：东林与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0年；《时文写作与晚明政争——以东林与宣党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4期。另外，部分通论性著作也有晚明政局的分析，如商传：《走进晚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7—140页；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学术动态●

白鹿洞书院管委会副主任郭宏达先生应邀到人文学院做学术报告

12月2日上午，国内著名的文化学者和书院文化研究专家，原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郭宏达先生，应邀做客人文学院应天书院讲坛，为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要义”的精彩学术报告。

报告阐释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产生的人文环境和时代特征，分析了“义理”、“为学”、“穷理”、“笃行”的学规含义，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白“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揭示》还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指明了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它也是以后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并传播到海外。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给予《白鹿洞书院揭示》很好的评价。郭宏达先生的讲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分析透彻，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艺术空间 ●

硬笔书法 · 董思源

袞连袂如雲起柳陰暗沙堤花光明御
 水寶蓋蔡京車高牙童貫里中樞甲第
 起崇墉相國高堂列鼓鐘道君禮樂三千
 威屬國山川百二重春入上林迎旭日雲
 開水殿躍飛龍：樓鳳閣相輝映山城
 鼓吹春遊感去遊霞：多貴臣青驄駟
 駟車鄰：明月樓中邀上客紫薇花下
 宴嘉賓滿堂珠履餘羞錯從容軟曲金
 蘭靚斜陽返照天欲暮汴水橋邊車馬
 度橋邊街市何喧闐萬貨手商夫道踰

口魚磯疊石為更有一川風景別身在蓬
 萊自不知道萊宮殿何餘華強島嶼
 去入崖賒仙人爐煉長生藥羽客丹成
 九轉砂雷素作安期遺我老如瓜駟山去
 海丹青髮筆應烟雲伏上見神思妙
 摹出清彩偶然展軸驚萬人巧瞻奪天
 工結構含精氣遠過顏席頭不勒陸仙
 尉仇子此卷何為哉燕雀鳩：畫裏來
 駟麟自名種鄰侮餘華傷春潤之媒
 牛車後首受傳玄水天雪害嗟徘徊

即今歌舞地花散為誰開空留遺蹟
 在憑弔費詩才
 寶觀王長春居士題唐駱賓
 王帝京篇韻
 梁詩正謹書
 癸卯秋董思源

結菊桃李汾芳菲遊人難還白馬肥朝
 催玉勒花間去暮拂金鞭柳岸疎頗厭
 錦繡服紗裁白行衣刻孟風未暖郭解
 力猶微平生但言憑義氣捨身許友未
 覺非郊畿雷：帝晴雲猶田桑園望中
 分村墟景象多幽趣點綴虫：忘帝勛
 歸子嬉無節長切略無父常樂昇平烽
 大息霸陵間却故將軍柳 陔遊客騰
 船待一棹輕移山勢改鳩紅粉白夾岬驕
 蘭橈畫舫中流在中流竟渡各份馳渡

跋仇吳清明上河圖
 蘭靚斜陽返照天欲暮汴水橋邊車馬
 度橋邊街市何喧闐萬貨手商夫道踰
 結菊桃李汾芳菲遊人難還白馬肥朝
 催玉勒花間去暮拂金鞭柳岸疎頗厭
 錦繡服紗裁白行衣刻孟風未暖郭解
 力猶微平生但言憑義氣捨身許友未
 覺非郊畿雷：帝晴雲猶田桑園望中
 分村墟景象多幽趣點綴虫：忘帝勛
 癸卯秋董思源

雪落归德 · 高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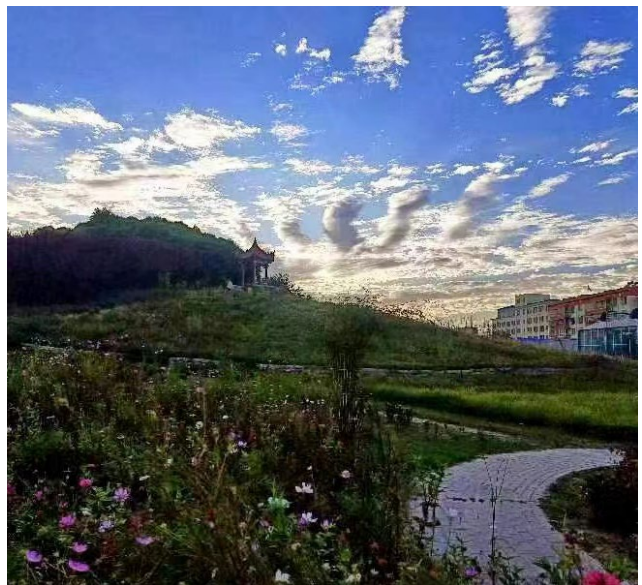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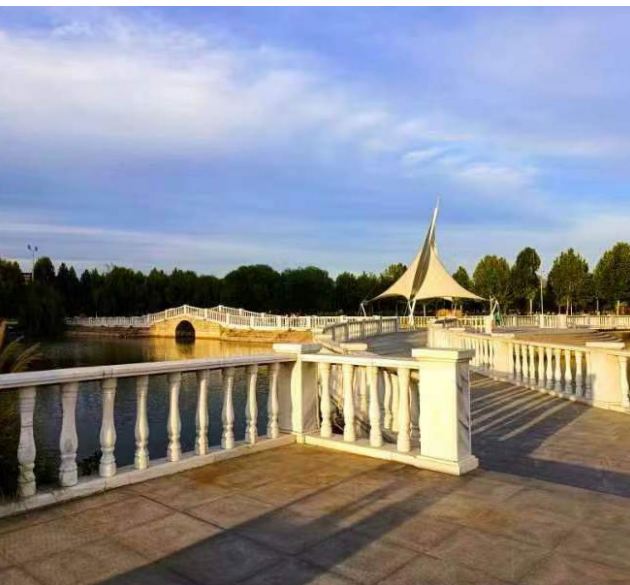




海阔天空 • 王双霞



校园夕照 • 金晓双



“最是橙黄橘绿时”

——人文学院秋日文化雅集

• 创意汇演 •



• 古风游园 •



摄影 • 高冬雪

封面设计：朱长征

志道 弘毅
乐知 笃行

应天文化季刊

(2022年创刊)

2023年冬之卷(总第8期)

总 编 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副 主 编：冯志伟 李卫军
卢忠雷
执行副主编：常丽洁 李瑞华
于志刚
本 期 编 辑：孙 佳

主管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编辑出版：《应天文化季刊》编辑部
E-mail: ytwbjk@126.com
联系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55号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商丘市平原路55号汉梁楼229室)